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教授 杨斌 作序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信报》主编 林行止 力荐

经济杀手 是指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专业人士，他们从世界各国攫取了数以千亿计的金钱。这些钱，通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其他国外的援助机构，装入到美国各大集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族的口袋中。经济杀手用尽各种高明手段：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他们玩的是美国“帝国霸权”时代一开始就有的“老把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其规模空前庞大，令人恐怖。

我清楚这一切！因为我曾经就是一名经济杀手！

——John Perkins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K837.12

262

2006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揭露美国全球经济援助背后的真实企图

〔美〕约翰·珀金斯 (John Perkins) 著
杨文策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001
杨斌推荐序一	003
林行止推荐序二	009
作者自序	012
前 言	017

第一部分 1963-1971 年

第 1 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003
第 2 章 一脚踏进泥潭	012
第 3 章 印度尼西亚：我的第一次受训	020
第 4 章 出卖灵魂	027

第二部分 1971-1975 年

第 5 章 当了一回审判官	035
第 6 章 受审的文明	039
第 7 章 截然不同的耶稣	044
第 8 章 一生难求的机遇	049
第 9 章 巴拿马的英雄总统	055
第 10 章 运河区的海盗	060
第 11 章 士兵与妓女	064
第 12 章 与将军对话	069

第 13 章	进入经济史上的险恶新时期	075
第 14 章	沙特阿拉伯的洗钱风波	079
第 15 章	“拉皮条”及资助奥萨马·本·拉登	090

第三部分 1975—1981 年

第 16 章	巴拿马运河谈判与格雷厄姆·格林	099
第 17 章	伊朗“万王之王”	106
第 18 章	受刑者的自白	110
第 19 章	伊朗国王的垮台	115
第 20 章	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的楔石	118
第 21 章	美利坚合众国与全球帝国	122
第 22 章	骗人的个人履历	128
第 23 章	厄瓜多尔总统与石油巨头之争	137
第 24 章	辞 职	142

第四部分 1981 年至今

第 25 章	厄瓜多尔总统之死	149
第 26 章	巴拿马又一名总统之死	154
第 27 章	我的独立电力系统公司、安然和乔治·W. 布什	158
第 28 章	新一代经济杀手的诞生	163
第 29 章	美国入侵巴拿马	167
第 30 章	我受贿了	173
第 31 章	经济杀手落败伊拉克	178
第 32 章	“9·11”事件的后果及其对我个人的影响	184
第 33 章	委内瑞拉：被萨达姆救了一命	191
第 34 章	重返厄瓜多尔	197
第 35 章	揭穿骗人的面具	204
尾 声		212
约翰·珀金斯年谱		217
作者简介		222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远期开仓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6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zhijie.cn>



第一部分

1963—1971 年

第 1 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事情的开始其实很简单。

1945 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则是一名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一艘油轮上当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得克萨斯州一所医院养髌骨的伤。我在 1 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他在提尔顿学校（Tilton School）教语言。提尔顿学校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 9~12 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 50 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顿（Boston）和纽约（New York）的有钱人家。

我家很贫穷，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铲雪的工人都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从 4 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个笑话。

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于是，父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和“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混在一起，我将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的3个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我很难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放3个月假，这时候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那儿度假。这里森林环绕，晚上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邻居，而我则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孩子。最初几年，我将树木当作是《圆桌武士》（Round Table）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是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我的热情就像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①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那样浓烈，而且深藏不露。

14岁的时候，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学校上学。由于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也不准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我的新同学们放假回到他们的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却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就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也应该忘掉我了。我倍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都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会因此而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我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能够完全迎合我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而“荡妇”这个词听来是如此的诱人。

①兰斯洛特（Lancelot）：亚瑟王传说中的一位圆桌骑士，他与王后格温娜维尔的恋情导致了他与亚瑟王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大学里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的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学校永远以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倍感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尽管我的父母知道布朗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Ivy League）的成员之一，母亲毕业于该校，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我很愿意在这里就读（因为我很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但他们却希望我读米德尔布里学院。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了腿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我心有不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在我看来，米德尔布里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而已——尽管学校位于佛蒙特州（Vermont）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我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里一呆就是四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者是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呆在这个学校里，我还怎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到酒吧外边靠近“水獭河”（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然后我们跳下去，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人/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最高级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伊桑·艾伦（Ethan Allen）的故事长大的。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激战的地方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所有可以找到的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有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的时候，我是很想参军的。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其中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认为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并且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内心感受。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与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为了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向校警撒谎，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富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对父亲的反叛、与陌生人交往的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能力、对警察撒谎的行为，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结束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偶然”之一，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着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我清楚我的血管里有着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逊森林的机会有多大。他说，他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 20 世纪末发展到如此

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学校里那个富有的“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艾纳·格列夫（Enar Greve）西装革履地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T. 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及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U. 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他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我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企业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 15 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 3 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 2 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 1 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 年 1 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那年我 26 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

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近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作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邦德^①差不多。

①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译者注

第 2 章

一脚踏进泥淖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个有 2 000 多人的公司里，只有 5% 的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或合作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对所有人有支配权，而且他们赚的钱也最多。“谨慎”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都希望请来的顾问能身兼律师和精神治疗医生的职责，遵守严格的纪律和绝对保密的原则；与媒体打交道是被禁止的。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者非常熟悉，例如亚瑟·D·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贝泰公司。

“竞争者”这个词语我用得很广泛，因为实际上美因公司本身就是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哪怕是一个仓库。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没有和国防部或者军队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头几个月我真的没法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 11 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作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以及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好的预测师

(并且因此得到晋升的机会)，我得作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数据分析。

“真是好极了，”艾纳喜欢这样说。他会将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再划过头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会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

艾纳经常出差，通常每次都是两三天左右。他去哪里、干什么，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经常让我去他那里喝咖啡闲聊。他问起了安、我们的新居及那只从厄瓜多尔带回来的猫。对他了解得越多，我的胆子也就越大，也就想更多地了解他，还有我这份工作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每次他都成功地将话题转移，而每次他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最近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伴着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压低嗓门说：“我们在科威特将有个大项目，到时候你将被派到科威特去，现在离你到印度尼西亚去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有关科威特的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到时候我们给你弄一个借阅证。”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要在那几个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办公室附近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里离我在“后滩”的公寓也不远。我熟悉了科威特的情况，还阅读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IMF）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有关经济统计的书籍。我知道自己将被安排去为印度尼西亚和爪哇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我想，最好同时也着手为科威特准备一个。

要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师，凭借我在波士顿大学所学的商业管理专业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计量经济学，我甚至参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经过处理的经济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可以完全偏向经济分析师个人喜好的结果。

美因是一个“男人至上”的公司。1971年，那里只有4名专业女员工。可这里却有两百多名女秘书和速记员——每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配有一名秘书，而速记员则是为其他员工服务的。我已习惯了这里的性别歧视。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后来对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发生的一幕大吃一惊。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那天，一位美丽的黑发女子走上前来坐在我对面，她穿着深绿色的套装，显得很老练，看起来比我大几岁，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注意她，于是故作冷漠。过了几分钟，她把一本打开的书向我这边滑过来。上面有一个表格，正是我要查找的有关科威特的内容，还有一张印有她名字的卡片，克罗汀·马丁（Claudine Martin），她的头衔：查斯·T. 美因有限公司专业顾问。我抬头看着她那双柔和的绿色眼睛，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来培训你的。”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发生在我身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与克罗汀在她位于培根街上的公寓里面面，这儿离美因公司在保诚大厦的总部不远。在我们共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她就告诉我，我的职位非比寻常，必须高度保密。她说除了她之外，没人有权给予我具体的工作指示，她的任务就是要将我训练成为一个“经济杀手”。

这个称呼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有关间谍的遥远的梦想。我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种紧张的笑声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告诉我说，用这个词的原意之一就是它的幽默性。“谁会把它当一回事呢？”她说。

我承认我对经济杀手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

“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她笑着说，“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她突然板起脸来，“我坦白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将我所知道的毫无保留教给你。现在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但一旦你的脚踏了进来，你就一辈子别想逃。”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克罗汀从国家安全局档案中看过我的性格特征资料，她事先已经对我的性格弱点了然于心。我并不知道是谁给她提供了那些资料，艾纳，国家安全局，美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她把那些资料利用得淋漓尽致。

她运用的手段是肉体诱惑和语言控制的完美结合，简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当然，这些手段并没有超出操作程序的标准范畴。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在说服经济杀手执行各种高风险、高压任务的时候，美因都会采用这种手段。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不

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此外，对于我执行的任务将给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克罗汀绝不会隐瞒。

我不知道谁是她的雇主，虽然我很怀疑是美因公司，正如她名片上所写的那样。那时我太天真、太胆怯也太茫然了，没有开口问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克罗汀告诉我，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我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最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像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斯通-韦伯，以及布朗-路特公司等），其途径就是确保这些公司得到贷款国大型工程建筑项目的合同；第二，我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如果他们将合同交给美因和其他美国承包商的话，他们就必须支付巨额的工程款项，而这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将永远听从我们的吩咐，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他们国土上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而我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 10 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 20 年至 25 年中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而达到这个增长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打算用 10 亿美元贷款去“引诱”一个发展中国家，让该国领导人拒绝与前苏联结盟，那么在预测报告中，我就得把投资建造一座发电站、一条新的国家铁路线路以及一个通信系统的可能收益作一个比较；又或者有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具备发展现代化电力设备系统的潜力，这样我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代化的电力系统将促进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就能说服他们，向我们贷款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使贷款的理由变得堂而皇之。不管在哪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都得到最大增长，那么该项目就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我还必须提供各种数据证明：如果该国建设这个项目，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都能为大承包商牟取暴利，让债务国中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喜，这就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贷款的数目越大越好。不过，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然而经济发展预测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克罗汀和我公开地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骗人本质。打个比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只是让少部分人，比如拥有一家公共设施公司的人受益，而其他的民众则会背上沉重的债务。的确，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提高了，财富也确实增长了，但是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普通的美国公民一样，美因的员工都深信：我们建造发电站、高速公路和港口，实际上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媒体不断宣扬，我们美国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最近几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既然他们还要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焚烧美国国旗，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让他们永远呆在贫穷的地狱中呢？”

说出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怀里揣着高学历证明的人。可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国设立领事馆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在20世纪后50年，那就意味着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全球帝国。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学历资格，实际上都与18世纪的殖民者一样粗野无知——将为保卫自己土地而奋战的印第安人看作是“魔鬼的仆人”。

几个月之内，我就要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当时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穆斯林国家，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这是紧跟越南之后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克罗汀是这样形容爪哇的，“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如果他们站在了共产主义那边，好……”她把一根手指在喉咙上一横，甜甜地笑了一下，“让我们这样说吧，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测，阐明在新的发电站建成和输电网络铺好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的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际银行就会认可

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你还可以继续到边远的地区跟进其他项目，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购物车。”接着她告诫我，这活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银行的专家们都会盯着你，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你预测中的漏洞。”

有一天，我提醒克罗汀，美因公司派往爪哇的团队除了我还有其他 10 个人。我问她是不是这些人也接受过和我一样的培训，她断然否定。

“他们是工程师，”她说，“他们设计发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站，建设便于输送燃料的海港和公路，而你才是预测爪哇未来的人。你的预测决定了他们建造的这一切是否重要，当然也决定了贷款的数目。你明白了吧，你才是关键。”

每次当我离开克罗汀的住所时，我都会想我所做的究竟对不对，但在内心深处，我想我是错的。每当想到这些，从前所遭受的挫折感就萦绕心头。而美因公司似乎给了我以前不可企及的一切，可我不断问自己，汤姆·潘恩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最后，我说服了自己，因为只有我亲身经历了才能了解得越多，才能在以后揭露真相时越清楚。

我和克罗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她满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别傻了，你以为你踏进这道门槛后，还能走出去？”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让我吃了一惊。离开她的寓所后，我从联邦大道晃荡着走到达特茅斯街，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会是一个例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克罗汀和我坐在她家窗边的长椅上，看着大雪飘落在培根街上。“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少而精。”她说，“我们得到了钱，很多的钱，因为我们从那些国家里骗取了不计其数的钱。大致上你的工作就是去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之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为了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需要，将这些领导人骗入到无尽的债务中，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效忠’。我们可以随时利诱他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同时，他们也因为能给其国家的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和机场而巩固其政治地位。美国的工程建筑公司的所有者也因为这些工程项目而赚得盆满钵满。”

窗外大雪纷飞，在克罗汀布置得简约而舒服的家中，我们从容地倚在窗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边，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我才知道了“经济杀手”这个称谓的由来。克罗汀告诉我，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威慑力上的。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的核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使得诉诸于军事对抗的方法太过冒险。

1951年，关键时刻来临，伊朗挺身反抗掠夺本国自然资源和剥削其国民的英国石油公司〔那家公司是现在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BP）的前身〕。作为反剥削所采取的行动则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且深得民心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1年《时代周刊》杂志评出的年度人物）将伊朗所有的石油资产国有化。恼羞成怒的英国立刻向其“二战”盟友的美国救助。然而，两国都担心军事报复可能会导致前苏联站在伊朗一边并且采取行动干涉。

于是美国决定不派遣海军出战，而是派出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他表现得很出色，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拉拢了一帮人，接着唆使这些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暴乱和暴力游行，制造出摩萨德不受爱戴、治国无方的假象。最后，摩萨德下台了，并终生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则成了无可匹敌的独裁者。克米特开创了一种新兴的职业，而我现在就加入其中了。

罗斯福的旗开得胜，改写了中东的历史，而这也说明了采取军事行动来建立帝国的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了。那时候也恰好遇上了很多国家倡议的“限制核武器军事行动”运动，该运动最后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蒙受耻辱。到了1968年，也就是我接受国家安全局面试的那一年，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正如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人预想的那样），美国就必须采用克米特·罗斯福在伊朗取胜的那种策略。这是唯一能躲过核灾难，不流一滴血就能战胜前苏联的方式。

可是，克米特·罗斯福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一旦他被逮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美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任务要执行，寻找一个避免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些战略策划者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变让他们找到了灵感。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和其在欧洲的姐妹帝国建造者共同出资建立）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确立。

大约是我进入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那一年，避免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已经出台并开始试行。美国情报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局）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由国际企业负责聘用他们，政府是永远不会给经济杀手们发工资的，他们得到的一切报酬都来自于私人企业。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的肮脏行为被揭穿，也是归咎于私人企业，而与政府阴谋扯不上任何关系。另外，雇佣经济杀手的公司，尽管也是由政府部门和他的跨国银行伙伴出钱兴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却能成功地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被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合法提案，包括商标、国际贸易和《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掩盖起来。

“这样你明白了吧，”克罗汀说，“我们不过是接班人而已。”

第 3 章

印度尼西亚：我的第一次受训

除了熟悉我的新职业之外，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书籍。“在你去一个国家之前，你对那里了解得越多越好。”克罗汀告诉我，我把她的告诫铭记于心。

1492 年哥伦布环球旅行起航之时，他的目的地是当时被称作“香料岛”的印度尼西亚。整个殖民时代，这里被视为一块比美洲更为珍贵的瑰宝。而爪哇岛，因其物种丰富、国土丰饶、出产世界闻名的香料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冒险者之间暴力冲突的竞技场。1750 年荷兰人取胜，尽管他们控制了爪哇，可他们又花了 150 年时间才陆续将爪哇外围的多个岛屿据为己有。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印度尼西亚，荷兰人并没有抵抗。就这样，印度尼西亚人，尤其是爪哇岛上的居民，又经历了一次苦难。在日本投降后，一位极具领袖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上台，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经过 4 年的浴血奋战，荷兰人终于在 1949 年 12 月 27 日投降，苏加诺担任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治理印度尼西亚比打败荷兰人更具挑战性。这个由 17 500 个小岛组成的群岛，不但未能紧密团结、和睦相处，反而成了宗族主义滋生并且互相冲突的热锅。在这些群岛上，文化差异巨大、方言土话数十种，宗教组织间孕育几个世纪的仇恨导致了血腥的暴力冲突频繁发生，苏加诺很快取缔了这些

宗教组织。1963年，他解散议会并自称终身总统。他与全球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府结成紧密联盟，换来了军事装备和军队培训；他向邻国派遣以前苏联武器为装备的印度尼西亚军队，试图让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传播开来，从而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认同。

苏加诺的反对者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恼火，终于在1965年反对者策动军事政变^①，幸亏苏加诺的妻子急中生智，苏加诺才逃过了暗杀，可是他的军队高官和最亲密的部属却未能逃脱厄运。这一幕与1953年伊朗那一幕是如此的相像。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员，被指控为政变策划者，军队发起的屠杀不断继续，期间估计有3万~5万人被杀。陆军将军苏哈托1968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1971年，由于华盛顿政府对越战前景的怀疑，他们决定引诱并唆使印度尼西亚从共产主义联盟中分离出来。1969年夏天，尼克松总统开始陆续命令从越南撤军，美国的策略开始走向全球化。美国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一个接一个投入到共产主义的羽翼之下。而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地理位置和其丰富的资源对美国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美因公司的电力工程项目则是美国全面控制印度尼西亚进而控制整个东南亚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是：苏哈托能够像伊朗国王那样为美国服务。美国也希望能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其在东南亚地区实施战略的试点。为此，华盛顿有着完美的设想：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产生巨大反响，尤其是那闹哄哄的中东，因为印度尼西亚同样蕴藏了大量的石油。

在波士顿大学公共图书馆，我一边盯着书本，一边想象着将要踏上旅程，内心异常兴奋。

在美因工作，使我的生活由和平队时的艰难困苦变成了现在的富足甚至

^①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30”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并导致苏加诺下台和苏哈托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长期以来，虽然疑点重重，但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盖。由于涉案人员大都逝去，揭开这一谜底已成为难题。——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是奢侈。与克罗汀在一起，已让我的某些梦想得以实现，尽管我得到的这一切近乎虚幻。我甚至感到以前在预备学校里遭受的冤屈，现在终于有了辩白的机会。

但这时我的生活出现了危机：妻子安和我越来越难以融洽相处。我想她可能已经察觉出来，我正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当时的我却认为这是合理的——最初是她逼着我结婚以致我心有不忿，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必然结果——尽管在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中，她对我悉心照顾并且鼎力支持我的工作。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能肯定我与克罗汀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我不能也没有将这些真相告诉安，但她肯定能感觉到。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决定分居，于是我们各自搬到不同的公寓里。

1971年的一天，大约在我前往印度尼西亚执行任务的前一周，我又去了克罗汀家里，我发现在餐厅的小桌子上，摆着什锦奶酪和面包，另外还有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她向我举起了酒杯。

“你成功了。”她微笑着说（但在在我看来，这种祝贺毫无诚意），“现在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来她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着我，“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有过接触，”她说，“要不然我饶不了你，我也不会说我曾经见过你。”她盯着我——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来自她的威胁。然后她冷笑了一下，“要是你提起我们之间的事，你会很危险的。”

我愣住了，心中充满了恐惧。过了一会儿，我独自一人回到保诚大厦，我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安排得非常谨慎和精明。事实上，我都是呆在她家里度过我们共同的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美因公司也没有任何人牵涉其中。另外，我却不得不承认我十分欣赏她的坦率。为了让我去提尔顿学校和米德尔布里学院念书，我的父母欺骗了我，而克罗汀却没有。

我开始了我全新的生活。

我将要在印度尼西亚呆上3个月的时间，对这个国家，我总有一种浪漫的憧憬。在我看过的那些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书中，有不少身着色彩鲜艳布裙

的美女、颇具异国情调的巴厘岛舞者、身怀喷火绝技的萨满教人的图片，还有那些在冒着烟的火山脚下、碧蓝的水面上划着独木舟的武士。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一系列有关印度尼西亚海盗（Bugi Pirates）^①的丛书，那些开着大型黑色帆船的海盗至今还在这些群岛的海域上出现！这些声名狼藉的海盗让欧洲水手闻风丧胆，以至于他们回到家中还会这样吓唬他们的小孩：“你要是不乖，印度尼西亚的海盗就会来捉你。”噢，这些画面都让我心驰神往。

这个国家的历史给她注入了更多的传奇色彩：愤怒的神灵、科莫多巨蜥、部族的苏丹以及在基督出生之前就飞跃亚洲群山、穿过波斯沙漠、跨过地中海、安身于我们灵魂最深处的古老神话。这些传说中岛屿的名称，如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岛都震荡着我们的的心灵。这是一片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美丽土地，一块哥伦布寻而不遇、无可比拟的瑰宝，一位西班牙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苦苦追求而无法得到的高傲公主，她是一种幻想，一种梦境。

我对印度尼西亚充满了期待，这也许和那些伟大的探险家们的心理相同。当然，我也知道我不能总是沉迷于幻想中，因为事情最后的结局往往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没错，印度尼西亚是块瑰宝，可她也并非天堂。1971年夏天，我到达了热气腾腾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里的景象让我的幻想彻底破灭。

这里的景色确实美不胜收：美丽的女子穿着五彩斑斓的布裙；繁茂的花园中长满了热带地区才有的花朵；还有那充满异国情调的巴厘舞者；出租车都是人力自行车，车身外边漆着五颜六色的奇特图画，乘客们坐在前边，司机坐在后边踩；到处是荷兰殖民时期建起的大楼和顶着尖塔的清真寺。可是这个城市也有丑恶、悲惨的一面：麻风病人伸出残肢而不是双手向路过的行人乞讨；仅仅为了几个钱，年轻的女孩子们就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曾经象征繁荣的荷兰运河现在变成了一个臭水潭。在黑漆漆的运河岸边，垃圾随处

^①Bugis布吉斯族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中部的苏拉威西岛（Sulawesi）。“Bugis”在当地语言的意思是“人”。——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可见，所有的人都挤在破烂的纸皮房里。街道上充斥着刺耳的喇叭声和令人窒息的浓烟。这是一个美与丑并存、优雅与粗俗共处、高尚与庸俗同在的地方。这就是雅加达，丁香花与兰花的迷人香气弥漫在空中，敞开的下水道的恶臭四处飘散，仿佛在争相较量着它们的气味孰浓孰淡。

我也曾亲眼目睹过贫穷。在新罕布什尔州与我同学的人中有不少住在没有水暖系统、用防水油布搭成的破房子里；在严寒的冬天，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衫，穿着破旧的网球鞋上课；因为没有水洗澡，他们身上常常散发出一股很浓的汗臭味。我也曾经和安第斯山脉的农民一起挤在小泥屋里，他们一日三餐，除了干玉米就是马铃薯。一些小孩子刚刚出生就夭折，似乎就是为了看上这个世界一眼。我见过贫穷，可还是对雅加达的这种贫穷却耿耿不已。

当然，我们这一行人住的是印度尼西亚最豪华的酒店——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这家酒店为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ways）所有，和该公司在全球各地的所有连锁酒店一样，都是专为那些突然心血来潮的富有的外国人而设，尤其是石油企业的高管和他们的家人。

到达雅加达的第一个下午，我们的项目经理查理·伊林沃斯（Charlie Illingworth）为迎接我们，在酒店顶层一个别致的餐厅举办了欢迎晚宴。查理是个喜欢研究战争的家伙，他的业余时间多数用来阅读军事名人传记和有关战争的历史小说。如往常一般，他身穿卡其色的宽松裤子和短袖卡其色衬衣，上面别着军人肩章似的装饰物。

一阵寒暄之后，他点燃一支雪茄，吐了一口烟后，举起香槟说：“为更好的生活而干杯！”

我们都举起酒杯，“为更好的生活干杯”，酒杯相碰，叮当作响。

烟圈在查理四周飘转，他朝四周扫了一眼。“在这里我们会过得很满足的。”他笑着说，“印度尼西亚当地人会把我们照顾得很好，美国领事馆的同胞也一样。但别忘了，我们有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他的眼睛向下瞄了一下笔记，“对，我们到这里来是为爪哇这个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作一个电力系统的总体规划。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乔治·C. 斯科特（George C.

Scott)^①——查理心目中的英雄巴顿将军的饰演者。“我们到这里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印度尼西亚从共产主义的手中拯救出来。你们也知道，印度尼西亚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苦难。现在，这个国家真正迈进 20 世纪的时刻来临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印度尼西亚不会跟随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足迹，而是跟随我们的脚印。其关键所在就是建立一个综合电力系统，那比任何其他东西（当然可能石油除外）更有用。”

“提起石油，”他又抽出一根雪茄点燃，然后翻了一下他的讲稿，他说，“我们都清楚，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性有多大。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盟友。所以呢，你们在制定总体规划的同时，要确保石油工业和其他一切为之服务的行业——港口、输油管道、建筑公司等都能在未来 25 年内得到充足的电力。”

他抬起头，目光离开讲稿，然后把视线对准了我。“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你们也不希望自己手上染上印度尼西亚的孩子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们的鲜血吧。你们也不愿意让他们生活在锤子和镰刀的红旗之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酒店豪华的床上，想起了克罗汀，她此前对我阐述有关外债的一番话仍然萦绕在我心头。我努力回忆在商学院所学的宏观经济课程，希望可以从那些理论中找到让我心安的借口。我告诉自己，无论怎么都好，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帮助印度尼西亚发展经济的，继而在现代工业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可我知道，明天早上当我向窗外望出去的时候，穿过酒店美丽的花园和游泳池，看到的还是那一大片破旧不堪的小屋沿着污秽的运河延伸数英里；我还将看到，那些由于缺少食物和干净饮用水而奄奄一息的小孩，包括大人都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饱受疾病的折磨。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发现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查理和所有来到这里的公司职员，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我们在这里推行美国政策和企业计划，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而不是为印度尼西亚的普通大众谋求幸福。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语：公司帝国。我不肯定我以前是否在哪里听

^①乔治·C. 斯科特(George C. Scott)：著名演员，曾经主演《巴顿将军》以及《简·爱》等电影。——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说过这样一个词，或者这不过是我自己胡编乱造的一个，可这确实是对我们这一代决心要统治全球的精英集团的一种形象刻画。

公司王国是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在大型企业董事会和政府部门之间穿梭自如。我想到的是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曾高居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之位，之后出任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防部长，现在则占据着全球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的最高职位。

我还意识到，我的大学教授其实完全明白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多数情况下，帮助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只会让处于该国社会经济结构“金字塔”上层的少数人变得更加富裕，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却毫无帮助，甚至会让他们陷入更加深重的贫困之中。实际上，在那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只会让那些国家变得像封建社会般落后。就算我的大学教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承认，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大企业以及幕后操纵这些企业的人不断地给学校提供赞助。揭露真相只会让那些教授们的饭碗不保，同样，如果我现在就披露经济杀手们的所作所为，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度过的每个晚上，我都被这些想法困扰着无法安然入睡。最后，我好不容易给自己找到了个借口：我并没有错，从我出生以来，从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到预备学校，我一直在挣扎，也一直在努力。由于偶然的机会和自己的努力，我才过上了今天这样的生活，如果以美国文化的观念作为评判标准，我做的事情并没有错。我正在一条洒满阳光的大道上阔步向前：我将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经济预测师；我所做的正是将我在商学院所学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我帮助推广的是一个全球最顶尖的智囊团认可的发展模式。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安慰自己——终有一天我要说出事情的真相。然后，路易斯·拉摩（Louis L'Amour）^①的枪战小说就伴我入眠。

^①路易斯·拉摩（1908-1988年）：著名的美国西部小说作家，他一生写作超过100部小说，销量超过2.25亿册。——译者注

第 4 章

出卖灵魂

在雅加达美国领事馆的前 6 天时间里，我们的 11 人团队除了登记资料、与当地官员会面、协调团队内部人员的任务外，剩下的时间便是在游泳池里放松。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里的美国人之多着实让我吓了一跳。那些漂亮的女人——美国石油和建筑公司执行人员的妻子们，白天在游泳池里打发时间，晚上则穿梭于附近的豪华餐厅之间——确实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后来查理将我们这个团队转移到山城万隆（Bandung）。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贫穷的景象也没有那么刺眼，让我们分心的事情也更少了。我们被安排住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国家大厦——专门用来接待国宾的宾馆，同时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位管理人员、一位厨师和一个佣人。国家大厦建于荷兰殖民时期，这里确实是个避风港。在房间宽敞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对面连绵起伏的山峦上的大片茶园，一直延伸到爪哇火山的斜坡上。另外，还给我们配备了 11 部丰田越野车、司机和翻译。后来我们还获得了万隆高尔夫球会和网球俱乐部的会员身份，还给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国营电力公司（Perusahaan Umum Listrik Negara, PLN，政府所有的电力公司）总部大楼上安排了办公室。

在万隆最初的几天，我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与查理和霍华德·帕克（Howard Parker）会面上。霍华德已经 70 多岁了，他是从新英格兰电力系统公司（New England Electric System）退休的电力负荷预测师。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现在他负责预计爪哇岛在未来 25 年内需要的能源和发电能力（电力负荷），除了总体预测外，还要对每个细分的城市、每个区域的电力负荷进行预测。由于电力供应与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他所作出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对爪哇经济发展率的预测基础之上的。团队的其他人则根据我们俩的预测结果，设计出新的发电站、输电线和配电站，完成选址计划以及设计燃料运输系统。

每次在查理的办公室里会谈，查理都会不断强调我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他一再、再而三地告诉我，在预测中必须要乐观再乐观。克罗汀是对的，我的预测是整个规划的关键所在。

“我们到这儿的头几周时间，”查理解释说，“都是用来搜集数据。”

查理、霍华德和我都坐在舒适的大藤椅上。办公室墙上挂着蜡染的织锦画，画中是古印度梵语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英雄传说的场面。查理点燃了一支大雪茄。

“首先，工程师将描绘出一幅当前印度尼西亚电力系统、港口吞吐量、公路和其他所有基础设施的详图。”他拿着雪茄的手指向我，“你要赶紧行动起来了。第一个月结束之前，你要让霍华德对建立新供电系统后，这里会出现的经济奇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第二个月结束之前，他需要更详细的、细分到各个区域的资料；最后一个月，我们聚在一起来商量和策划，并对我们的数据进行查漏补缺。所以，在我们离开印度尼西亚之前，我们必须掌握我们需要的充足信息。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去过感恩节。记住，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

表面上看起来，霍华德如祖父般和蔼慈祥，可实际上他却是个充满怨气、感觉被生活欺骗了的老人。他在新英格兰电力系统公司里干了大半辈子，却一直未能担任要职，对此他心怀怨恨。他絮絮叨叨地对我说：“他们无视我的存在，就因为我不买公司政策的账。”他被迫退休。可是退休后他又忍受不了天天和老伴呆在家里那种无聊的感觉，于是便接受了美因公司的这份咨询工作，这是他第二次被选派外出。艾纳和查理都提醒我对霍华德要提防着点，他们说那是个顽固并且睚眦必报的家伙。

果不其然，霍华德是我遇到的最聪明的一个老师，尽管当时我尚未准备好去接受这个事实。他从来就没有接受过类似克罗汀给我上的那种培训课程。我想他们可能认为霍华德太老了，或者是太顽固不化，又或者是他们聘请霍华德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像我这样愿意听命于他们、又愿意长期合作的人。无论如何，从美因公司的角度来看，他现在反倒成了一个问题。霍华德很清楚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和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他坚决不做别人手中的棋子。艾纳和查理用来形容他的那些词语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倔强来自于不甘心为他人做奴仆的决心。我怀疑他是不是曾经听说过经济杀手这个称谓，因为他似乎清楚，美因公司要利用他去鼓吹一种帝国主义，这是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

有一次，我与查理见面后，霍华德将我拉到一边，他戴着一个助听器，用手摆弄了一下衬衣下面用来调节音量的小盒子。

“你可别告诉别人啊。”霍华德轻声说。我们站在办公室的窗户旁边，从窗户向外望去，可以见到那污浊的运河，蜿蜒曲折地从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大楼旁边穿过。一个年轻女子在污秽不堪的河里洗澡，身上松垮垮地披着一条布裙，这让她看起来不至于一丝不挂。“他们要说服你相信这个国家的经济会突飞猛进。”霍华德说，“查理这人很无情。别让他影响了你。”

他的话让我情绪低落，可同时让我产生一种要说服他的冲动。查理其实是对的，毕竟我的事业是建立在讨好美因上司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了，以后这里的经济可能会很繁荣。”我说，我的目光转而投向河里的那个女子，“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原来你已经到那个地步了。”他嘟哝了一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幕，“你已经在执行公司的路线了，对不对？”

忽然，运河里发生的一幕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个年长的男人突然走到河岸边，他脱下裤子，蹲在岸边方便起来，他的排泄物都落到了水里。刚才那个女子虽然看到了，可是她似乎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她仍然洗她的澡。我转过头看着霍华德。

“我也算是经验丰富的，”我说，“尽管我很年轻，可我在南美洲呆了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3年。南美洲的石油资源被发现以后，我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变化——惊人的变化。”

“哦？我可也是见过世面的。”他用嘲讽的语气说，“我可不关心你的那些发现和变化。我这一辈子都在作电力负荷预测——经济大衰退时期、‘二战’时期、经济繁荣时期、萧条时期。我也亲眼目睹了那个‘128公路’^①（所谓的‘马萨诸塞州奇迹’）为波士顿带来的后果。我敢肯定地说，在任何一个时期内，没有哪个地区的电力负荷能以每年7%~9%的速度增长。形势最好的时期也不过如此。6个百分点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盯着他，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也许他是对的，可是我得为自己辩护。我知道我必须说服他，因为我自己的判断迫切需要被证实是对的。

“霍华德，这里不是波士顿。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人人都用得上电。”

他转过身去，摆摆手，好像要把我挥出去一样。

“那你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他大声吼着，“你去出卖你自己的灵魂吧。我不在乎你拿出的数据是什么。”他一把拉出桌子后边的椅子，坐了下去，“我会根据自己的想法来作电力预测，而不是某些人提供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数据。”他拿起铅笔，在一叠纸上画了起来。

我知道这是我必须面临的挑战。我走到他桌子跟前。

“如果我作出众望所归的预测结果，像加州淘金热那样的繁荣景象，而你却把你的预测作得像波士顿在60年代那样的发展速度，那不是很矛盾么？”

他把铅笔往桌上一扔，瞪着我。“没良心！事实就是这样。你还有你们所有人……”他在办公室里挥舞着手臂，“你这不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么？你只是为了钱而工作。现在，”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把手伸到衬衫底下的助听器上，“我把助听器关掉，继续作我自己的电力预测。”

我彻底被他镇住了。我只好大步走出他的办公室，朝着查理的办公室走

^①128公路（Route 128）：与“硅谷”齐名的国际高科技园区。波士顿“128公路”是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史上的传奇，以计算机及国防工业为主，大多是大型跨国企业。——译者注

去。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我不知道自己去那里会得到什么结果。于是，我转身走下楼梯，走到门外，沐浴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运河里的那个女子爬上了岸，布裙已经紧紧地围在她身上。那个老人也消失了。几个小男孩在运河边上大喊大叫着，互相泼水嬉戏。一个年纪稍大的女人站在刚刚没过膝盖的水中刷牙，还有一个女人在河里搓洗衣服。

我一阵哽咽，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在一块断裂的混凝土石板上坐下，强忍着泪水。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会如此痛苦。

“你只是为了钱而工作。”我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响起霍华德的话。他这句话一针见血，直刺我的要害。

那几个小孩子继续泼水嬉戏，他们欢快的声音弥漫在空气之中。我不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做才可以像他们那样无忧无虑。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在上天恩赐的纯真中欢声雀跃，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在这一潭污水中玩耍的危险，而此时霍华德的那句话不停地折磨着我。一位驼背老人，拄着一根粗糙的拐杖，沿着岸边蹒跚走过，走着走着，他停了下来，看着河里那几个小男孩，咧开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微微地笑着。

也许我该相信霍华德，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些许的轻松，抓起一块小石头，用力朝远处水面扔出去。当水面重归平静的时候，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我知道自己不能那样做，我不能让自己以后的生活像霍华德那样年纪一大把了，却落得如此境地。我还年轻，刚刚迈出职业生涯的第一步，面临很多的选择。

凝望着那一潭死水，我眼前再次浮现出新罕布什尔州半山腰上预备学校的景象，当同学们都去参加社交舞会的时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学校度过漫长假期。慢慢地，那种孤独感再次向我袭来，可我却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不断重现我生命出现过的人，霍华德、查理、克罗汀、安、艾纳、弗兰克叔叔……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这些人出现，我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我会住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在印度尼西亚。那么未来的我会是什么样子，我将会到哪里去？我苦苦思索

着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查理说得很明白，他希望霍华德和我共同作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约为 17% 的报告。我究竟会作出怎样的预测呢？

突然，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这让我的灵魂得到一丝安抚。为什么刚才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呢？根本不需要我来做决定。我可以为了讨好上司作出乐观的经济预测，而霍华德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预测。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对整个综合规划毫无影响，因为决定早就已经定下来了，我们要做的只是按既定的步骤走走过场而已。包袱终于卸掉了，那一晚，我睡得很安稳。

几天之后，霍华德突然因为阿米巴病毒^①而患病了。我们把他送到天主教教会医院。医生给他开了药，建议立刻把他送回美国治疗。霍华德安慰我们说，他已经掌握了作预测所需要的所有数据，他能在波士顿轻而易举地完成电力负荷的预测工作。他告别时对我说的话，只不过是重复了他之前对我的警告。

“没有必要伪造数据，”他说，“不管你把经济增长描述得如何的天花乱坠，我也不愿意卷入那个阴谋！”

①阿米巴病毒 (Amoebic Attack)：通常指阿米巴痢疾，肠阿米巴病。主要寄生于肠道，大部份感染者症状不明显，但痢疾阿米巴可能引发肠道症状，轻微者腹部不适，重者伴随发烧、寒颤，也可能发生次发性肠外感染。——译者注



第二部分

1971—1975 年

第 5 章

当了一回审判官

美因公司与印度尼西亚政府、亚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签订了合同。合同要求我们团队的人必须到综合规划涉及到的所有居民点走一趟，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如查理所说，“在亚马逊森林你都能活下来，你应该最清楚怎样对付蛇虫鼠蚁和劣质水。”

我和司机、翻译一起去印度尼西亚许多美丽的地方游玩，也在一些阴暗破旧房子里待过。我与当地商业和政治领导人见面，听取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但是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跟我讨论，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欢迎我的到来。通常，他们都建议我去找他们的上级，找政府官员，或者找这些企业在雅加达的总部，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卷入了某种阴谋之中。

每次的外出旅行持续时间都很短，一般不会超过两三天。期间我会回到万隆的国家大厦。管理大厦旅馆的女人有个儿子，比我小好几岁，他的名字叫拉斯曼（Rasman），可是除了他的母亲之外，别的人都叫他雷西（Rasy）。他在当地一所大学读经济学，很快他就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与我的接触谋个出路，找份工作。他还教我讲印度尼西亚语。

从荷兰手中夺回主权之后，苏加诺总统希望印度尼西亚有自己的官方语言，而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有超过 350 种方言。苏加诺总统意识到，为了将

这些居住在不同岛屿上、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团结起来，印度尼西亚必须有通用的词汇和语言。他聘请了一个国际语言专家组进行研究，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①就是最大的成果。在马来语的基础上创造的印度尼西亚语，去除了许多时态变化、不规则动词和其他许多语言共有的复杂元素。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都会讲这门语言，尽管他们仍在自己的社区里继续讲爪哇语和其他本地方言。雷西是一名极具幽默感的老师。相对于殊瓦语，甚至西班牙语来说，印度尼西亚语要简单得多。

雷西有一辆小型摩托车，他大胆地说要带我去看看这个城市和这里的居民。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带你去见识见识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面。”然后他就催促我坐上他的摩托车。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演影子戏的人、演奏传统乐器的音乐家、耍火把把戏的表演者、魔术师，还有一些摆摊的街边小贩，他们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你能想象得出来，从走私的美国卡带到一些稀罕的本土手工艺品。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挤满了年轻人的小咖啡店，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发型都紧随60年代末的潮流——让你感觉身处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的演唱会，只不过现场都是印度尼西亚人。雷西和我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他们都会说英语，有人说得挺流利，有的则比较生硬，可他们都对我学习印度尼西亚语的行为表示赞赏和鼓励。他们互相之间讨论这个问题，还问我为什么别的美国人从来不学印度尼西亚语言。我答不上来，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除了我之外，在这一带没有任何其他来自欧美国家的人。尽管在高尔夫和网球俱乐部、豪华的饭店、电影院和高消费的超级市场里，可以看到许多欧美人的身影。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晚上。雷西和他的朋友们完全将我当作他们的挚友。与他们一起，我享受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分享着他们的城市、食物、音乐，呼吸着丁香烟和其他一切属于这个城市年轻人生活的气息，与他们一起喧哗，一起欢笑。我仿佛再次回到了美国和平队。但与此同时，我也

①Bahasa，在印尼语中是“语言”之义。例如 Bahasa Malay，就是马来语。——译者注

在叩问自己，为什么我一定要坐头等舱？为什么我一定要将自己与这些人区别开来？当我与这些印度尼西亚人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不断地追问我对他们的国家的感受，对美国打越战的看法。他们中每个人都对越战感到厌恶和恐惧，他们称美国进攻越南是“非法侵略”。我告诉他们我也有同感，这也让他们倍感欣慰。

雷西和我回到宾馆时已经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很感谢他的邀请，让我能亲身感受属于他的世界，他也感激我对他朋友的坦诚。我们互相约定以后还要去那里，去参加那些印度尼西亚朋友的聚会。互相拥抱之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

这个时候，我希望自己能远离美因的工作。和雷西一起，正好对了我的胃口。第二天一早，我与查理会面时告诉他，对于从当地人那里搜集的信息我是越来越没有信心，只有雅加达政府办公室里我有需要用来开展经济预测的数据。查理同意了我的观点，他也认为我应该在雅加达多呆上一两个星期。

查理对我深表同情，因为我不得不开离舒服的万隆，再次回到热气腾腾的雅加达市区，我假装说我也讨厌这样。可是私底下，我却兴奋不已，因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可以继续去研究雅加达这个城市，继续住在格调高雅的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我发现，只要身处雅加达，我就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生。与雷西以及他的朋友们共度的那个晚上，还有我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方的旅行，使我改变了不少看法，对自己的美国同胞有了不同的看法。公司管理人员那些年轻美貌的妻子，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游泳池和酒店旁边的铁栅栏此时也显得很碍眼，酒店附近那些别致餐馆的精美食物也变得索然无味。

我还发现了一些别的情况。我与当地政治和商业领导者见面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十分微妙。我之前从未觉察到这一点，可现在我发现他们中多数人对我的存在表示怨恨。比如说，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用一个与“审判官”和“调查员”意思相近的词——我从词典中得知该词。我刻意隐瞒我懂一点印度尼西亚语的事实，连我的翻译也只知道我只不过懂得一些日常用语。我还买了一本很好的印度尼西亚语-英语词典，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通常我一转身，就背着他们翻词典。

这些用来称呼我的词，是读音上的巧合还是我词典的误译？我企图说服自己确实是那样。可是我和他们接触得越多，我就更加肯定，他们把我看作是一个入侵者，而且可能有某些人已经下达命令要求他们与我合作，而他们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这些人可能是某位政府官员、银行家、将军或美国领事馆。我只知道，尽管我被盛情邀请到他们的办公室，而且还有人给我斟茶倒水，客气地回答我的提问，然而所有这些表象背后却充满了怨恨。

对于我提出来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及提供数据的真实性，都让人生疑。例如，当我要见当地某个官员时，不仅要提前预约，而且我还不能和翻译一同跨进他的办公室，这本身看起来就很奇怪。除此之外，预约造成时间的浪费也让人无法容忍。由于电话通常都接不通，我们只好开车穿过那拥挤无比、乱七八糟、纵横交错的街道，至少要折腾 1 个小时，才到达近在咫尺的另外一幢大楼。到了那里，我们还要先填写几张表格。最后，一个男秘书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会很客气地（一向都是那样客气）对我露出爪哇人招牌式谦恭的笑容。他首先问我需要哪一类的信息，接下来他就给我约定一个具体会面的时间。

每一次几乎都毫无例外，他安排的会面时间总要在预约的几天之后，而每当预约时间到了的时候，就会有人递给我一个预先准备好的文件夹。工业企业方面的人给我的是五年和十年计划书，银行家给我的是图表和曲线图，政府官员呢，则是那些跃然纸上，即将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的工程项目清单。所有这些商业领袖和政府官员提供的资料及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要证明爪哇的经济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任何一个人对此都深信不疑。

回到万隆的时候，我对这一切还是疑惑不解，这些事情实在是烦扰人心。我突然觉得我在印度尼西亚所有的经历更像是一场玩扑克牌游戏而不是现实，每个人都藏起了自己手中的牌，互不信任，更不要说共享的信息有多高的可靠性。可这场游戏必须继续玩下去，而且游戏的结果将会影响印度尼西亚人民未来几十年的生活。

第 6 章

受审的文明

“我带你去找达朗（Dalang）。”雷西面带微笑地说，“你知道吗，达朗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木偶大师。”很明显，他对我重回万隆感到十分高兴，“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人物出场。”

他骑着摩托车，载着我穿过这个城市里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穿过传统爪哇部落居民区的茅屋，那些房子看起来就像一些破旧的、房顶铺着瓦片的小寺庙。而那些荷兰殖民时期盖起来的庄严大楼在这里无迹可寻。这里的人都很穷，可是他们都非常自豪：他们穿着破旧却洗得很干净的蜡染布裙、颜色鲜艳的罩衣，戴着宽沿草帽；每到一处，迎接我们的都是欢快的笑声；我们停下来时，小孩子们都冲上来，争相触摸我的牛仔裤，一个小女孩将一朵气味芬芳的鸡蛋花别在我的头发上。

我们把摩托车停在一个路边的戏院旁，几百人聚集在这里，一些人站着，一些人坐在折叠板凳上。那天晚上天气很好，夜空也很美丽。尽管我们身处万隆最古老城区的中央，却看不到一盏街灯，在我们上空闪耀着的只有星星。空气中弥漫着柴火、花生和丁香花的气味。

雷西消失在人群之中，很快他带着上次我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些年轻人回来了。他们还给我带来热茶、小蛋糕和沙嗲——用花生油烹制的一种烤肉块。一开始我看到沙嗲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因为其中一名女孩指着一个火堆笑着对我说：“这是非常新鲜的肉，刚刚烤好的。”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音乐响起了，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奇幻“加麦兰”（gamelang）奏出的绝妙声响，加麦兰是一种乐器，外形让人一看就会想起寺庙里的钟。“所有的音乐都由达朗一个人演奏。”雷西轻声说，“他操纵着所有的木偶，为所有木偶配音，还使用几种语言呢。我们来帮你翻译吧。”

这是一场让人难以忘怀的演出，融合了印度尼西亚经典传说和当今的时事。后来我听人说，达朗其实是个萨满教巫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催眠状态下完成的，他有差不多 100 个木偶，还能为每一个木偶模拟出不同的声音。这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夜，也是影响我以后人生的一夜。

演完了古老的《罗摩衍那》中经典的一段传说之后，达朗拿出一个“理查德·尼克松”的木偶，这个木偶长着夸张的长鼻子和松弛下垂的脸颊。这位美国总统一副典型的山姆大叔装扮——戴着一顶星条图案的大礼帽，穿着燕尾服，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木偶，身穿三件套的细条纹西装。第二个木偶手中拿着一个木桶，上面镶着一个美元符号，另外一只手在“尼克松”头顶上挥舞着一面美国国旗，就像一个卑躬屈膝的奴隶在为主子扇凉。

两人中间，出现了一幅中东和远东地区的地图，各个不同的国家用钩子吊在相应的位置。“尼克松”立刻靠近地图，一把将“越南”从钩子上取下来，丢进自己的嘴巴里。他还一边大声喊叫，大致的内容可以翻译为：顽固！垃圾！我们再也不需要它了！然后他把“越南”扔到桶里，准备继续对其他国家重复刚才的举动。

可是，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他选择的国家并非是东南亚国家，而全部是巴勒斯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这样的中东国家。把这些一一拿下之后，他接着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如法炮制。每次把一个国家放到桶里之前，“尼克松”都会大声嚷嚷着，嘴巴里冒出来的都是些咒骂穆斯林的词儿。

观众异常激动，桶里每装进一个国家，气氛中就添加了一份紧张。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被操纵木偶的人的话语激怒了。我也感觉到威胁，我站在人群中，感到孤立无援，我害怕成为他们众怒之的。接着那个“尼克松”说了几句话，雷西翻译给我听后，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把这个扔给世界银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印度尼西亚弄点钱出来。”他将“印度尼西亚”从地图中取下来，准备将它投进桶里，可就在那当儿，又一个木偶从黑暗中跳了出来。这个木偶是个“印度尼西亚人”，穿着蜡染的布衫和卡其色的宽松长裤，还戴着一个上面清楚地写着一个名字的标志。

“这是万隆有名的‘政治家’。”雷西解释说。

这个木偶飞似地走到“尼克松”和拿着桶的人中间，抓住“尼克松”的手。

“且慢！”他大声说，“印度尼西亚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人群中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个拿着桶的人举起手中的旗帜，向刚才扑过来的那个“印度尼西亚人”用力刺去，那个“印度尼西亚人”很戏剧性地中招死去。围观的群众中发出一片嘘声、怒骂声和尖叫声，他们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尼克松”和拿桶的木偶站在台上，面朝着观众。他们鞠躬后离开了舞台。

“我想我该走了。”我对雷西说。

他把手绕在我的肩膀上。“好的，”他说，“他们不会对你有恶意。”可我不敢确定。

后来我们去了咖啡馆。雷西和其他人都说，他们预先不知道演出的是“尼克松——世界银行”这一幕。“你根本就没法预先知道木偶戏要演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年轻人说。

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幕是不是特意演给我看的呢？他们中一人笑了笑说我真是够自大的。“典型的美国人。”他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背，加了一句。

“印度尼西亚人很懂政治，”坐在我旁边椅子上的人说，“难道美国人不是这样做的吗？”

我对面坐着一个在大学主修英文的漂亮女孩子，她问我：“可是你现在确实是为世界银行工作吧？难道不是？”

我告诉她我目前是为亚洲开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

“难道它们不是一回事吗？”她根本没有给我回答的机会，“难道那不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是像今晚的木偶戏演的那样？难道你们的政府不是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仅仅看作是一串儿……”她搜肠刮肚找着适当的词。

“葡萄。”她的一个朋友教她说。

“对了，就是一串葡萄。你们可以摘下来慢慢挑选。留出英国，吃掉中国，扔掉印度尼西亚。”

“当然是在你们开采完我们所有的石油之后。”另一个女孩子说。

我想为自己辩解，可我觉得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我想，我能来到万隆的这个角落看那一场反美的演出，至少也能为自己赚回一点优势——那场演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可算是人身攻击。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多么勇气可嘉才做出以上的一切；我也想让他们知道，我是那个团队里唯一愿意花工夫学印度尼西亚语、愿意接受他们文化的人；我也可告诉他们，我是唯一一个愿意观看这种演出的外国人。可我想还是谨慎为妙，不要轻易表达这样的意思。于是，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的交谈中，我问他们为什么美国要单单挑出穆斯林国家，除越南外。

那个漂亮的英语系女孩笑了，“因为那是美国的计划。”

“夺取越南不过是个阻挠行动，”一个男子插话了，“就像荷兰对于纳粹来说，是块垫脚石。”

“真正的目标是整个穆斯林世界。”那个女孩子接着说。

我想我再也不能对此毫无反应了。“可以肯定的是，”我抗议说，“美国不是反伊斯兰的。”

“噢，难道不是吗？”她说，“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得读读你们历史学家一个名叫汤因比的英国人的著作。50年代的时候，他预言，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将是下个世纪最主要的战争之一。”

“阿诺德·汤因比这样说过？”我愣住了。

“是的。看看汤因比的《审判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和《世界与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吧。”

我接着问：“为什么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仇恨会那么深呢？”

围着桌子坐着一圈的人互相对望着，看起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居然

问了一个如此愚蠢的问题。

“因为，”她一字一顿地说，好像面前的我是一个弱智者又或者是耳背一族，“西方国家尤其是其领导国美国决心要控制整个世界，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美国离成功已经不远了，虽然现在前苏联还挡着美国的路，可是苏维埃坚持不了多久，汤因比看出了这一点。因为前苏联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他们的背后没有坚强的精神支柱。历史证明了信仰——灵魂对更高层次的力量的信念是很重要的。我们穆斯林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坚定，甚至比基督徒更坚定。我们在等待时机，我们会变得更强大。”

“我们不着急，”其中一个男人插话，“我们会像蛇那样反攻。”

“这种想法真恐怖！”我实在是忍不住叫了起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改变这个局面呢？”

这个英语系的学生看着我的眼睛，“收起你们贪婪的心，”她说，“还有你们的自私。清醒一下，除了你们的摩天大楼和超级市场外，这个世界还有更多事情值得关注。在你们担心自己的汽车是不是还有汽油的时候，有些人却几乎要饿死；而你们伸手翻阅时尚杂志的时候，多少婴孩因为没有水喝而大声啼哭；我们国家的人民因为贫困快要死去的时候，你们却对我们的求救声充耳不闻。你们的出路是去帮助那些穷苦和被压迫的人，而不是继续将他们赶到更加水深火热的贫困中去，继续让他们受你们的奴役。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再不改变，你们就注定要完蛋了。”

几天后，那位深得民心的万隆政治家，即木偶戏中勇敢站出来抵抗“尼克松”，被拿木桶的人刺死的“政治家”，不幸被车撞倒身亡，而肇事司机事后逃之夭夭。

第 7 章

截然不同的耶稣

我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那天晚上达朗在万隆表演木偶戏的情景，那个漂亮的英语系女生的话也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那个晚上的经历，让我的思想跃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当然我还不至于完全忘掉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所肩负的任务，只不过此刻我的反应完全被情绪所控制。通常我都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让自己冷静下来，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慰藉，或者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自制力控制情绪。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之常情，艾纳、查理、我和其他所有人在做的，都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赚钱养家活口，照顾自己以及亲人。

与那一班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讨论，逼着我要正视问题的另一方面。透过他们的眼睛，我意识到，美国所谓的援助政策对于帮助像印度尼西亚这样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目光短浅的。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要搜集用于经济预测报告的资料，我就必须到雅加达去。我把空闲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将这些写成日记。我在雅加达的街道上溜达，不时向街头的乞丐施舍一些零钱，我还尝试着去接近麻风病人、妓女和街童，与他们聊天。

同时，我开始反思外国援助的本质。究竟在帮助不发达国家（LDCs）减轻他们的贫穷与困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DCs）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合理？我还想知道，外国援助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只不过是

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与私欲。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援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如果不是的话，这种状况要怎样才能改变。我肯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帮助全球受疾病和饥饿困扰的人，可我也同样肯定，我们采取援助政策的目的是很少是帮助这些受苦的人，如果美国曾经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念头的話。

我也总是在问我自己：即使美国援助外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难道这就是不道德的吗？我发现自己时常妒忌像查理那样的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制度绝对信任，所以不遗余力将美国的政策强加给别国。我怀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否让全世界人都过上像美国人那样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在美国境内也有千千万万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另外，我也并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的人是否真心想要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美国国内关于暴力、经济衰退、滥用毒品、离婚和犯罪的数据也说明了：尽管我们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也许是最不快乐的国家之一。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迫别人模仿自己？

这些问题克罗汀也许早已给了我提示，但我还是不确定，她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我在日记中写道：

在美国，还有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我们的美好生活——当然，获得最多好处的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我们赖以生存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都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这样不发达国家，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少之又少。外国援助所发放的巨额贷款只能确保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子孙后代都变成美国的“人质”。这些国家不得不让美国公司肆意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也不得不忍痛把国内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设施建设计划放在一边，而是首先偿还我们的债务。但实际上，我们的公司已经从发电站、机场和工业园等建设工程中回笼了绝大部分资金，尽管计算贷款的公式中并没有算上这些钱。难道“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借口就意味着我们是无罪吗？也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许有人会说“不知情”，也许因为有人故意误导，总之有很多借口，
但能说你是无辜的吗？

当然，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尽管我也是“不知情者”中的一个。

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词让我感到不安，可是我思考得越多，我就越肯定它迟早会发生。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伊斯兰圣战真的爆发了，那会是一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走在最前沿的是穆斯林而已。我们这些发达国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却是自然资源的供应者。由此可见，殖民主义时期的重商体系卷土重来，众所周知这种体系的特点是强权掠夺，像海盗一样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抢掠。

我并没有随身携带汤因比的书，可我学过的历史知识也足以让我明白：那些被剥削、被压榨的人们，总有一天会奋起反抗。只需回顾一下美国的独立战争，汤姆·潘恩就是一个绝好的典范。我记得历史书指出，在殖民时期，英国以向殖民地提供军事保护、帮助殖民地居民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为由向他们征税，而殖民地居民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

潘恩在他那本出色的《常识》(Common Sense)^①中，向他的同胞展现的就是我遇到的年轻印度尼西亚朋友们所说的灵魂：一种意识，一种对至高权力的信念，也是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这种信仰与英国的君主专制以及杰出人物的统治论等截然不同。穆斯林所体现出来的也一样：对至高权力的虔诚，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无权压制和剥夺其他国家的灵魂和信念。像独立战争时招之即来的民兵^②一样，穆斯林一旦遭受威胁便立即奋起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斗争。然而，我们却如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殖民者那样，将这种

①《常识》(Common Sense)：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潘恩写了以“北美的危机”为题的系列文章，分为十六小册，发表于1776-1783年之间。他把这些小册子称为《常识》。——译者注

②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和独立战争期间承诺在接到通知后即行作战的民兵。——译者注

反抗行为称之为“恐怖主义”。我想知道，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将所有用于殖民战争，如越南战争上的钱都用于消除世界贫穷和饥荒上，用于包括我国人民在内的全球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医疗上，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致力于为人减轻痛苦，保护河流、山川、森林、空气以及人类灵魂和肉体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后代将会多么感谢我们。我不相信，美国的开国元勋当年所展望的对生存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仅仅为美国人而存在。而现在，我们为什么还想要去建立我们的国父们当年曾苦苦反抗的帝国主义国家呢？

在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晚，我从梦中惊醒。我坐在床上打开灯，看着洲际酒店房间里熟悉的一切：桌椅、蜡染的编织画以及挂在墙上用相框装裱起来的木偶。刚才的梦境仍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看见基督站在我面前（我小时候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对着基督像祷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刚才梦见的基督与儿时看到的那个基督非常相像。不同的是，我儿时看到的基督是白皮肤、金发，有一双碧绿色的眼睛，而我现在看到的基督，却披着黑发，皮肤黝黑。基督弯下腰，把一件东西放到他的肩膀上。我想那应该是个十字架，可是我却看到一个汽车轮轴，上面的轮圈向四周突出，在他的头顶上形成一个金属“光环”，润滑油像鲜血一样从上面滴下来，落在他的额头上。他站直了身体，凝视着我的眼睛，开口说：“如果我现在出现的话，你将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我。”我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世界已经改变了。”

墙上的时钟提醒我黎明快来了。我知道我再也睡不着，于是起来穿戴整齐，坐电梯到下面空荡荡的酒店大堂，慢慢走进游泳池旁边的花园里。皓月当空，空气中弥漫着兰花的淡淡幽香，我找到一张长凳坐下，冥思苦想，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为什么偏偏是印度尼西亚？

我尝试与安和解，我在返回美国之前去了一趟巴黎，与她一起度假。可就连在巴黎的假期里，我们也还是不断争吵。尽管我们相处非常愉快，但也逐渐明白，长期压抑的愤怒和怨恨已经形成了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除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此以外，我还有这么多不能向她坦白的秘密。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只有克
罗汀了，我常常想起她。安和我乘坐的飞机在波士顿的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降落，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回到“后湾”住宅区，下车后我们分道扬
镳，各自回到自己的公寓里。

第 8 章

一生难求的机遇

返回美国的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到保诚大厦公司总部报到，在拥挤的电梯中，我听说我们那个年届 80 的首席执行官麦克·霍尔（Mac Hall）把艾纳提拔为公司在俄勒冈波特兰办事处的总裁，这样一来，我就要直接向布鲁诺·扎姆波蒂报告我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情况了。

布鲁诺满头银发，看起来和艾纳一样的聪明睿智。他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所有敢于向他发起挑战的人，因此他有着“银狐”的绰号，同时他还有着像加利·格兰特（Cary Grant）^①那样潇洒的外表。

他精通计量经济学，是美因公司负责电力分部以及大多数国际项目的副总裁。在他的导师——年迈的杰克·都伯（Jake Dauber）退休之后，他自然是最好的继位人选。美因公司的许多员工对布鲁诺·扎姆波蒂既敬畏又惧怕，我也不例外。

可偏偏在午餐之前，我被传召至布鲁诺的办公室。我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计划。突然，他说了一句让我大感意外的话，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我要解雇霍华德·帕克，他完全与现实脱节了。”布鲁诺的手在桌上的一叠纸上轻轻敲着，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一年才增长 8 个百分点，那是他的电力负荷预测。你会相信在印度尼西亚那样一个有潜力的国家，仅

①加利·格兰特（Cary Grant）：好莱坞著名影星，以其绅士风度著称。——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仅只有八个百分点？”

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他盯着我的眼睛，“查理·伊林沃斯告诉我，你的经济预测能证明负荷增长将达到 17%~20%，对不对？”

我对他说确实如此。

他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恭喜你，你升职了。”

也许那时候我应该走出办公室，跑到一家高级餐馆与美因公司的同事一起好好庆祝一下，或者至少我也该为自己庆祝一下。可是，我只想到克罗汀。我迫不及待要告诉她这个喜讯以及我在印度尼西亚的经历。但是我很失望地发现她的电话接不通，分机号码已经不存在。于是，我决定去找她。

一对年轻夫妇住进了她原来的公寓。当时是午饭时间，但看样子我把他们从梦中吵醒了。他们显然很恼火，声称并不认识克罗汀这个人。我找到地产中介公司，对他们说我是克罗汀的堂兄。可是中介公司的租赁记录上却没有任何关于曾经给克罗汀租过房子的记录，他们告诉我，这所公寓的上一个租客是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男人。我回到保诚大楼的美因人事办公室，人事部门也说没有任何有关克罗汀的记录，但是他们承认那里有一份我无权查看的“特别顾问”档案。

那天下午，我感到心力交瘁。回到空荡荡的家里，我感到莫名的寂寞，好像被人抛弃了一般。我的升职似乎也变得毫无意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升职不过是我甘心与他们为伍的标志。我倒在床上，几乎要被绝望所吞噬。克罗汀利用了我，又抛弃了我。我决心不向痛苦低头，我要放下我所有的情感。我躺在床上，连续几个小时漠然地望着四周空荡荡的墙壁。

最后，我终于让自己振作起来。我爬起床，灌下一瓶啤酒，然后狠狠地把酒瓶砸到墙上。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下面街道，似乎看到克罗汀正朝着我走过来。我立刻朝大门跑过去，然后又跑回窗子旁边，朝外边看了一下。那个女人走得更近了，我看清了她的脸，她长得与克罗汀有几分相像，但不是克罗汀。我感到非常失望，刚才的那种愤怒也变成了沮丧。我的头昏昏沉沉的，眼前出现了克罗汀戴着枷锁、倒在枪林弹雨中的景象，我用力甩了甩脑袋，想要甩掉这可怕的景象。后来，我吃了两片安定，继续喝酒直到醉

倒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美因公司人事部的电话把我从梦中叫醒。人事部长保罗·莫米诺（Paul Mormino）对我说，他知道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可他却催我下午到办公室去一趟。

“恭喜你，”他说，“这是自我超越的绝好机会。”

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我发现布鲁诺说得一点都不假，我不但晋升到霍华德从前的职位，还获得“首席经济师”的头衔，另外还有加薪——这多少让我情绪高涨一点。

下午我请了假，一个人提着一瓶啤酒徘徊在查尔斯河畔。我坐在河边看着帆船飘过，调整着时差，也舒缓着宿醉的煎熬。我说服自己，克罗汀不过是完成了培训我的任务，去继续执行下一个任务而已。过去她总是不断地强调保密的必要，她会找我的，莫米诺是对的。我的时差反应、我的焦虑——顿时都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克罗汀，不去想我和她之间的一切。我非常专注地写有关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报告，修改霍华德的电力负荷预测。我相信，我提交的报告上司们绝对爱看：关于新的电力系统建立后，印度尼西亚在25年里的电力需求量预测。在头12年里，电力需求量每年增长19%；在此后的8年里，需求量降低到17%左右；在最后的5年里，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率。

在正式会议上，我向国际权威机构展示了预测结果。这些机构的专家组仔细而且毫不留情地向我提了许多问题。那时候，我的感情创伤已经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决心，这种决心与我在预科学校时候所作的决定有几分相似——不是反叛而是寻求使自己受人瞩目的机会。尽管如此，克罗汀的形象却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整个下午，我都在应对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位年轻的经济师针对我的预测报告进行的没完没了的盘问，这让我想起几个月之前克罗汀给我的忠告，当时我们一起坐在她培根街的公寓中。

“谁能真正预见25年之后的未来？”她问我。

“你的预测和那些专家们的一样出色。信心就是一切。”

一个经济系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于是，我告诉自己要自信，确信自己是一个专家，不要忘记自己曾在发展中国家生活过，我的经验比那些坐在评判席判断我预测结果的专家们都多，虽然他们中有些人的岁数可能是我的两倍。我曾在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里待过，也探访过爪哇岛上其他人想都不愿想的地方，还学过专门针对经理以及主管人员设计的精深计量经济学课程。我告诉自己，我是新时代的青年才俊，就连曾任前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约翰·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长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非常欣赏我。因此，尽管面前专家如云，我仍在数字统计、概率论、精确建模的基础上一步步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当然，这其中有不少虚张声势的成分。

在演说的时候，我刻意地模仿麦克纳马拉以及我的顶头上司布鲁诺。我结合了前者的演讲技巧以及后者的夸张神态。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惊叹我那时的胆量。实际上，我的专业知识十分有限，可是我的胆量弥补了我专业知识的不足。

这一招确实管用。最后，在场的所有专家都在我的报告上签名表示认可。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在德黑兰、加拉加斯、危地马拉城、伦敦、维也纳和华盛顿特区参加各种会议。我与许多名人会面，包括伊朗国王，几个国家的前总统以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由于我的首席经济师的头衔以及我最近在国际借贷机构面前出色的表现，使我获得了所有人的尊敬，这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

我被这种感觉冲昏了头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像梅林^①一样的魔术师，只要手中的魔杖一挥，就可以让地球上每个角落灯火通明，百业兴旺。可我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我开始质疑自己以及所有同事的真正动机。我的头上戴上了被美化了的经济师头衔或博士学位，但是这些对理解雅加达臭水潭附近的麻风病人的内心痛楚毫无帮助。我不知道是否掌握了驾驭数据的诀窍就可以控制他人的未来，我对那些运筹帷幄、改变世界的决策者越了解，

①梅林(Merlin)：亚瑟王(King Arthur)传说中亚瑟王的顾问，是一个魔术师和预言家。——译者注

就越怀疑他们真正的能力和目的。在会议室里，我看着周围的每一张面孔，一股无名的怒火油然而生。

但是，这些愤怒最终还是消失了。我的心情平静下来，我意识到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甚至觉得，为了国家、为了儿女，他们必须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他们的后代也必须接受这种观念。

同时，我也知道我的立场不够坚定，一方面，我把这些人看作是真正的阴谋家；另一方面，我将他们视作关系密切、共同致力于控制全世界的弟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把他们看作是美国内战前的南部种植园主。由于是与仆人、奴隶一起长大，因此他们从小就在那种环境中耳濡目染，相信自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驯服“野蛮人”，并且改变其信仰和生活方式。也许农场主们本身并不喜欢奴隶制度，但他们和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一样，把奴隶制看作是一种需要，如果没有这种制度，社会将陷入混乱。当代政治寡头，也就是我所说的“公司帝国”的领导者，看来也是这么想的。

我想知道，战争、大规模武器生产、截流建造大坝和破坏原始环境及文明，这种种行为究竟可以让谁得到恩惠；我也想知道，在其他因为饥饿、缺水和疾病失去生命的时候，究竟是谁得到了好处？渐渐地，我明白了：最终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得到丝毫好处。可就目前来看，那些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象我的上司和我至少获得了物质上的好处。

这也引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状况，而且还持续了这么久，难道强权真的就是真理？

如果单说权力就能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尽管目前的许多现象都可以用“强权就是真理”这句话来描述，可我总觉得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更强大的力量在其中运转。我想起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他来自印度北部地区，他的课程内容包括对地球有限资源的研究、人类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苦役法则”。依照他的说法，所有资本主义体制都有着等级森严的制度：处于最顶端的一部分人，控制着下面的人，而数量庞大的工人队伍处于最底层。从相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人都是奴隶。最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提倡和推广这一套体系，是因为公司帝国坚信上帝让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站在资本主义金字塔上最顶端的位置，并让他们向全世界推广公司帝国的体制。

当然，我们并非始作俑者。从古代北非、中东和亚洲古老帝国的君主，到波斯、希腊、罗马的国王，再到基督教的十字军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所有帝国的缔造者，这股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而且将继续成为多数战争、污染、饥荒、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同时也导致了他们自己国家人民的道德沦丧，社会动荡——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几个国家和文明都有着极高的自杀率、毒品横行并且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些问题，但同时又想使自己忘却我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努力尝试忘掉自己是一个经济杀手的事实，我希望自己只是一位首席经济师。这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我还要进一步证明我的身份，我可以瞧瞧自己的工资单：全部是美因公司这个私营企业开出来的。我从来没有从国家安全局或者其他任何政府机构得到一分钱的报酬。于是我就对这一切确信不疑。

一天下午，布鲁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向我走过来，站在我的椅子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做得非常好，”他说，“为了表示我们对你的赏识，你将得到一个一生难求的机会，几乎没有谁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即使是比你年长一倍的人。”

第 9 章

巴拿马的英雄总统

1972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来到了巴拿马的托库门（Tocumen）国际机场，那时候正值热带洪水期。就像以前那样，我与其他几位管理人员同坐一辆出租车前往目的地。因为我懂西班牙语，所以我被安排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当时正下着大雨，透过车窗的挡风玻璃，我看到前方有一个布告板，上面是一个英武的男人，他有着浓密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戴着宽沿帽，帽的一边灵巧地向上翻起来。我认出了他就是巴拿马的现代英雄——奥马尔·托里霍斯。

到巴拿马之前，我像往常一样做足了准备。我到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翻阅了托里霍斯和巴拿马的相关资料。从资料中得知，托里霍斯很受人民爱戴。他一直坚持认为：巴拿马运河是属于巴拿马人民的。他坚信，在他的领导下，巴拿马可以避免重蹈当年的覆辙——巴拿马曾有一段让巴拿马人民感到耻辱的历史。

当曾经指挥修筑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雷赛（Ferdinand de Lesseps）决定修建一条贯通中美洲地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之时，巴拿马还是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领土的一部分。从1881年开始，法国开始筹建运河工程，并且花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但这项工程在1889年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不过这却引起了西奥多·罗斯福对运河工程的关注。20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要求哥伦比亚签订条约将地

一个经济乐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峡部分划归北美联盟，但哥伦比亚拒绝了这个要求。

1903年，罗斯福总统派出了美国战船“纳什维尔号”（Nashville），美国士兵登陆后，逮捕并杀害了当时的军事领袖，宣布巴拿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并与巴拿马傀儡政府第一次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条约》（Canal Treaty）。条约规定，在即将建成的运河两边设立美国区，这样就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干预合法化，让华盛顿可以真正控制这个新成立的“独立”国家。

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条约竟然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Hay）^①与曾经是运河项目组成员之一的法国工程师菲利普·布诺-瓦雷拉（Philippe Bunau-Varilla）签订的，没有任何一个巴拿马人参与。最后，在一个由美国人与法国人签订的条约制约下，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的控制下脱离出来，从而单独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之前早有预兆：此事迟早是会发生。

半个世纪以来，巴拿马由一个与华盛顿政府关系密切的富裕家族统治，这群右翼独裁者实施所有决策的前提都是保证美国的利益。和大多数与美国结盟的拉美国家领导人一样，巴拿马统治者将美国的利益阐释为——扑灭任何带社会主义色彩的人民运动。他们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局在北半球的所有反共活动，也向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统一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被乔治 H. W. 布什收购）那样显赫的美国企业提供帮助。实际上，在巴拿马只有那些生活极端贫困以及在种植园和工厂里像奴隶一样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美国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保证，而巴拿马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统治巴拿马的那些人因为给美国提供帮助而获得回报。1968年巴拿马发表独立宣言期间，美国军队代表傀儡政府进行了多次军事干预。不过，当我还在厄瓜多尔美国和平队当志愿者的时候，巴拿马的历史就改写了，一次

^①海·约翰·米尔顿（Hay John Milton，1838-1905年）：曾任美驻英国大使（1897-1898年）和美国国务卿（1898-1905年）。他也是一位作家，其作品包括诗集和一部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1890年）。——译者注

第9章 巴拿马的英雄总统
Chapter 9 Panama's President and Hero

政变推翻了该国最后一名独裁者阿鲁福·阿里亚斯（Arnulfo Arias）的统治，奥马尔·托里霍斯成为该国新的领导人——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

托里霍斯备受巴拿马中低阶层的推崇。他在圣地亚哥乡村长大，20世纪60年代，他所在的巴拿马主要军事组织——国民警卫队在贫苦大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托里霍斯经常关心无依无靠的穷人，因此他在军中有很好的口碑。他亲自走访贫民的棚屋，走进政客们不屑一顾的贫民窟，帮助失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甚至拿自己那一份微薄的薪水救助备受疾病和苦难折磨的人。他的这些举动，使他在国民警卫队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他热爱生活，关心人民，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托里霍斯承诺巴拿马会保护那些流亡者和政治难民，如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的反对者和反卡斯特罗（Castro）的古巴游击队都到巴拿马寻求庇护。许多人视托里霍斯为他们的保护神，他的这些举措使他赢得了南半球人民的普遍赞赏。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因为不同派别之间的摩擦而导致分裂，而托里霍斯善于处理这些问题。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在南半球的声望极高，声名远播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古巴、哥伦比亚、秘鲁、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等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人口仅200万的小国成为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改革的典范，给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包括策划前苏联解体的工人活动组织者和利比亚的伊斯兰武装分子）以极大的鼓舞。

来到巴拿马的第一个晚上，当出租车在红灯前停下的时候，我透过玻璃，看到对面巨幅布告版上有一个微笑着的男人，他英俊、勇敢、极富魅力。泡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那段时间里，我从各种书上得知，就是他帮助巴拿马历史性地第一次摆脱了作为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傀儡身份。而且，托里霍斯一直经受住了前苏联对他的诱惑，他深信社会变革的威力，也赞成向出生贫穷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可他并不像卡斯特罗那样提倡共产主义制度。他决心要从美国人手中夺回主权，为巴拿马人民赢得自由，但是他并不想通过与美国的敌人结盟的方式来夺回主权。

我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一些不起眼的杂志，里面有文章赞扬托里霍斯改写巴拿马历史，扭转这个国家长期受美国支配的局面。作者一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开始就引用了天定命运观（Manifest Destiny）——19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非常盛行的学说。学说认为，北美洲向外征伐是上天注定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类——下令消灭印第安人、森林和水牛，下令让沼泽枯竭，让河流变成沟壑，上帝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必须靠不断掠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途径来实现。

这篇文章让我不禁思考我们美国对整个世界的态度。“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最早由詹姆斯·门罗总统于 1823 年阐明的宣言，使得“天定命运论”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挥到极致，它宣称美国拥有对整个半球的特权，包括侵略任何一个将美国政策拒之门外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引用“门罗主义”来证明美国无论是干预多米尼加共和国、委内瑞拉，还是唆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取得“独立”是天经地义的。此后的几位美国总统包括最著名的有塔夫脱总统（Taft）、威尔逊（Wils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在 20 世纪下半叶为“门罗主义”在全球各国的扩张（包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扩张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论”。

看来现在终于有人敢阻挡华盛顿政府的扩张之路了。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卡斯特罗和阿连德（Allende）也曾站出来反对美国，但只有托里霍斯没有将自己的运动称作革命。他只是说，巴拿马人有着自己的权利——人民的主权、领土的主权以及其对横亘于国土上的运河的所有权，这些权利与任何美国人可以享受的权利一样合法，一样神圣。

托里霍斯也反对美国人的学校，反对美国南方司令部（US Southern Command）在热带地区，而且是在运河区域的军事训练营地的存在。多年来，美国武装部队邀请拉丁美洲的总统和领导人，将他们自己的儿子或军事领袖送到训练营地——这个北美之外最大也是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在那里，他们为了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及美国石油公司以及私人企业财产，学习审讯技巧、秘密军事行动技术以及军事战略。他们也得到与美国高级要员会面的机会。

这一切都是拉美国家人民所憎恨的，因为他们为右翼敢死队员提供了教育培训，并且让不少拉美国国家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

看着广告牌上这位英俊的将军，读着上面的标语：“奥马尔（Omar）的理想是自由，能扼杀自由理想的导弹无人能造”，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我预感到，巴拿马人民的苦难不会马上结束，而托里霍斯也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

热带暴雨不断撞击着出租车的挡风玻璃，绿灯亮了，司机向我们前面的一辆车按了几声喇叭。我想到了自己的任务，自己被派遣到巴拿马来是为了达成一项交易，这是美因公司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计划。巴拿马这个国家虽小，对美国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美因公司让我们作出详细计划，找一个绝好理由说服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美国国家开发署向巴拿马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投资巴拿马的能源、交通和农业部门。当然这不过是个狡猾的借口，其目的是让巴拿马永远被巨额债务缠身，从而恢复其以前的傀儡身份。

出租车继续在夜色中行驶，我心中不禁产生一种罪恶感。但是，我还在想来想去干什么呢？我已经在爪哇做过同样的事情了，并因此升了职，加了薪，获得了名声，拥有了更多权力。

第 10 章

运河区的海盗

第二天，巴拿马政府派了一个人来带我去参观，他的名字叫菲德尔（Fidel），很快我就对他有了好感。他长得高高瘦瘦的，对出生在这样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他的曾曾祖父曾经与玻利瓦尔^①将军一起作战并且使委内瑞拉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夺回了主权。我告诉他我和汤姆·潘恩有点儿关系。我很高兴菲德尔也看过《常识》的西班牙文版本。他会讲英语，可当他发现我也操着一口熟练的西班牙语时，他立刻情绪激动起来。

“许多美国人来这里很多年都不愿意学西班牙语。”他说。

菲德尔开车带着我到了一個非常繁华的地方，他把这里叫做“新巴拿马”。一路上，我们经过由玻璃和钢铁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他解释说，在里约格兰德河（Rio Grande）^②以南的国家，就数巴拿马的国际银行最多。

“我们经常被叫做‘美洲的瑞士’，”他说，“我们对客户的疑问很少，因此很多人都愿意把钱存到巴拿马银行。”

那天傍晚，我们的车沿着运河堤岸的一条大路行驶。我看见长长的船队

①玻利瓦尔（Bolivar）：委内瑞拉解放者，领导委内瑞拉于1821年6月彻底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译者注

②里约格兰德河（Rio Grande）：该河纵贯新墨西哥州，下游在得克萨斯州成为美国与墨西哥的界河。——译者注

停靠在运河边。我问菲德尔，这条运河怎么会有这么多船。

“一向如此，”他笑着说，“这些船在等待着出航的机会。这个港口中有一半的船只就是从日本开回来的，或者起航去日本——甚至比去美国的多。”

“这对我来说是条新闻。”

“我倒是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说，“北美人对外面的世界知道的确实不多。”

我们在一个美丽的公园旁边停了下来，公园里的残垣断壁上爬满了九重葛^①，旁边立着的一个标志说明了这里曾经是一座堡垒，保护这座城市不受蛮横英国海盗的抢掠。有一家人在草地上准备野餐：父亲、母亲、一对儿女还有一位老人，我想他应该是孩子们的祖父吧。我突然很羡慕这个和睦的家庭。我们走过他们身旁的时候，他们微笑着向我挥挥手，并用英语向我问好。我问他们是不是游客，他们笑了，那个父亲向我走了过来。

“我是运河区的第三代人，”他很自豪地说，“在运河开通后的第三年，我的父亲就到这里来了。他当年赶着骡子，开着拖拉机，拖着船只穿过水闸。”他指了指那个年迈的长者，此时老人正专心给孩子们铺野餐用的桌子，接着说道，“我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我们都踏着他的足迹而来。”

孩子的妈妈帮着老人和小孩铺桌子，而远处的太阳已经完全没入了蔚蓝的海水中。这如田园诗般动人的一幕，让我想起莫奈^②的油画，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美国公民。

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当然了。运河区是美国的领土。”这时候，那个小男孩跑过来，告诉他爸爸晚餐准备好了。

“你的儿子将会是第四代？”

那个男人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将双手举向天空。

“我向主祈祷，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在运河区的生活确实妙不可言。”然后他放下双手，盯着菲德尔，“我希望我们可以

①九重葛(Bougainvillea)：一种南美洲木本灌木或藤本植物，花朵有三片花瓣，色彩艳丽。——译者注

②莫奈(Monet)：19世纪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再享有运河区 50 年的所有权，可是专横的托里霍斯却不断兴风作浪。”

一股冲动涌上心头。我用西班牙语对他说：“再见。我希望你和家人在这里过得开心，对巴拿马的文化了解得更透彻。”

他有点厌恶地看着我，“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然后他立刻转身向他的家人和准备好的晚餐走去。

菲德尔走过来，将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紧紧地搂着我。

“谢谢你。”他说。

回到城里，菲德尔把我送到一个他称之为“贫民窟”的地方。

“这还不是我们这里最糟糕的。”他说，“但是你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木头搭起来的小屋和积满污水的小沟比比皆是。这些破烂的房子就像停泊在肮脏的水塘里的废弃破船，腐败的垃圾和废水的恶臭顿时充满了我们的车厢，光着身子的小孩子们追着我们的车子跑。菲德尔把车速减慢，这群孩子马上围过来，喊我“叔叔”，向我讨钱，这让我想起了雅加达。

墙上到处都是涂鸦。有一些是可以经常看到的“心心相印”的图案，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人名，可是大多数的涂鸦都是些写着对美国表示怨恨的标语：“滚回家去吧，外国佬”、“别在我们的运河里放屁”、“山姆大叔，奴隶主”还有“告诉尼克松，巴拿马不是越南”，最让我心寒的却是这一句：“为自由而献身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在这些横七竖八的涂鸦之间，贴着不少奥马尔·托里霍斯的海报。

“现在我们到另外一边去，”菲德尔说，“我有官方的文件许可，而你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们可以进去。”头顶上的天空已经变成了绛红色，菲德尔开着车把我送到了运河区。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大吃一惊，我真的不敢相信这里竟然有这样豪华的景象——庞大的白色建筑群、精心修剪过的草坪、豪华的房屋、高尔夫球场、商店和电影院一应俱全。

“这就是现实。”他说，“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国的财产。所有的商行包括超级市场、理发店、美容院、餐馆，所有这一切都在巴拿马，却不在

巴拿马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且这些商行并不需要上缴任何税收。这里有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到处有便利的美国邮政局、美国法庭和学校。实际上这里是个‘国中之国’。”

“这对巴拿马人民来说是一种耻辱！”

菲德尔盯着我，“是的，”他表示同意，“这倒是个很好的形容。你看那边，”他向后指着巴拿马城里，“每年的人均收入少于 1 000 美元，失业率高达 30%。当然，我们刚才去的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一年能挣 1 000 美元，而且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转过身，看着我，语气从愤怒变为忧伤。

“我们还能怎样呢？”他摇摇头，“我不知道。可我敢说，托里霍斯已经在努力了。我想这也是他的伤心事，可是他确实实是已经尽他所能了。他是一个敢于为他的人民奋力斗争的人。”

我们离开运河区的时候，菲德尔微笑着说，“你喜欢跳舞吗？”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就说，“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然后我带你去看看巴拿马的另外一面。”

第 11 章

士兵与妓女

饱餐了美味的牛排、喝足了啤酒之后，我们离开餐馆走在黑暗的街道上。菲德尔建议我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条街上。“你要来这里的话，坐个出租车径直到前门。”他指着一边，“就是那里，在围墙上面，那里是运河区。”

他继续往前开车，在一个停着许多车辆的空地上，菲德尔把车停了下来。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菲德尔下车，走上前拍拍老人的背，然后很亲切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车的挡泥板。

“好好照料她，她就是我的女人。”他递给老人一张钞票。

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走出了停车场，转到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两个小男孩儿从我们身旁跑过，他们手里握着一根棍子，指着对方，他们像是在玩射击游戏。其中一个小男孩的头顶只及菲德尔的大腿高，他不小心撞到菲德尔的腿。这个小男孩停下来，往后退了几步。

“对不起，先生。”他喘着气，用西班牙语说。

“可是，你得告诉我，你和你的小朋友在向谁开枪呢？”

另一个男孩向我们走过来，他伸出手臂搂着撞到菲德尔的那个男孩儿。“我的弟弟，”他解释说，“对不起了。”

“没关系，”菲德尔微微地笑了起来，“他没有伤到我，我只是问你们俩向谁开枪呢，因为我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游戏。”小兄弟互相对望了一下，

年纪较大的那个笑了，“他是运河区的外国佬将军，他想强奸我们的妈妈，我要收拾他，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菲德尔偷偷看了我一下，问道：“那他该回哪里去？”

“回家，美国。”

“你妈妈在这里工作吗？”

“就在那儿，”弟兄俩蛮自豪地指着街道的霓虹灯，“她是酒吧侍应。”

“继续玩吧，”菲德尔给他们每人一个硬币，“不过要小心点儿，最好不要在这么黑暗的地方玩。”

“好的，谢谢你，先生。”他们跑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菲德尔对我说，巴拿马法律禁止国内妇女当妓女，“她们可以在酒吧当侍应，可是不能出卖她们的肉体。只有外来人才干那种事。”

我们走进一个酒吧，这里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美国音乐，这让我很不适应。两个身材魁梧的美国士兵把守着大门，他们制服上的标志表明他们是宪兵。

菲德尔带我走到里面，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舞台。三个年轻的女孩子在那里跳舞，她们除了头顶上戴着帽子外，其他地方都裸露着，其中一个戴着水手帽，一个带着绿色的贝雷帽，另外一个戴着牛仔帽。她们身姿曼妙，满面笑容，她们似乎在玩着某个游戏，又似乎在进行着一场选美比赛。那音乐、那舞姿、还有那舞台，简直就像回到了波士顿的迪斯科舞厅，唯一的区别是她们一丝不挂。

菲德尔领着我经过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身边。尽管他们身穿白T恤，可是从他们理的平头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运河区军事基地的士兵。菲德尔拍了拍一个女服务生的肩膀，她转过头来，高兴地尖叫一声，张开双臂拥抱菲德尔。那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看着这一幕，不以为然地互相对望，我想他们是不是把“天定命运论”也用在了这个女人身上。那个女服务生将我们带到一个角落，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出来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

我们坐了下来，菲德尔用西班牙语向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男人致以问候，他们不像其他的士兵，而是穿着印有图案的短袖衬衣和皱巴巴的长裤。刚才那个女服务生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两杯巴波亚啤酒。她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由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候，菲德尔拍了拍她的臀部，她转头抛给他一个飞吻。我向四周看了看，那些年轻人不再盯着我们，我的心里顿觉轻松，他们都被那些舞女吸引过去了。

来这里的人多数是讲英语的士兵，也有一些别的人，像我们旁边坐着的那两个男人显然是巴拿马人。头发的颜色是最明显的区别标志，还有就是他们不穿T恤和牛仔裤，这些巴拿马人有的坐在桌子旁边，有的靠着墙站着，但看起来高度警觉，就像是看护着羊群的牧羊犬一样。

台上的几个女人走了下来，在桌子之间慢慢穿行。她们时而走过去坐在客人的大腿上，向服务生大喊大叫；时而跳着舞，扭动着身躯，唱着歌，然后又依次走上舞台。她们身着紧绷绷的裙子、T恤、牛仔裤、贴身的上衣，当然还有高跟鞋。其中一个穿着维多利亚式的长袍、戴着面纱，另外一个穿着比基尼。很显然，她们是在出卖她们的肉体，而只有漂亮的人才受到欢迎。我对她们来到巴拿马感到惊讶，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驱使她们不顾一切到这里来做这种事情。

“全部都是外国来的？”我大声地问菲德尔，企图盖过那些嘈杂的音乐。

他点点头。“除了……”他指着那些服务员，“她们是巴拿马人。”

“什么国家？”

“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

“这些都是你们的邻居啊。”

“不。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才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居。”

刚才带我们来这里的那个女服务生走过来，坐在菲德尔的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

“克拉丽沙，”他说，“告诉我这位从北美洲来的朋友，为什么这些女孩子要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他朝着舞台那边指了指。这时又有三个女孩子登场，从别人手里接过帽子，刚才那些女孩子已经下台，开始穿上衣服。音乐切换到萨尔萨舞曲^①，新舞者登场，踏着音乐的节奏，慢慢地脱下身上的衣服。

克拉丽沙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然后她站起来，拿起我

^①萨尔萨舞曲(Salsa)：拉丁美洲的一种流行舞曲。——译者注

们的空酒瓶， “菲德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女孩子为了逃避专横和暴行而来到这里。我再给你们来几瓶巴波亚吧。”

她走之后，我对菲德尔说：“她们是为了钱吧。”

“没错。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自由法西斯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呢？”

我又朝舞台那边看过去。那三个女孩子哈哈地笑着，把她们的水手帽子像球一样抛来抛去。我看着菲德尔的眼睛，“你是在开玩笑，是吧？”

“不，”他很认真地说，“我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这些女孩子大多数已经失去了家人——父亲、母亲、兄弟、丈夫或者男朋友。她们不得不面对死亡，不得不接受生活的折磨。对她们来说，跳舞和卖淫并非你想象中的那么肮脏。她们在这儿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到别处去开始新的生活，买一个小商店或者开个咖啡馆……”

突然，附近的一阵骚乱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到一个女服务生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挥舞着拳头，那个士兵捉着她的手腕用力地扭，她尖叫着跪了下来。那个士兵大笑，向他的同伴喊叫，他们都笑了。她挥起另外一只手想打他。他却拧得更带劲了，那个女服务生的脸因痛苦而变得扭曲。

宪兵们仍然站在酒吧门边，平静地看着这一切。菲德尔跳起来，朝着那个士兵走过去。我们旁边那一桌的一个人伸手挡住了他。“冷静，兄弟，”他说，“冷静，兄弟。安立奎能摆平。”

一个高高瘦瘦的巴拿马人从舞台旁边的角落里窜了出来，他的行动像猫一样敏捷，很快就走到那个士兵旁边。他一手绕着那个士兵的脖子，另一只手往他脸上泼了一杯水。那个女服务生趁机逃掉了。音乐声停下来了。那几个本来挨着墙坐着的巴拿马人走了出来，在那个高个子身边围成一堵半圆形的保护墙。高个子拎着那个士兵往吧台方向走去，嘴里还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楚。忽然，他提高了音量，用英语一字一顿地说：“女服务员不是你们可以碰的。还有，在没有付钱之前，你们也别想碰别的女孩子。”

那两个宪兵终于开始行动了。他们走向围成一圈的巴拿马人。

“现在就把他交给我们吧，安立奎。”他们说。

高个子保镖将手中提着的士兵扔到地上，然后用力地抓住他的脖子，把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他的头拧过来，那士兵疼得大叫。

“现在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吧？”士兵发出了一声微弱无力的呻吟。

“好，”他把士兵交给那两名宪兵，“把他弄出去。”

第 12 章

与将军对话

接到托里霍斯的邀请完全在我意料之外。1972 年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巴拿马水电资源研究所给我分配的办公室里认真地看一份数据。这时候有人轻轻敲了敲我那敞开的门，我请他进来——终于可以暂时离开那堆数字了。他说自己是托里霍斯将军的司机，专门过来请我到将军的别墅去。

一小时之后，我与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面对面坐在他的别墅里。他穿得很随意，典型的巴拿马风格：卡其色的宽松长裤和一件浅蓝色、上面印着绿色图案的短袖衬衣，前面的纽扣系得很整齐。他个子很高，身材结实，长得很英俊，一缕黑发垂在他突出的额头上。对于一个像他那样肩负重任的人来说，他的表情轻松得让人诧异。

他向我了解了一下印度尼西亚、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情况，看来他对这三个国家很感兴趣，尤其对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特别好奇。1941 年，英国人和苏维埃指控巴列维国王的父亲与希特勒勾结，推翻他的统治，巴列维随后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你能想象吗？”托里霍斯说，“他居然去推翻自己父亲的统治。”

这位巴拿马的国家领袖对伊朗这个遥远国度的历史确实了如指掌。我们讨论了 1951 年伊朗国王巴列维遭遇的局势变幻，讨论了他是怎样被自己的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gh）逼上流亡海外的道路。托里霍斯知道，全世界多数人也知道，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为摩萨德扣上了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也是中情局帮助伊朗国王重新夺回了统治权。可是也有他不知道的事情（至少他没有提及）。那是克罗汀对我说起克米特·罗斯福的高明手段以及帝国主义新纪元开始的事实。克米特·罗斯福的行动点燃了美国要成为全球帝国的大火。

“伊朗国王巴列维重新夺取王位之后，”托里霍斯继续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旨在发展伊朗的工业，帮助其实现现代化。”我问他为什么对伊朗的历史会如此了解。

他说，“其实，我并不欣赏伊朗国王，他宁可推翻自己的父亲，而甘心去做美国中情局的傀儡。当然，他也为他的国家作出了贡献。也许我可以向他学习点什么，如果他能活下来的话。”

“难道你觉得他活不了多久吗？”

“他的敌人太强大。”

“不是有全球最出色的保镖保护着他吗？”

托里霍斯有点不屑地看着我说：“他的那群保镖保护不了他，而且在伊朗，他没有几个拥护者，他支撑不了多久的。”他停下来，眼珠迅速转动了一下。“保镖，我自己也有几个。”他朝着门口那边指了指，“如果你们美国人下定决心要干掉我，你觉得保镖能保护我吗？”

我问他，是否真的有这个可能。

他扬了扬眉毛，这让我觉得是不是我刚才的问题问得太愚蠢了。

“相对于阿尔本兹（Arbenz）和统一水果公司来说，运河的作用更大。”

我曾经研究过危地马拉的历史，我明白托里霍斯的言下之意。统一水果公司对于危地马拉的政治意义就好比运河之于巴拿马。统一水果公司成立于1800年，很快成为中美洲实力最强大的集团。20世纪50年代初，改革运动候选人雅克布·阿尔本兹在一次被称作“南美洲民主进程典范”的选举中，当选为危地马拉总统。当时，危地马拉不到3%的人口却拥有该国超过70%的土地。阿尔本兹许下诺言，要为贫困农民“掘”出一条脱离饥饿的道路。在当选之后，他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

“拉丁美洲的穷人和中产阶级都拍手称赞阿尔本兹的改革。”托里霍斯

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我们得屏息以待，我们知道统一水果公司反对土地改革，因为他们是危地马拉最大也是最苛刻的地主，在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牙买加、尼加拉瓜、圣多明各和巴拿马都拥有种植园。统一水果公司可不愿意让阿尔本兹成为我们的榜样。”

剩下的事情我都知道：统一水果公司在美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大型公关运动，目标是让美国公众和国会相信阿尔本兹是前苏联实施其阴谋计划的一枚棋子、危地马拉是前苏联的卫星国之一。1954 年，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政变，美国战斗机轰炸危地马拉城，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阿尔本兹政府被推翻，冷酷无情的右翼独裁者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Colonel Carlos Castillo Armas）上校上台。

新政府的成立得益于统一水果公司的鼎力支持。新政府撤销了土地改革方案，废除了对外国投资者征收所得税及利息税的法律，取消了无记名投票，并关押了数千名反对者。凡是公然反对卡斯蒂略的人都遭到起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统一水果公司、中情局和独裁者卡斯蒂略军队给危地马拉带来半个世纪的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

“阿尔本兹被暗杀了，”托里霍斯接着说，“政治谋杀和人格诋毁。”他停了一下，皱起眉头，“美国的民众怎么可以轻信中情局？我不会放松警惕的，我的人民就是我的军队，政治谋杀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我们沉默片刻，各自陷入思考之中。托里霍斯先开口了，“光是中央情报局就恨不得干掉我！”

“你知道谁是统一水果的幕后操纵者吗？”他发问了。

“萨帕塔石油公司（Zapata Oil）^①，乔治·布什^②（我们的联合国大使）的公司。”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的身体向我倾斜了一点，压低嗓门，“现在我的对手是他在贝泰公司的老友。”

①萨帕塔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勘探公司，1953 年由乔治·H.W 布什及其合伙人约翰·奥华比（John Overbey）、休戈·烈德克、科比利·烈德科共同创办。——译者注

②这里指老布什。——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我大吃一惊。贝泰公司是全球最具实力的工程公司，在某些时候也曾是美因公司的合作者。在争夺巴拿马的工程项目中，我想贝泰公司将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你的意思是……”

“我们考虑开凿一条新的运河，这条运河的水面与海平面平齐，河道里没有水闸，那样可以让更大的船只通过。日本也许有意投资这条运河。”托里霍斯说。我插了一句：“他们是运河的最大客户。”

“非常正确。当然了，如果他们愿意投资，就由他们负责建造新运河。”

我备受打击，“那么贝泰公司就被撂在一边了。”

“这将是巴拿马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他停顿了一下，“贝泰公司与尼克松、福特，还有布什的亲信是一伙的。”布什当时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福特则是参议院的少数派领袖、美国共和党国民大会主席。托里霍斯对他们都很熟悉，并把他们称作共和党的政治掮客，“我知道，贝泰家族在幕后操纵着共和党。”

这番话让我浑身不舒服。我是他所鄙夷的制度中的一员，我很肯定他知道这个事实：我此行的任务就是说服他接受巨额的国际贷款，然后让美国工程和建筑公司得到项目的合同。因此，我决定迎面挑战他。

“将军，”我说，“您为什么请我到这里来？”

他看了看手表，笑着说：“是该回到主题上了。我请你来是因为巴拿马需要你的帮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

我十分震惊：“我的帮助？我可以帮您什么？”

“回到运河这个问题上，当然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放松地靠在椅子上，“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典范。我们必须表达对穷苦人民的关注，毫无疑问，我们获得独立并不是依赖任何其他国家。我们必须向全世界证明，巴拿马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家，我们并非要与美国作对，而是为穷苦大众争取权利。”

他跷起二郎腿，“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建立起与南美洲其他国家不同的经济基础。电力不错，可必须是能让老百姓都用得起的，有津贴的电，交通与通信也要这样，尤其是农业。做到这些都需要钱，你们的钱，世

界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的钱。”

他再次向我探过身来，盯着我的眼睛，“我清楚你的公司通常建议我们接受大规模的工程，如更宽阔的高速公路、更大规模的发电站、更深的港湾。可是这次是不同的，告诉我什么是我们巴拿马最需要的，然后我会把所有你想要的工程交给你们。”

他的提议让我措手不及，我感到既惊讶又兴奋。当然，他很清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外国援助不过是个借口。这个借口的存在可以让他变得富有无比，却让他的国家套上债务的枷锁；这个借口可以让拉美国家永远对美国和公司王国无尽感激——然而同时也是债务累累；这个借口可以确保拉美国家永远无法逃脱“天定命运论”的束缚，永远臣服于华盛顿和华尔街。我很肯定托里霍斯清楚，这个制度存在的前提是：所有掌权的人面对贿赂和诱惑都难以自制，如果他不为一己私利而拒绝接受贿赂，华盛顿将把他看作是一种威胁。华盛顿担心，一旦一种新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南美洲发生，产生的连锁反应将会摧毁美国一直推行的这个体系。

我看着咖啡桌对面的这个男人，很显然他明白这条运河的涵义——运河可以让他享受特权，当然也让他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他必须谨慎，他已经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形象，成为这个不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楷模，如果像他的偶像阿尔本兹一样，决定坚守自己的立场，全世界都会去效仿他。那么公司王国将作何反应？说得更具体些，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很简单，可以让拉丁美洲又多一个“英年早逝”的英雄。

我知道，我眼前的他是一位勇士，对于我的那些说法，他敢于反驳。固然，他不是完美无瑕的人，但也绝不像亨利·摩根（Henry Morgan）^①和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②那样的海盗。摩根与德雷克是恃强凌弱的冒险家，仗着英国国王特许的捕拿国外船只许可证，为他们的海盗抢掠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雨夜中见到的那块公告板上写着的那一行字，并非那种典型的政治欺诈，“奥马尔的理想是自由，能扼杀理想的导弹无人能造！”

①亨利·摩根（Henry Morgan）：17世纪英国的恶名昭彰的海盗。——译者注

②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英国人。——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可我心里还是充满疑惑。理想也许永远不会泯灭，可拥有理想的人的结局会是怎样呢？切·格瓦拉^①、阿尔本兹、阿连德；阿连德是目前唯一活下来的一个，可是他还能坚持多久？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托里霍斯被刺杀而成为烈士，我将会有怎样的反应？

^①切·格瓦拉(Che Guevara)：拉丁美洲的共产游击队领袖，1967年遭枪杀。——译者注

第 13 章

进入经济史上的险恶新时期

我离开他之前，我们双方都明白，美因公司可以拿到大项目的合同，而我的任务则是满足托里霍斯的要求。

作为美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我不但要管理一个部门，还要熟谙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相关的理论。在我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是国际经济的重大转型时期。

20 世纪 60 年代，几个国家组成了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欧佩克，OPEC），这是世界主要产油国之间结成的联合体，该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与国际大型炼油企业抗衡。伊朗也是欧佩克的主要成员之一。摩萨德掌权的时候，在美国的秘密干涉下，伊朗国王巴列维才得以夺回宝座。尽管如此（又或者正因如此），伊朗国王非常担心他随时可能遭受摩萨德那样的命运，其他一些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领袖也和伊朗国王一样对自己的宝座忧心忡忡。他们了解到，大型的国际石油公司，就是所谓的“七姐妹”^①已经联合起来，一起压低原油价格，这样一来，他们付给石油生产国的钱也随之减少——这是石油加工企业获得暴利的手段。

20 世纪 70 年代，事态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事情开始闹得沸沸扬

^①指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雪佛龙石油公司（Chevron）、美比尔（美孚）石油公司（Mobil）、海湾石油公司（Gulf）、德士古石油公司（Texaco）和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集团（Royal / Dutch shell）及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扬。欧佩克让那些工业巨头差点儿就要下跪乞怜了，欧佩克国家达成共识，决定要惩罚这些西方强国，于是他们在 1973 年实行了石油禁运。美国的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龙，石油禁运使美国的经济遭受重创，其程度不亚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当时很多人未曾预料到石油禁运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可此时，美国还纠缠在一场让美国人自己都感到耻辱的越南战争中，全国上下充满了恐惧和焦虑，欧佩克的石油禁运无疑是雪上加霜。况且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丑闻而即将辞职，美国政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时候，曾经被人认为是毫不起眼的机构，包括欧佩克在内，逐渐在这场对抗中占据上风。

我被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深深地吸引住了。虽然不断令我的钱包鼓胀的是公司王国，可是我私下对我的主子陷于这种困境却有点儿幸灾乐祸。我觉得这样可以稍微减轻一下我的罪恶感。我看到了汤姆·潘恩的影子，他以旁观者的姿态站在一旁观战，为欧佩克喝彩。

在石油禁运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事后我们才发觉，在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繁盛时期的一半，而此时经济增长又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当时的经济增长结构，并不能像以前那样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因而失业率奇高。最惨痛的是，国际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打击，“二战”以来一直沿用的固定汇率体系彻底崩溃。

那段时间，我经常与朋友在午餐或下班后在酒吧一起讨论这些事。这些人有的是我的部下，我的员工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多数都很年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由思想家，至少以常规的标准来看，他们是那样的。另外一些是波士顿智囊团的管理人员和当地大学的教授，有时候我们是单独会面，有时候是许多人聚在一起畅所欲言，总之气氛都很活跃。

现在回想起这些讨论，我为自己当初在他们面前所表现出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而感到尴尬。我的朋友们不时地炫耀他们的资本，与比肯山（Beacon Hill）或者是华盛顿的联系、他们的教授身份还有博士学位，而我则炫耀我

在大型咨询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师的职位，炫耀我坐头等舱环球旅行的经历。当然我不能和他们讨论与托里霍斯等人的私下会面，也不能泄露我们国家在全球很多国家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

当我们提及那些“小人物”的权力时，我不得不尽力克制我自己。我知道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了解：公司王国、其手下的经济杀手以及躲在背后的随时会出动的豺狼，绝对不容许这些“小人物”们当道。

我们的话题一般聚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 70 年代经济发展的问题上。30 年代，代表着国际经济发展及其理论的研究、分析和理解的分水岭。在那 10 年里，国际经济形势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流行敞开了大门，同时，政府加强了在市场中的宏观调控力度。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在提供医疗服务、失业救济和其他形式的福利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后来我们抛弃了最初的那种老观念——当时多数人认为市场应当完全靠自我调节，国家干预必须最小化。

经济大萧条的结果是新经济政策、政府金融管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全面出台。另外，经济萧条和“二战”导致一系列的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的成立。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向凯恩斯经济学过渡的过程中，20 世纪 60 年代是最关键的 10 年。这 10 年中，先后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那时候对经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莫过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麦克纳马拉是我们在聚会上经常讨论的对象。我们都知道当时他的事业正青云直上，他在 1949 年还只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策划经理和财政分析师，到 1960 年他已经成为福特公司第一位非福特家族成员的总裁。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就任命麦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长。

麦克纳马拉在政府大力推行凯恩斯经济学，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法估测军队规模、资金调配以及制定用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他推崇的“攻击型领导艺术”后来不仅为美国政府官员，同时也受到企业高层人员的推崇。这种领导艺术成书后成为美国高等学府商学院的一门重要的管理类课程，并且最终造就了全球帝国的先锋部队——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20 世纪 70 年代初，每当我们围着桌子讨论世界大事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麦克纳马拉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职位，这是他离开国防部后接受的新职务。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认为，麦克纳马拉就是当时人们称之为“军事和工业复合体”的代表。他曾经在大型企业担任最高职位，在政府部门占据要职，现在领导着全球最权威的银行。这样的一个人公然违背了政权分离原则的事实让我的朋友感到恐惧，而我却是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现在看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操纵世界银行，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动全球帝国向外扩张——而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最险恶的。他开创一个先例，并以其非凡的能力，解决了公司王国体制中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分歧，而他的接任者，则在此基础上对公司王国中的制度继续进行细微调整。例如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和经济政策委员会（Council on Economic Policy）主席，后来担任了贝泰公司的总裁，在里根总统当政期间他又成了美国国务卿。卡斯帕尔·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曾任贝泰公司的副总裁和总顾问，后来成为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理查德·赫姆斯（Richard Helms）是约翰逊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来摇身一变成为尼克松政府驻伊朗大使。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曾经是乔治·H. W. 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当过哈里伯顿公司的总裁，接着又成为乔治·W. 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就连美国总统乔治·H. W. 布什本身，也是从萨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做起，后来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时期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接着担任福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到最后当选为美国总统。

回想起来，我不禁感叹当年我们也曾经那么的纯洁。在许多方面，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创建我们的帝国。克米特·罗斯福推翻伊朗民主政权、扶持一位流亡国王上台的做法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们在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地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不少目标，越南则是一个例外，但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很容易又走上了以往帝国建设的道路。看来，还得依靠欧佩克的主要成员国——沙特阿拉伯来改变这个局面了。

第 14 章

沙特阿拉伯的洗钱风波

1974年，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官给我看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Riyadh）的照片。在这些照片里，可以看到在政府大楼外面的垃圾堆里，一群羊正在乱翻垃圾寻找食物。我问外交官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告诉我说，羊群担负着这座城市的垃圾处理工作。

“沙特阿拉伯人自尊心很强，没有人愿意去收垃圾。”他说，“这种工作是留给畜生来做的。”

羊！在全球出产石油最多的王国竟被用来处理垃圾，这真是不可思议。

那时候，我正好随一队顾问就如何应对和解决石油危机展开研究。这些羊，给了我灵感，我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案该如何展开了。我也逐步了解到沙特阿拉伯在过去300年的发展模式。

沙特阿拉伯社会充满了暴力和宗教狂热主义。在18世纪，沙特阿拉伯国王穆罕默德·伊本这一个当地的军阀加入了极端保守的瓦哈比教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军队，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沙特阿拉伯王室和他们的瓦哈比联盟征服了几乎整个阿拉伯半岛，包括伊斯兰圣地麦加（Mecca）和麦地那（Medina）。

沙特阿拉伯的整个社会形态反映了其创始人清教徒式的理想，他们对《可兰经》中的信条进行了严格的解释。沙特阿拉伯人坚持每天祈祷5次；妇女必须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遮盖着自己；对罪犯的惩罚非常严厉；公开执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行处决和石刑^①非常普遍。我第一次到利雅得时，司机的话让我很惊讶，他告诉我可以随意地将我的照相机、手提包甚至我的钱包放在车里显眼的地方，然后把车停靠在公开市场附近而无须上锁。

他说：“这里没有任何人会萌生偷窃的念头，因为小偷的双手会被砍掉的。”

那天晚些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到一个所谓的“砍头广场”（Chop Chop Square）观看罪犯斩首。我并不希望见到那种残忍的场面，因此我谢绝了他的邀请。瓦哈比教徒那种极端清教徒主义式的忠诚，使街道上几乎没有窃贼。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犯了罪，将对其施行最残忍的肉体处罚。

那场让西方国家遭受巨大经济重创的石油禁运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将宗教作为政治和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73年10月6日（犹太人的赎罪日，是犹太教最神圣的节日），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向以色列发起进攻。这点燃了“十月战争”的战火，这是第四次和最具破坏力的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也是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向沙特阿拉伯费萨尔亲王（Faisal）施加压力，要求费萨尔亲王对与以色列同谋的美国进行报复。费萨尔亲王将针对美国的阴谋称为“石油武器”。10月16日伊朗和其他五个阿拉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宣布将原油标价提高70%。

阿拉伯国家石油部长在科威特城开会商议进一步的方案，伊拉克的与会代表呼声最高，他们要求瞄准美国这个靶子。他们要求其他与会代表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企业国有化，对所有与美国和以色列交好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从所有美国银行撤走阿拉伯国家的资金。他们指出，阿拉伯国家的银行账户是关键所在，此举将让美国经受不亚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打击。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对此并不认同。但是，他们却在10月17日决定继续加大禁运的限制，首先是让石油减产5%，然后是以5%的速度逐

①石刑：在某些伊斯兰国家的沙里亚法规下，石刑仍然存在。人们向受刑者反复投石直至受刑者死亡。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朗、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译者注

月递减，直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达到为止。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应该为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遭到惩罚，因此，应该对其实行最大限度的禁运。一些参加会议的国家宣布他们将减产 10%，而不是 5%。

10 月 19 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要求给予以色列 22 亿美元的援助。于是第二天，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对美国实行了完全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在 1974 年 3 月 18 日结束。禁运的时间虽短，其影响却无法估量。沙特阿拉伯原油的卖出价从 1970 年 1 月 1 日的 1.39 美元/桶飙升至 1974 年 1 月 1 日的 8.32 美元/桶。美国政客和后来的政府将永远无法忘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个沉痛的教训。然而从长远来看，那短短几个月的创伤，却巩固了公司王国的内部结构：其三大支柱——大企业、国际银行和政府空前地团结起来，而这种团结还将持续下去。

石油禁运也让美国的政策来了个大转变。华尔街和华盛顿政府坚定了杜绝禁运再次发生的决心，保证美国的石油供应成为他们决策的大前提，于是在 1973 年后，保证石油供应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决策前提。石油禁运提高了沙特阿拉伯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华盛顿政府不得不认同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经济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这也促使美国公司王国的领导人不得不施展浑身解数，来达到将石油美元重新放回到自己口袋的目的，同时也开始对如沙特阿拉伯不断增长的财富打起了主意，他们深知，沙特阿拉伯政府缺乏合理的行政与机构体制来管理这笔石油巨款。

面对因为价格上涨而增加的石油款，沙特阿拉伯也是喜忧参半。国家的金库忽然多了数十亿美元，这些钱开始腐蚀一些一贯严格恪守宗教信仰的瓦哈比教徒。富得流油的沙特阿拉伯人开始周游世界，他们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学进修，购买豪华的汽车，家里摆满了西式家具。保守的宗教信仰开始被一种新式的物质主义所取代，正是这种物质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石油危机的方法。

石油禁运刚结束，华盛顿政府就开始与沙特阿拉伯谈判，商议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美国还以把沙特阿拉伯带进 20 世纪为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借口，蓄谋重夺石油美元，当然美国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保证沙特阿拉伯不再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谈判最显著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卓越”的组织——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Saudi Arabian Joint Economic Commission, JECOR），该联合会体现了一个完全背离常规的外国援助新模式：用沙特阿拉伯的钱聘请美国公司建设沙特阿拉伯。

尽管在经营和财物管理方面由美国财政部委派代表，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却是完全独立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将在一段时期内，比如25年内，在完全免受国会审查的情况下，自由支配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尽管美国财政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没有美国资金的介入，国会也就无权介入此事进行调查。在全面审核了该联合经济委员会之后，大卫·霍尔顿（David Holden）以及理查德·约翰斯（Richard Johns）得出如此结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与发展中国家达成的同类协议组织中意义最深远的一个。该委员会不仅可以为美国打好掩护，同时也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在项目的初步阶段，美国财政部让美因以顾问公司的身份介入。我被召见并被告知我所担负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且我须为所做及所知的一切保守秘密。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我认为这对我有利。那时候，我以为美因公司是咨询顾问公司中的领头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几个专业技术较强的顾问公司中的一个。

由于所有的事情都在高度保密中进行，我未能得知财政部与其他顾问公司的讨论详情，因此，我无法确定在这次计划中，我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知道这个安排给经济杀手设定了新的标准，也为提升帝国的利益找到了相对于传统方式来说更加有新意的替代方式。我也知道我研究过的大多数设想到最后都被实行了，美因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最重要也是利润极高的合同，那一年我也得到了丰厚的奖金。

我的工作是在夸大沙特阿拉伯经济的预测前景：一旦向沙特阿拉伯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额资金，这里将有怎样的变化，同时我还需制定资金配置的具体方案。简言之，我就是要尽我所能地发挥创造力，极力夸大向沙特阿拉伯经济建设投入资金的合理性，当然其前提是让美国工程和建设公司得到合

同。上头安排我独立完成此项预测，不得依靠我的职员。于是我开始了几几乎是隐居的生活，一个人呆在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工作，这个会议室正好在我下榻的公寓房间楼上。有人提醒我，我的工作不但关系到国家安全，对美因公司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

我当然明白这一点，这一次的任务非比寻常，要让沙特阿拉伯背上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找到法子保证巨额的石油美元统统回到美国的口袋。在此过程中，沙特阿拉伯将被拉下水，而且其经济发展将要永远依赖于美国。沙特阿拉伯经济西化的程度越高，这个国家与美国的体制就越能产生共鸣，甚至完全融入到我们的体制中。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在利雅得街头翻垃圾觅食的羊群就是切入点。沙特阿拉伯的有钱人坐飞机到处游玩，他们希望用更体面的现代化设备代替羊群，那样才能跟得上现代化的脚步，我也知道欧佩克成员国的经济学家都强调，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应当从石油中获得一些增值产品。经济学家敦促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工业，除了出口原油以外，还应该生产一些以石油为原料的产品，以一个比销售原油更高的价格销往全球各地。

明白这两点，我也就明白了怎样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羊群，当然不过是一个切入点而已。沙特阿拉伯人将用他们的石油收入来租用美国公司先进的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从而取代羊群，他们将为这个时髦的科技倍感自豪。

我明白了，以机器取代羊群只不过是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模式几乎可以适用于该国所有的经济部门，这是王室人员、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因公司老总们心目中最成功的模式。在这个模式的指导下，资金将被用于创建一个针对将原油加工为可出口的成品油行业。大量的石油化合物将在这个国家的沙漠中出现，规模庞大的工业园也将层出不穷。很自然，这样一个计划要求建立可发电千兆瓦特的发电系统、输电线和配电站、高速公路、管道、通信系统、机场、改良的海港、一系列配套服务产业和交通运输系统，这样才能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

我们对此计划有着极高的期望，该计划将成为我们在全球各地大展拳脚的模式。游遍全球的沙特阿拉伯人也将为我们高唱赞歌，他们将邀请全球各

国的领导参观我们创造的奇迹。接着参观过沙特阿拉伯的这些领导人也会邀请我们帮助他们设计类似的项目在欧佩克以外的国家，我们安排世界银行或者借贷机构为其提供资金。这样一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全球帝国的胃口。

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羊群，想起了那天司机对我说的一句话：“自尊心很强的沙特阿拉伯人从来不会干收集垃圾的活儿。”这句话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响。显然沙特阿拉伯不会让其国民干如此卑贱的事情，不仅仅是垃圾处理，就连工厂或其他项目的建设，他们也不会干，而且他们的人口太少。另外，沙特阿拉伯王室对其国民提倡的也是一种与体力活儿格格不入的教育和生活方式。沙特阿拉伯人也许愿意管理别人，可他们从来就不愿意成为工厂工人或者建筑工人。因此，进口劳动力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必须是一个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国家，而且同时这个国家的人迫切需要工作。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劳动力应该来自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像埃及、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和也门等。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也给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发展计划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首先，要引入外来劳动力就必须为他们建造庞大的住宿综合楼，同时还有购物广场、医院、消防队、警队、供水和废水处理站、供电、通信以及交通网络。计划的最终结果是，在原来荒芜的沙漠上建造一座现代化城市，同时也有机会为沙特阿拉伯引入新兴科技，如海水淡化系统、微波系统、综合医疗保健系统以及电脑科技。

在沙特阿拉伯，那些计划制定者以及可以染指工程和建筑的人将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这是个机会，他们将以快捷的方式迈向现代化。

我必须承认，我非常热爱目前的工作。在沙特阿拉伯也没有所谓的硬数据可言，我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里没有找到，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证明沙特阿拉伯在正确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式。

没有任何沙特阿拉伯人知道我们将会作出怎样的经济预测。而我只不过是將我的想象力融入到工作中去，写出这个国家美好未来的报告。我只有一

第 14 章 沙特阿拉伯的洗钱风波
Chapter 14 The Saudi Arabian Money-laundering Affair

些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据，诸如发电瓦瓦的成本，每英里公路的造价，为每一个工人提供用水、污水处理、住房、伙食以及公共服务的成本。我无需细化这些数据，也无须得出最终结论。我的工作就是描述一系列可能性（更准确地说，也许只是“设想”），然后粗略地计算出与之相关的费用和成本。

当然对于真正的目标我总是铭记于心的：让美国的付出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让沙特阿拉伯更加依赖美国。无须深入思考便可明白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几乎所有新近开发的项目都需要不断地更新和维修，而这些维修工程的技术含量相当高，所以必须由其建设公司来负责。实际上，当我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我开始为每一个我预测的项目列出两个清单：一个是我们可能得到的设计和建设的合同，另外一个长期维修和管理的协议。美因、贝泰、布朗-路特、哈里伯顿、斯通-韦伯斯特还有其他许多美国工程公司和承包商将在未来的 10 年里获得滚滚财源。

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个秘诀可以让沙特阿拉伯依赖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保守的穆斯林大发雷霆，以色列和其他邻国就将感到威胁的存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将带来另外一个行业的发展：保卫阿拉伯半岛所需的军事化设备建设，而专精于此的私营企业以及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将得到不计其数的工程合约，而且还有长期维修和管理协议。所有这些都要有配套的工程，包括机场、导弹发射场、员工基地和所有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将我的报告用信封装好，通过公司办公室间的邮件系统，寄给“财政部项目经理”。我时不时与我们小组的另外几个人会面，他们是美因公司的几个副总裁和我的上司。由于我们并未给此项目命名，而且该项目仍在研究和发展阶段，尚未成为联合委员会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只是私底下把它称为“SAMA”。“SAMA”的字面意思是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Saudi Arabian Money-laundering Affair）的首字缩写，可这这也是一个半开玩笑的文字游戏，这个王国的中央银行名称是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udi Arabian Monetary Agency），缩写正巧也是“SAMA”。

财政局的一位代表偶尔会列席我们的会议。在这种场合召开的会议，我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都极少提问，我主要是陈述一下我的工作，对他们的评价稍加回应，尽量回答他们提出的一切问题。副总裁和财政部的代表对我提出的长期维修和管理协议尤为感兴趣，这使得我们其中的一位副总裁忍不住开了一个玩笑（之后经常挂在我们口头的玩笑）沙特阿拉伯是“一头可以让我们挤奶挤到退休为止的奶牛”。这句玩笑在我的脑海里反映出来的是羊，而不是牛。

在那些会议上，我得知我们的竞争对手也肩负着类似的任务。我估计美国和其他对手公司前期工作的经费都是自行负担的，以短期的、资金上的大量投入来博取胜出的机会。这个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我在日常考勤单上记下了工作的时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常规的公司员工费用账户。几乎所有项目在研究和发展建议的准备阶段，公司都自行承担各项费用。这样一来，前期投资远远超出了预算，可是公司副总裁们对投资的回报非常有信心。

尽管竞争者甚众，我们却都认为有足够的合同可以分摊。我在这一行也算是老手，所以相信财政部对我们工作的认同程度将反映在我们得到的报酬上：谁制定的计划能最后被认为是可行的，谁才能得到众多合同中的“精华”部分。我希望制定出能走到设计和建设阶段的计划说明书，并把这个当成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我在美因公司的仕途已如日中天，作为“SAMA”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自然是我步步高升的保证。当然，如果我们胜出的话。

在那些会议中，我们也公开讨论了“SAMA”以及整个沙特阿拉伯城市规划中创新的可能性。“SAMA”代表着一种创新的方式，无须通过国际银行给某个国家制造巨债而让我们获得厚利。说到这里，我们会立刻想到的是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典型例子。况且，人总有种学习榜样得天性的天性，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很可能会被事实打动，愿意效仿沙特阿拉伯。

我为那个“计划”工作了8个月（每次都要集中而紧凑地工作一段时间）要么在我的私人会议室，要么在我那俯瞰波士顿中心公园的家中。我的员工当时似乎都有别的任务在身，多数时间只是自己照管自己，尽管我也定期给他们签到。时间一长，我们工作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失，多数人都意识到围绕着沙特阿拉伯肯定有大事发生。一时间群情汹涌，流言蜚语四起。副总裁和财务部的代表似乎也更加坦率，至少我认为部分原因是：随着这个

“天才计划”的更加明朗化，他们对个中内情已了解得更多，从而对不久之后将拥有滚滚财源而感到十分快慰。

随着这个计划逐渐成熟，华盛顿政府要求沙特阿拉伯保证对美国的原油供应，同时将价格维持在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其他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或者委内瑞拉等国胆敢以禁运为威胁手段，沙特阿拉伯这个石油供应国的老大，必须出手相助填补差额。这样一来，别的石油出产国得知沙特阿拉伯将有此举，他们也就不敢轻言石油禁运了。为了换来这个保证，华盛顿政府将与沙特阿拉伯王室达成一桩令人叹为观止的交易：美国承诺给沙特阿拉伯王室绝对的和明确的政治支持，一旦需要，哪怕是采取军事行动也要保证他们在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地位。

这是一桩沙特阿拉伯王室无法拒绝的交易。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但其国内缺乏军事实力。总的来说，面临像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和以色列等邻国，沙特阿拉伯显得非常脆弱。华盛顿利用其军事优势又创造了一个决定性条件，这个条件重新定义了经济杀手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给我们以后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伊拉克运用这一套提供了借鉴。现在回想起来，我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沙特阿拉伯会接受这样一个条件。当然，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国家在发现这桩交易的条件以及沙特阿拉伯王室对华盛顿处处忍让的事实之后，都惊骇万分。

这个条件是，沙特阿拉伯将用自己挣来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政府的有价证券，而这些证券赚取的息金由美国财政部来支配，保证让沙特阿拉伯从一个中世纪般的落后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换言之，沙特阿拉伯那不计其数的石油收入产生的利息，将用来支付给美国公司，用于实施我（以及美国的手公司）制定出来的规划方案，用于建设沙特阿拉伯的工业。而美国财政部将用沙特阿拉伯人的钱来雇佣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全国上下建立基础设施工程——甚至是重新建造一座城市。

尽管沙特阿拉伯人保留了改动建设项目种类的权利，事实上阿拉伯半岛将来的模样和经济组成都将由外国精英军团（穆斯林眼里的异教徒）来决定。这些变化竟然要发生在一个瓦哈比主义统治了几百年的国家里。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表面上，就沙特阿拉伯人而言，这是信仰上的一个巨大飞跃。在华盛顿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沙特阿拉伯王室其实也没有其他选择。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交易，并且可以长期为我们带来滚滚财源。让这个交易更加“美味”的是，没有人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这个最让企业憎恨的手续，尤其是像贝泰和美因等私营企业，这些公司最不愿意公开他们的账簿，也不愿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秘密。中东学院的专家助理托马斯·W. 李普曼 (Thomas W. Lippman)，曾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就曾意味深长地总结了这项交易的特点：

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人，将大把大把的钱拱手送给美国财政部，而美国财政部将一直控制着这些资金直到将其付给美国商人或者雇员。这个体系保证沙特阿拉伯的钱周而复始地注入美国经济……这也保证了财政部的经理人可以承建所有他们与沙特阿拉伯认为需要的项目而无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尽管这些工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是为它们制定计划所花的时间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短，在那以后，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实行我们的计划。为了赶快行动起来，必须让政府要员到沙特阿拉伯访问，这是一个绝对保密的使命。我虽然不是很肯定，但相信这位特使是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不管特使是谁，他的第一件任务是提醒沙特阿拉伯王室，要避免在沙特阿拉伯出现像伊朗摩萨德企图赶走英国石油公司那样的现象；第二，他将描绘出一幅让沙特阿拉伯无法抗拒的美好蓝图，向沙特阿拉伯传达“他们已别无选择”的信息。我毫不怀疑沙特阿拉伯已经清楚这一点，要么乖乖合作，接受美国的全盘计划，由美国来保护其统治地位；要么拒绝合作，然后遭遇像摩萨德一样的下场。当这位特使回到华盛顿时，他带回的信息是：沙特阿拉伯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

此外，我们还必须让沙特阿拉伯在王室内部达成共识。我们知道，这是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内部问题，沙特阿拉伯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要

让沙特阿拉伯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必须让沙特阿拉伯王室内部成员之间达成某种共识。

1975 年，我被派遣访问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我只记得他是“王子 W”，尽管我从来不确定他是不是皇储。我的工作是要说服他相信，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不但对他的国家，而且对他个人也极其有利。

一开始，事情并不如想象中如意。“王子 W” 尽显其瓦哈比教徒的本色，坚持不愿意看到他的国家踏上西方重商主义的道路。他声称他知道我们计划背后的阴谋，知道我们的目的与 100 年前东征的十字军是一样的：将阿拉伯世界基督教化。事实上他只说对了一半，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声称其目标是将穆斯林从炼狱中拯救出来，我们则是帮助沙特阿拉伯实现现代化。说实在的，我相信十字军的意图与公司王国没有两样，他们的首要目的都是谋求帝国的扩张。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瓦哈比王子另一个爱好就是迷恋金发美女。说起来还真有些滑稽，我得说明的是在我所认识的沙特阿拉伯人当中，他是唯一有此爱好的，或者是唯一愿意让我知道这一点的沙特阿拉伯人。可是在这桩交易中，他的这种爱好却帮了我大忙。

第 15 章

“拉皮条”及资助奥萨马·本·拉登

瓦哈比王子一开始就告诉我，只要他到波士顿看我，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希望我可以帮他找一个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来服侍他，而且他想要的，不仅仅是简单地陪他游玩的女人。可是他又明确指出不要职业的应召女郎，不要那些他在大街上或者鸡尾酒会可以随意碰到的女郎。我与王子的每次会面都是私下进行的，这样我就更容易满足他的要求。

“萨利”是一个美丽的金发蓝眼珠的女孩，她住在波士顿地区。她的丈夫是联合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经常因公或因私出门在外，而且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不加掩饰。而萨利对她丈夫也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她欣赏的是他的高薪和波士顿的豪华公寓，以及作为一个飞行员的妻子可以享受到的各种优厚待遇。10年前，她是一个嬉皮士，早已习惯了滥交，而且对她来说，偶尔赚点外快也是不错的。她表示愿意尝试一下与沙特阿拉伯王子在一起，但她有一个条件：她坚持他们未来要维持怎样的关系全部要看王子的行动以及对她的态度。

我很走运，他们两个似乎都很满意对方。

沙特阿拉伯王子与萨利的风流韵事，不过是“沙特阿拉伯洗钱风波”里的小波澜而已，但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美因公司严格禁止竞争对手采取任何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是为他人做淫媒，通俗来讲就是扯皮条。在马萨诸塞州这可是违法行为，因此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

给萨利支付酬金。

幸运的是，我公司的审计部门对我的开销给予了很大自由。给小费的时候，我通常是一个慷慨的顾客，我成功地说服了绝大多数的波士顿高级餐馆服务员为我提供空白收据，要知道那时候的收据都是人手写的，无须通过电脑。

渐渐地，瓦哈比王子胆子更大了。后来他要求我安排萨利到沙特阿拉伯去，住进他的私人别墅。当时欧洲某些国家与中东国家之间的这种拉皮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妇女签下特定的合同到中东国家去，待合同期满她们就回到自己家中时，银行账户上已经有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一位在中央情报局运作理事会工作了20年的中东事务专家罗伯特·拜尔（Robert Baer）概括说：“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美元开始大量涌入，有胆量的黎巴嫩人开始走私妓女到沙特阿拉伯，献给该国的王子。由于沙特皇室成员挥霍无度又不懂理财，黎巴嫩人因此变得非常富有。”

我对此也略有了解，甚至认识一些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中介人。可是，我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萨利不愿意离开波士顿前往沙特阿拉伯；第二是付款方式。在中东，我找不到可以给我开空白收据的地方。

沙特阿拉伯王子解决了后一个问题，他答应自己给情人付钱，我要做的只是想办法安排她过去。让我更加放心的是，王子说跟他到沙特阿拉伯去的“萨利”，不一定非得是在波士顿陪他的那一位。我立刻致电几位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与黎巴嫩人有接触的朋友。几个月之后，另一位“萨利”签下了合同。

瓦哈比王子是个复杂的人。萨利满足了他肉体上的欲望，而我在这方面对他的帮助也赢得了他的信任。可是这远远未能说服他在沙特阿拉伯推行我们的“SAMA”大计，为了取胜，我不得不加倍努力。我花了不少时间向他展示各种数据，帮助他分析我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前的几个月与克罗汀一起作出的研究计划。最后，他终于接受了我们的计划。

我并不清楚我的同事与其他沙特阿拉伯关键人物之间的进展如何，只知道最后沙特阿拉伯王室全盘接受了这个计划。而美因公司也获得了几个高利润合同中的一个。与此同时，我们也接到任务，要对沙特阿拉伯过时的供电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系统进行全面更新，并且设计出一个全新的供电系统。

一如既往，我的职责是派先遣队为沙特阿拉伯每个区域的经济情况和电力负荷作预测。先遣队中有三个人是我的部下，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国际项目策划经验。正当他们准备出发前往利雅得的时候，公司法律部忽然传话下来，据合同规定，我们必须在到达利雅得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将办公室设施准备妥当并投入使用。显然一个多月以来，没有人留意到这个条款。我们与财政部的协议也规定必须在美国或者在沙特阿拉伯生产所有的设备。由于沙特阿拉伯没有工厂可以生产这些设备，因此所有的设备都必须从美国运过来。让我们感到懊恼的是，阿拉伯半岛港口外油轮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在等待进入港口，如果通过海运的方式话，光排队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美因公司可不愿意因为几个办公室的设备而丢掉了这桩大合同。在各方代表参与的会议中，我们群策群力集体讨论了数小时，最后得出了解决方法：租用一部波音 747 飞机，从波士顿地区的店铺装载好货物，空运到沙特阿拉伯去。我记得当时我曾经想过，这架飞机要是恰好属于联合航空公司，飞行员又正好是萨利的丈夫，那就真是太可笑了。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交易，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这个沙漠王国。200 辆鲜黄色的美国垃圾收集车代替了昔日清理垃圾的羊群。垃圾收集车由美国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提供，该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价值 2 亿美元的合同。沙特阿拉伯的每个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展了现代化进程，从农业、能源、教育到通信。托马斯·李普曼 2003 年评论说：

高楼大厦将会替代沙特阿拉伯牧民破烂的帐篷和贫困农民低矮的土坯房，市中心将建立起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厅，新建的大楼也会有供轮椅上下的斜坡，一切将变得更加现代——像美国一样。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如同繁华的美国市郊地区，高速公路纵横交错、电脑普及、装有空调的大型购物商厦随处可见，豪华舒适的酒店、连锁快餐店、卫星电视、现代化的医院、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以及设有过山车的游乐场也比比皆是。

1974 年构思的计划为日后我们在其他石油盛产国的谈判设定了标准。在一定程度上，“SAMA”计划和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计划是继克米特·罗斯福在伊朗的成功之后，美国全球帝国成就的又一个高峰。这些计划，为全球帝国“新型军队”引入了一种创新的诈骗式武器。

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和联合委员会也让国际法开了不少先例。这在伊迪·阿明(Idi Amin)事件中尤为突出。1979 年，这个臭名昭彰的乌干达独裁者流亡国外，沙特阿拉伯给予了他庇护。尽管他曾经让乌干达近 3 000 人无辜死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君，但沙特阿拉伯仍让他过着奢华的生活，王室还为他配备了汽车和佣人。对于这些做法，美国政府表示了无声的抗议，但他们却拒绝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施压，他们怕因此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伊迪·阿明悠闲地过着他的日子，去海边垂钓或去沙滩漫步，丝毫没有因为以前的暴行而有所忏悔。2003 年，80 岁的暴君伊迪·阿明因肾衰竭在吉达丧命。

不过，最令人费解也是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对沙特阿拉伯资助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默许。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公开支持奥萨马·本·拉登发动反对前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并且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据统计，在这期间利雅得和华盛顿为伊斯兰教游击队战士提供了约 35 亿美元的资金。当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参与并不仅限于此。2003 年下半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 杂志进行了一项详尽的调查研究，该调查报告名为“沙特联系”(The Saudi Connection)。该杂志审查、参考了几千页的法庭纪录、美国和国外情报报告以及其他档案，并就恐怖主义和中东问题向数十位政府官员和专家进行了访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毫无疑问的是：沙特阿拉伯，这个美国长期的盟友和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位财政部官员口中所说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伊朗革命和阿富汗战争的双重惊吓下，沙特阿拉伯的半官方慈善机构成为发展迅猛的伊斯兰圣战运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Jihad)^①的主要资金来源。

在大约 20 个国家里，这些资金被用于建设军事训练营地、购买武器和招募新成员……

2001 年世贸大厦和国防部遭受袭击之后，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华盛顿与利雅得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2003 年 10 月，《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一篇名为“救救沙特阿拉伯人”的报道，揭露了大量之前从未公开的信息，还揭露出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和本·拉登家族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我并没有感到惊讶。

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追溯到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 1974 年，更远点的可以追溯到乔治·H. W. 布什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时期（1971-1973 年），然后是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期（1976-1977 年）。让我惊讶的是，媒体居然知道了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之间的这层关系。《名利场》杂志的结论是：

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这两个全球最显赫的王朝之间私人的、商业的和政治上的纽带一牵就是 20 多年……

就私营部门而言，沙特阿拉伯支持着哈肯能源公司 (Harken Energy)，一个由乔治·W. 布什投资却处于挣扎境况中的石油公司。最近，前总统乔治·W. 布什及其长期盟友前国务卿詹姆斯 A. 贝克三世 (James A. Baker III)，都列在了全球最大私人股份公司卡莱尔集团 (Carlyle Group) 资金的筹集者名单中，位置排在沙特阿拉伯的前面。现在，前总统老布什继续为该公司担任高级顾问，该公司的投资者包括了一位被指控涉嫌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沙特阿拉伯人……

“9·11”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里，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人，包括本·拉登的家族成员，乘坐私人飞机偷偷逃离美国。没有任何人

①伊斯兰圣战 (Jihad)：伊斯兰讨伐异教徒运动。——译者注

第 15 章 “拉皮条”及资助奥萨马·本·拉登
Chapter 15 Pingying, and Financing Osama bin Laden

承认曾向他们发放通行证，也没有任何人就此事展开调查。究竟是不是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长期的合作关系，为这一切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呢？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原油期货开平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6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第三部分

1975—1981 年

第 16 章

巴拿马运河谈判与格雷厄姆·格林

沙特阿拉伯成就了不少人的事业，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沙漠国家所取得的事业上的成功，为自己日后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到 1977 年，我已经成功地在波士顿建立起一个由 20 位专业人士组织起来的小王国，还有一批来自美因公司在全球各地其他部门和办公室的顾问，我成为美因公司百年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我拥有的头衔除了首席经济师之外，还有就是经济和区域策划经理；我在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地方讲课，报纸也邀请我写时事评论文章；我有一艘游艇，它与历史悠久的“宪法”号战舰（Constitution）“老铁甲”（Old Ironsides）并排停靠在波士顿港口，“宪法”号战舰因其赫赫战绩而闻名——它曾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征服了北非伊斯兰教海盗；我有一份令人艳羡的薪水，我拥有的股份可以保证我在 40 岁之前就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没错，我的婚姻是失败了，但我却与许多国家的无数年轻貌美的女子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布鲁诺找到了一种全新的预测方法，一种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位俄罗斯数学家的著作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式。这种模式为预测特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可以借助这一绝好工具，“预测”出我们想要的经济增长数据，从而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接受我们提供的巨额贷款。但布鲁诺对于如何具体地利用这种经济学模式还是存有疑问。

后来，我请了一位年轻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数学家纳迪普拉姆·

一个经济系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普拉萨德（Nadipuram Prasad）博士到我的部门，并且支给他一笔经费，让他在6个月之内为计量经济学模式研究出一套算法（Markov method）。6个月月后，纳迪普拉姆·普拉萨德交上了他的算法，我们给它命名为“马尔可夫算法”。后来我们又共同撰写了一篇技术论文，这篇论文认定马尔可夫算法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对于正确预测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一套科学地“证明”我们是为其他国家做好事的理论——尽管这种方式让他们背上永远无法偿清的债务。另外，由于马尔可夫算法非常复杂，因此只有那些非常专业的计量经济师才有可能理解其原理，或者是对其结果提出疑问。这篇论文被不少知名的媒体刊物转载，我们也在不少学术会议以及大学讲座等正式场合公开介绍了马尔可夫算法。至此，我们在业界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奥马尔·托里霍斯和我都尊重彼此之间的秘密协议。我向他承诺，我们的研究和建议将考虑到巴拿马的贫苦人民。尽管我已听到有人埋怨，说我对巴拿马经济发展的预测没有达到预期的夸张程度，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做法有点儿社会主义。不过结果是美因公司不断从托里霍斯政府得到建筑合同，这些合同还包括了一个优先向他们提供涉及农业及其他传统基础设施部门的主要改革计划。这个时候，托里霍斯和吉米·卡特总统（Jimmy Carter）正准备就《运河条约》进行谈判。

运河谈判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他们都想知道，美国是让巴拿马重新获得运河控制权，还是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人民在恰当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理性和富于同情心的人当总统。可是，华盛顿的保守派和宗教右翼势力非常愤怒，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可以放弃这道天然的军事屏障、这条南美洲和美国之间的财富纽带？

在巴拿马的前几次旅程中，我习惯住在洲际酒店（Hotel Continental）。不过，在我第五次访问该国的时候，我住进了洲际酒店对面的巴拿马酒店（Hotel Panama），因为洲际酒店正在装修，噪音非常大。一开始，我很不习惯，因为我已认定洲际酒店为我在国外的第二个家，可是当我坐在巴拿马酒店豪华的大厅里，这里的藤椅和巨大的木吊扇逐渐赢得了我的好感。这就像

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剧情场景一样，我幻想着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① 随时会信步而至。我刚好看完《纽约书评》中一篇格雷厄姆·格林写的有关巴拿马的文章，把书放下后，我开始盯着木吊扇的扇页，我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晚上。

“福特是一个软弱的总统，他不可能再次当选。因此，我决定要加快运河问题的解决步伐。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将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以重新夺回运河管理权。”当时他面对着一群有影响力的巴拿马人进行演说。我是受邀请到那个格调优雅的老俱乐部的少数几位外国人之一，那里也有着同样转动着的吊扇。

托里霍斯的话激发了我的灵感。我一回到酒店房间开始写信，这封信最后寄到了《波士顿环球报》。后来该报的一位编辑打电话和我进行了沟通，他要求我写一篇社评，我答应了。1975年9月19日，一篇名为“1975年殖民主义在巴拿马无处容身”的社论占了《波士顿环球报》对开版面的半版。

文章指出，应该将运河归还给巴拿马：第一，继续拥有运河的控制权对巴拿马人民来说是不公平的；第二，目前的条约带来了更严峻的安全隐患，比向巴拿马人交还运河控制权造成的风险可能更大。我引用了由洋际运河委员会（Interoceanic Canal Commission）的一个调查研究结果，该结果推断：“如果有人在加顿大坝（Gatun）附近投下一颗炸弹，那么未来的两年内，这里的交通流量将至少减少一半以上。”这也是托里霍斯公开强调的一点；第三，目前的形势对已经非常紧张的美国-拉美关系不利。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

保证运河继续有效运作的最好方法是帮助巴拿马人重新取得对运河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为发起了重申民族自决理想的运动而倍感自豪——200年前，我们的祖先怀着同样的梦想……

殖民主义横行的 20 世纪初期，在那个时代签订像《运河条约》

①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电影《卡萨布兰卡》的男主角。——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那样的条约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今天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1975年，世界绝对不能容忍殖民主义的横行。在我们庆祝独立 200 周年之际，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我来说，写下那篇文章是一次冒险的行动，况且最近我还成了美因公司的合伙人。合伙人本应避开媒体，也理所当然不能在新英格兰州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发表如此激烈的政治评论。我在公司的办公邮件里收到了一大堆威胁性的、匿名的留言，留言钉在我的文章上面。我肯定其中有一张留言是查理·伊林沃斯的。他是我第一个项目经理，在美因已有十年之久（而我来这里还不到五年），却仍然未够资格当合伙人。他的信上画着一个醒目而可怕的骷髅，留言很简单：“这个共产主义者真的是我们公司的合伙人吗？”

布鲁诺传召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美因是个相对保守的地方，可我要让你知道，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这样做，托里霍斯也会很高兴，我倒是很希望你可以给他寄一份你的评论。办公室里那些家伙都认为托里霍斯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只要有合同签，他们才不会去理会什么社会主义者。”

布鲁诺是对的，他总是对的。1977 年，正是卡特当政的时候，严肃的运河谈判开始了。美因公司的许多竞争对手因为走错了路，被迫离开了巴拿马，而我们拿到的合同就像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样多。我坐在巴拿马酒店的大堂，看完了格雷厄姆·格林在《纽约书评》中的文章。

这篇《一国五边疆》（*The Country with Five Frontiers*）的文章，探讨了巴拿马国民卫队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作者指出，托里霍斯将军自己也承认他的部下享有丰厚的物质待遇，例如高级的住房等，托里霍斯认为，“如果不给他们这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会愿意为他们提供”，言下之意非常清楚，美国情报机构已下定决心要破坏卡特总统的好意，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将贿赂巴拿马的军队首领，破坏运河谈判。我不禁开始担心，现在的托里霍斯是否已被豺狼紧紧地包围。

我不记得是在《时代周刊》还是《新闻周刊》的“人物”专栏看到过托

第 16 章 巴拿马运河谈判与格雷厄姆·格林
Chapter 16 Panama Canal Negotiations and Graham Greene

里霍斯和格林坐在一起的照片，图片指出这位作家是托里霍斯特别的客人和挚友。我真想知道将军究竟是怎样看待这位小说家的，这位他非常信任的作家写出了那样的评论。

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 1972 年的那一天，我和托里霍斯面对面坐在咖啡桌旁讨论了有关外国援助的问题。那时候，我认为托里霍斯应该清楚外国援助将让他变得非常富裕，而他的国家会负债累累。我当时很确定，他是知道那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高官都容易接受贿赂。但我也很肯定他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他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外国援助来帮助他的国民，而我们认为他的种种想法，对我们整个体系将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人，因为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不容轻视的。

我想知道，如果借贷给巴拿马的资金帮助了穷苦大众而没有让巴拿马背上巨额债务，公司王国会有怎样的举措。现在我也想知道托里霍斯会不会为那天与我达成的交易而后悔，因为连我自己对那些协议也并非全然了解。当时我可以说是暂时脱离了经济杀手的角色，遵循的是他的而非我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接受了他以诚信换取更多合同的条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的决定对美因公司来说是明智的，可是这与克罗汀向我灌输的那种原则是不相容的，这对推进全球帝国毫无帮助。现在豺狼们的笼门是不是准备打开了呢？

当我离开托里霍斯的小楼时，我不禁想，拉丁美洲的历史上有英年早逝的英雄人物，而且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体系是绝不会对一个不愿意接受贿赂的公众人物产生仁慈之心。

当我从楼梯上下来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汉弗莱·博加特从大堂走过。一开始，我很奇怪我怎么会把他看作是汉弗莱·博加特，博加特早已去世。后来我看清楚了，这个从我面前慢慢走过的人正是英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是《自豪与荣耀》（*The Pride and the Glory*）、《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的作者，也就是我刚才阅读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格雷厄姆·格林。格雷厄姆·格林迟疑了一下，向四周张望，然后走进了咖啡厅。

我差点儿就叫出声来，很想跑上前去，可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的脑海中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有个声音告诉我：他不愿意别人认识他，而且他会避开我。我拿起《纽约书评》，可是我很诧异地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咖啡厅的门口。

我早就吃过了早餐，餐厅的领班奇怪地看着我。我环顾四周，发现格雷厄姆·格林独自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旁。我指着他旁边的一张空桌子，对领班说，“就那儿，我可以在那儿坐着再吃一次早餐吗？”

我给小费向来阔绰，领班向我微笑了一下，领着我到了那桌子旁边。

这位小说家正埋头看报纸。我叫了咖啡、牛角包和蜂蜜。我很想知道格林对巴拿马、托里霍斯和运河事件的看法，可我却不知道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他抬起头，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对不起。”我说。

他有点不高兴地盯着我，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什么事？”

“我实在不想冒犯您。可是您就是格雷厄姆·格林先生，对吗？”

“哎呀，确实是的。”他热情地笑了，“在巴拿马多数人不认得我。”

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他是最欣赏的小说家，然后给他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包括我在美国公司的工作和我与托里霍斯的会面。他问我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呼吁美国撤出巴拿马。“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登在《波士顿环球报》上。”

我顿时目瞪口呆。

“确实是勇气之举，尤其以你所处的位置来说。”他说，“过来我这边坐吧。”

我挪到他的桌子旁，和他一起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从交谈中，我才知道他与托里霍斯的交情非常深厚。有时候，他提及这位将军就像一位父亲提起他的儿子那样。

“这位将军”，他说，“邀请我为他的国家写一本书。我现在正在起草。这不是一部小说，所以对我来说是超出我的写作范畴了。”

我问他为什么通常写小说，而不写非小说作品。

“小说比较安全。”他说，“我写的小说的题材多数具有争议性，像越南、海地、墨西哥革命等。许多出版社不敢出版与这些题材相关的非小说类

第 16 章 巴拿马运河谈判与格雷厄姆·格林
Chapter 16 Panama Canal Negotiations and Graham Greene

作品。”他指着我放在刚才那张桌子上的《纽约书评》，笑了笑说：“像那样的话，可能会招来很大的麻烦。而且我喜欢写小说。这样我有更大的自由。”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接着说：“特别是当你要写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例如你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写的有关运河的那些事儿。”

他对托里霍斯的赞赏溢于言表。看来巴拿马的国家领袖不但可以感动他的贫苦国民，还可以感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与之同样明显的是，格林对他的朋友的生命也非常担心。

“这是非常艰难的，”他大声说，“要对付北半球的巨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伤心地摇摇头，“我担心他的人身安全。”

接下来，他准备离开了。

“我得赶一趟去法国的飞机。”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地站起来和我握手。他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何不尝试写一本书？”他带着鼓励之情冲我点点头，“你自己决定吧。不过你要记住：如果要写，就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转身离去。突然他停下脚步，转头走到我面前。

“别担心，”他说，“将军会成功的，他会夺回他的运河。”

托里霍斯最后确实夺回了运河。那一年，1977年，他成功地与总统卡特缔结了新的《运河条约》，将运河区和运河交回到巴拿马人手中。因此，白宫不得不说服国会认可新条约，最后又不得不以投票的方法来决定最后的选择。结果是：仅仅以一票的优势让新的《运河条约》得以通过，但保守派人士发誓要报复。

多年后，当格雷厄姆·格林的非小说作品《走近将军》（*Getting to Know the General*）出版的时候，他注明：“此书献给我的朋友奥马尔·托里霍斯以及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朋友们。”

第 17 章

伊朗“万王之王”

1975 到 1978 年期间，我经常到伊朗访问。有时候我还会在拉丁美洲国家或者印度尼西亚与德黑兰之间穿梭。伊朗的万王之王（Shah of Shahs，字面意思是“万王之王”，他的头衔）让我看到的是一种与我工作过的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情况。

伊朗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像沙特阿拉伯一样，所以无须给他们制造巨额的债务，就可以投资该国那许多个让人羡慕的工程项目。但是，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人口组成，伊朗绝大多数是中东人和穆斯林，而不是阿拉伯人。此外，该国的政治非常不稳定，不仅是国内的，与邻国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让华盛顿和商业界联合起来，为伊朗国王塑造一个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形象。

我们能够造就一位强大而民主的盟友，他能帮助实现美国的企业利益及政治利益。世人尽可忽略他那看起来并不民主的头衔，还有那并不昭然的事实——中央情报局协助他发动政变，从民主选举的前总理手中夺到王位。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友决心将伊朗政府作为他们帝国主义进程中下一个操控的对象，但与此同时，伊拉克、利比亚、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强大的反美暗流开始浮出水面。

从表面上来看，伊朗国王是伊朗低层人民的朋友：1962 年，他下令将私人拥有的大片土地拆分，转归农民所有；第二年，他发起的“白色革命”

第 17 章 伊朗 “万王之王”
Chapter 17 Iran's King of Kings

(White Revolution) 包括了一个详尽的社会经济改革计划。20 世纪 70 年代，欧佩克的力量开始壮大，伊朗国王作为领导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伊朗的军事实力使它成为中东穆斯林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美因公司参与了伊朗大多数的工程项目，包括北部里海附近的旅游区和南部俯瞰霍尔木兹海峡的秘密军事基地。同样，我们工作的重点也是预测区域的发展潜力，然后设计一套发电、供电和配电系统，为在未来实现我们工业增长和商业增长的目标提供至关重要的能源供应。

我的足迹曾踏遍伊朗的主要区域。我沿着古老的大篷车商队走过的路，穿过沙漠中高大的沙丘，从基尔曼 (Kirman) 到阿巴斯港 (Bandar Abbas)，也曾漫步在波斯波利斯古城 (Persepolis) 的废墟上。波斯波利斯是古代帝国国王的传奇宫殿，也是古代文明的奇迹之一。我游览了伊朗最著名也最壮观的景点：设拉子、伊斯帕罕、波斯波利斯城附近的宏伟的帐篷之城——伊朗国王加冕的地点。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伊朗这块土地和人民萌生了发自内心的热爱。

表面上，伊朗看起来是一个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和平共处的榜样。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在平静的外表之下，掩盖着深深的怨恨。

1977 年的一个晚上，我回到酒店时已经夜深人静了，发现房间门缝下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亚明”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可曾在一份政府简报上听说过这个名字，他被称作是臭名昭著的激进分子。纸条上，他用非常漂亮的英文邀请我到某餐馆与他见面，他说我也应该去了解像我这种地位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伊朗的另一面。我知道此行会很危险，但是我很想去看看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想做些什么。

我乘坐的出租车停在一堵高墙的一扇小门前面，这堵墙很高，我甚至看不到墙背后的建筑物。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美丽的女子招呼我进去，领着我穿过一条低矮但顶上垂下华丽灯饰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我们走进了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面的强光很刺眼。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只见墙上镶满了宝石和珍珠，造型非常精美的青铜吊灯将整个餐厅照得透亮。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穿着深蓝色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走过来与我握手，他自我介绍说他就是亚明，从他的口音可以听出他是个曾在英国学校接受过教育的伊朗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危险的激进分子。他向我保证我们的谈话将完全保密。

亚明非常热情。在与我的谈话中，他显然仅仅把我看作是一个经济顾问，而且没有什么不可告人想法的顾问。他解释说，之所以要与我见面是因为他知道我曾是一位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利用每一个机会了解他的国家，并且努力融入伊朗人民的生活。

“对于从事你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很年轻，”他说，“我知道你对你国家的历史和现存的问题很感兴趣。你代表着我们的希望。”

他说的这些话以及当时的情形，让我感到一丝欣慰。许多人喜欢把我当朋友对待，这个我早就已经习惯了，像印度尼西亚的雷西和巴拿马的菲德尔，我总将这个看作是对我的夸奖，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同他们进行深度交流的机会。我清楚我之所以比其他美国人做得更出色，是因为我每到一处都会被其深深吸引。我发现只要你愿意对他们的文明睁开你的眼睛、张开你的耳朵、敞开你的心扉，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对你热情相待。

亚明问我是否听说过“让沙漠开满花”计划（Flowering Desert project）。“伊朗国王相信我们的沙漠曾经是一片肥沃的平原，上面有广袤的森林。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据推测，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大批的军队带着不计其数的羊群横扫此地，这些牲畜将所有的草和植物都吃光了，生态失去平衡导致了旱灾的发生，最后整个地区变成了沙漠。现在我们要做的，或者说如伊朗国王所想的，就是在这里种植数百万棵树木。那样，整个地区将会恢复生态平衡，雨水也将重降此地，沙漠将再次变成绿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他微笑着，好像给我恩赐似的说，“像你们那样的公司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我猜你应该不会相信这个推测，沙漠不过是个象征。沙漠的‘绿化’含义不仅仅限于农业耕种。”

这个时候几个服务员举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托盘上盛满了制作精美的

伊朗食物。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亚明从托盘里挑选了几种食品，然后继续与我交谈。

“请恕我冒昧，可我想提个问题，珀金斯先生。究竟是什么摧毁了你们的土著人——印第安人的文明？”

我回答说有许多原因，包括贪婪和精良的武器。

“对。那倒是真的，这些原因都有，可最主要的不是因为环境被破坏了么？”他接着解释了为何一旦森林被破坏，野牛等动物就灭绝了；一旦强暴的殖民者闯入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文明的根基就崩溃了。

“你明白吗？在这里也一样。”他说，“沙漠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让沙漠开满花’的计划威胁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团结。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

我告诉他我对此的理解是，“让沙漠开满花”计划背后做主的都是他们伊朗人。他冷笑着说，这个想法是由美国政府灌输到伊朗国王思想中的，而伊朗国王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一个真正的波斯人绝对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亚明说，然后又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其国家的人民，如贝多因游牧民族（Bedouins）与沙漠之间的关系的长篇演说。他强调许多伊朗人喜欢在沙漠中度假，他们搭起宽敞的帐篷，一家人在里面住上一两个星期。

“我们，我的同胞，都是沙漠的一部分。尽管伊朗国王声称他所统治的臣民也就是在他铁腕之下的人，不完全属于沙漠，而我们就是沙漠。”

之后，他给我讲述了他在沙漠里的个人经历。夜深的时候，他陪我走出高墙里的那扇小门。我的出租车在街上等着我。亚明与我握别，并且感谢我的到来。

第 18 章

受刑者的自白

几天后，亚明开车带我走出了德黑兰市区，车子穿过烟尘滚滚的贫民区，沿着一条骆驼行走的路，来到了沙漠的边缘。落日渐渐消失在城市背后，他的车在一座四周被棕榈树环绕着的小泥屋旁停下。

“这是个非常古老的绿洲，”他解释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到来之前的几百年。”他领着我走进其中的一间小屋，“屋里的人曾经在你们国家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由于某些原因，他不能透露姓名，你可以叫他博士。”

他敲了敲木门，里面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应答。亚明推开门，把我带进屋子里，这个小房子里没有窗户，仅有一盏油灯在点着。在眼睛适应了这里昏暗的光线之后，我看到泥地上铺了一张波斯地毯。一个男人朦胧的轮廓出现在眼前，他坐在油灯前，光线正好照不到他的面部，我只能看清他身上裹着毯子，头上也蒙着些什么。他坐在轮椅上，除了那张小桌子，屋里唯一的家具就是这张轮椅。亚明示意我坐在地毯上，他自己却走上前去拥抱了那个人，并在那个人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来坐在我旁边。“这位是我曾经和你提过的珀金斯先生，”他说，“我们都很荣幸有此机会与您会面，先生。”

亚明再一次跟博士提到我的年轻、开明，以及我是一名首席经济师。亚明觉得我所处的职位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很高兴能与像您这样的人畅谈，”他握紧我的手，“我只想让你再帮我一个忙，我并非说说而已，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今晚与您的交谈将对你有极大的意义，你将从中获益匪浅。”

“那究竟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我希望可以将你介绍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我们‘万王之王’的事情。”

这时候，那位博士用纯正的英文对我说：“珀金斯先生，欢迎您。”他的声音非常低沉和沙哑。我发现我的身体在不自觉地向我前面那狭小的空间里倾斜过去。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废人。我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健壮。我曾经是伊朗国王的贴身顾问。”他沉默了一阵后呢喃：“伊朗的王中之王，万王之王……”他的声调在我听起来，悲伤甚于愤怒。

“我以前认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戴高乐。他们非常信任我，相信我会帮助他们把伊朗变为一个资本主义阵营里的国家。伊朗国王也很信任我，还有，”他发出像咳嗽般的声音，我却认为那是笑声，“我也信任国王。我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相信他将领导伊斯兰国家进入一个新时代，波斯将实现它的诺言。看起来，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包括国王的、我的，还有所有与生俱来就肩负起这种使命的人的。”

他的身体动了一下，轮椅发出轻微的嘎吱声。我看到他的侧面轮廓、他蓬松的胡子，还有——立刻把我吓住了——他的侧面是平的。他原来没有鼻子！我打了一个寒战，屏住呼吸。

“实在不怎么好看。你是不是想这样说，珀金斯先生？如果你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看到我，我想你会说，真是个丑八怪。”我再次听到那沙哑的笑声。“可是我肯定你会欣赏的。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当然，如果你愿意寻根究底的话，你会知道我的身份。可是你会发现我已经死了，官方记录的我，已经不再存在。不过我劝你不要去做这种尝试，你和你的家人最好不要知道我是谁。伊朗国王和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SAVAK）的魔爪能伸到很远的地方。”

轮椅又慢慢地挪回原来的位置。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看不到这个没有

一个经济赤字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鼻子的脸，多少能让我的心情平静一点。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伊朗有这样的刑罚，那些被认为让国家领导人蒙羞的人，要被割掉鼻子。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打上了终身的烙印——就像他的脸那样。

“我很肯定，珀金斯先生，你在想我们为什么要邀请你来这里。”还没等我回答，轮椅上的人继续说，“你也看到了，这个自称‘万王之王’的人在现实中是个魔鬼。尽管我不想提起，可是我不能否认是在我的协助下，中央情报局夺取了现在这位伊朗国王父亲的王位。中央情报局谴责国王的父亲是纳粹帮凶，在那之后，摩萨德政权也被颠覆了。而现在，我们的这位国王正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在得到你们国家全力支持的情况下做出上述一切的。”

“为什么？”我问。

“很简单。他是你们在中东唯一的盟友，工业世界必须以石油为轴心运转，那轴心就是中东。当然，你们还有以色列，可是以色列对你们来说不过是个累赘，而不是资产。那里没有石油。你们的政客考虑到竞选中要赢得犹太人的选票，还有他们对选举的资助。恐怕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盯着以色列的原因了。可是伊朗才是关键，你们的石油公司需要我们，你们需要我们的伊朗国王，你们对他的这种需要，就像你们需要在越南有一位听从你们指挥的领袖一样。”

“还有其他原因吗？你指的是伊朗的情况与越南一样？”

“情况可能更加糟糕。你也该明白了吧，这位伊朗国王时日无多了。穆斯林世界憎恨他，不仅仅是阿拉伯人，而是所有的穆斯林——印度尼西亚的、美国的，但主要是伊朗国内的波斯人。”我听到“砰”的一声，我意识到他正用力拍打轮椅的两侧，“他是个恶魔！我们波斯人都憎恨他。”接下来是令人窒息的沉默，我听到他沉重的喘息声，他的发泄让他精疲力竭。

“博士和毛拉^①关系密切。”亚明对我说，他的声音低沉而冷静，“在这个国家，不同宗教派别之间勾心斗角，除了少数从伊朗国王的资本主义统治中得益的商界人士。”

^①毛拉 (Mullahs)：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译者注

“我不是怀疑你，”我说，“我已经来这里 4 次了，却从来没有看到一丝憎恨的迹象。和我交谈过的每个人看起来都热爱他们的国王，并拍手称赞经济的腾飞。”

“那是因为你不会讲波斯语，”亚明开口了，“你听到的赞美，都出自从中捞到好处的人，以及从美国、英国留学归来为国王效力的人。而博士是个例外——至少他现在是。”

他停了下来，似乎在思考着接下来该说什么。“这和你们的媒体一样，他们只和他们自己的亲人、自己圈子里的人谈论。很大程度上，你们的媒体也是被石油控制的，所以他们只听他们想听的，写他们的广告客户想看到的。”

“我们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呢，珀金斯先生？”博士的声音比刚才更沙哑，似乎他刚才的发泄让他的精力完全透支了，“因为我们希望你去劝说你们的公司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告诫你，尽管你在这里赚了很多钱，但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个政府时日不多了。”我再次听到他的手猛拍轮椅的声音。“这个政府倒台的时候，新的政府是不会对你们这些人有丝毫怜悯之心的。”

“你的意思是我们将得不到该得的那份薪水？”

博士停下来猛咳了一阵，亚明走上前帮他揉了揉背。咳嗽声停了之后，亚明用波斯语对博士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自己座位上。

“我们必须结束此次交谈了。”亚明对我说，“博士对你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对的，你们得不到酬劳。你们尽管去做你们的工作，等到要付款的时候，伊朗国王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亚明，为什么他和博士愿意预先把这些告诉美因公司。

“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你们公司破产。可是，我们更希望看到你们离开伊朗。如果其中一个美国公司离开了，那就开了一个好头，而这是我们想看到的，你明白吗？我们不想看到这里陷入血战，可是国王必须下台，为此我们会不顾一切。现在还有时间，所以我们向真主祈祷，你能在血战开始之前说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服扎姆波蒂先生 (Zambotti) 离开。”

“为什么是我？”

“上次与你共进晚餐，我们谈及了‘让沙漠开花’计划的时候，我知道你是愿意去了解事情真相的人。我知道我们对你的认识是正确的——你是一个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一个中立的人。”

我很惊讶他对我有如此深刻的了解。

第 19 章

伊朗国王的垮台

1978 年的一个晚上，我独自坐在德黑兰洲际酒店大堂外边一个豪华的酒吧里，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看见一个身穿西服、个头魁梧的伊朗人站在我身后。

“约翰·珀金斯！你不记得我了？”

这个前足球运动员长胖了许多，可是声音没有变。他是我在米德尔布里的老朋友法哈德，我差不多有 10 年没见过他了。我们相互拥抱了对方。很快我就知道，他对我和我工作了解得很详细，可显然他并不打算告诉我太多有关他自己工作的事情。

我们要了几瓶啤酒后，他说：“还是进入正题吧，明天我要坐飞机到罗马去，我的父母住在那儿。我为你准备了一张机票，这儿的情况非常糟糕，你也必须离开。”他递给我一张机票，我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他说的这些情况。

在罗马，我和法哈德及他父母一起共进晚餐。他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伊朗将军，他曾经英勇地为伊朗国王挡住了一颗子弹，但是现在已经对他的国王彻底失望了。他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伊朗国王逐渐露出了他自大和贪婪的真面目。这位退休的将军谴责了美国政策，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领导层的腐败，政府的专横，他认为这些都是中东大规模仇恨爆发的导火索，他也预测伊朗国王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完蛋。

“要知道，”他说，“在 50 年代，你们美国人推翻了摩萨德时就播下了

反抗的种子。那时候你们觉得做了一件很明智的事情——我当时也觉得你们做对了。可现在它又回来找你们了——还有我们。”我被他的话吓倒了，我在亚明和博士那儿听到过类似的事情，可从这个老人的嘴里说出来又是另外一种味道。那时候，几乎人人都知道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地下组织的存在，可我们相信伊朗国王在绝大多数伊朗人心中是很受欢迎的，因此那几年他的政治仕途一帆风顺。

“记住我的话，”他的语气很严肃，“国王的下台只是一个引子，我们的愤怒埋藏在黄沙底下太久了，很快将会迸发。”

一顿饭的功夫，我听到许多有关阿亚图拉·鲁霍拉赫·霍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① 的事情。法哈德和他的父亲澄清他们并不支持霍梅尼那种狂热的什叶派教义，可显然他们对霍梅尼发起反对国王的革命表示支持。他们告诉我说，霍梅尼 1902 年出生在德黑兰附近村庄里一个虔诚的什叶派学者家庭，“霍梅尼”这个名字的意义是“神所默示的”。

20 世纪 50 年代，霍梅尼明确表示绝不卷入摩萨德与伊朗国王之间的斗争之中。可到了 60 年代，他开始积极反对伊朗国王，猛烈批评这位统治者以至于被流放到土耳其，接着他来到什叶派圣城——伊拉克的纳杰夫 (An Najaf)，在那里他成为一位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他发出信件、散发传单、发布讲话录音，要求伊朗人起义推翻伊朗国王，建立一个教权主义国家。

与法哈德及其父母见面后两天，伊朗传来了爆炸和暴乱的消息，阿亚图拉·霍梅尼和毛拉们开始进攻并很快控制了局面。此后，事态发展极快，法哈德的父亲描述的那种狂怒在一次血腥的伊斯兰起义中爆发。1979 年 1 月，伊朗国王逃到埃及避难，之后被诊断患了癌症，辗转到纽约医院治疗。

霍梅尼的拥护者要求他回国。1979 年 11 月，一伙伊斯兰武装人员封锁了美国驻德黑兰领事馆，劫持了 52 名美国人质，扣留达 444 天。美国总统

^①阿亚图拉·鲁霍拉赫·霍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1902-198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1979 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这次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从推翻国王开始他统治伊朗直到 1989 年去世。霍梅尼去世后，伊决定领袖问题的专家会议根据霍生前意愿，推举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为伊最高领袖。——译者注

卡特试图通过谈判要求他们释放人质，当谈判要求被拒之后，卡特总统在1980年4月授权美军采取军事援救。然而此次营救却酿成了惨剧，这场灾难最后还导致卡特总统下台。

面对美国商界和政界的巨大压力，病魔缠身的伊朗国王被迫离开了美国。从他离开德黑兰那天起，他就陷入了无处容身的窘境，所有的朋友都避开他。不过这个时候，托里霍斯将军却表现出一贯的大度，让伊朗国王在巴拿马寻得庇护，尽管托里霍斯个人也不认同伊朗国王的政见。伊朗国王到达巴拿马后，他的住所正是不久前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的谈判地。

毛拉们要求将伊朗国王遣返伊朗，以此来交换被扣留在美领事馆的美国人质。华盛顿那些反对将运河还给巴拿马的人谴责托里霍斯与伊朗国王互相勾结，以至于美国人质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要求将伊朗国王交给阿亚图拉·霍梅尼。

博士的预言成真。美因公司以及我们的竞争对手因此在伊朗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卡特也丢掉了连任的机会；里根、布什联手带着解决公司这一系列问题的承诺走进白宫。^①

于我而言，教训是惨痛的。在伊朗发生的这一切明显地揭露了美国一直煞费苦心想掩盖的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美国怎么可能对伊朗国王的认识如此肤浅，对伊朗上下反对他的汹涌暗流和仇恨洪潮视而不见呢？甚至像我们这些在伊朗工作的经济杀手，都未能得知真相。我很肯定，甚至早在1972年（就是我与托里霍斯见面的那一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都看到巴拿马民众明显是支持托里霍斯，可是他们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①1980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里根与布什两人成为共和党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合力与民主党的卡特争夺选票，最后里根、布什取得胜利。——译者注

第 20 章

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的楔石

对

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拿马的研究结果有喜有忧，这些国家都在我们的游戏规则之外。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巴拿马则有一条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他们都不符合那一套标准。相比之下，哥伦比亚的形势更符合我们的游戏规则。哥伦比亚是美国实施全球计划的典型。美因公司负责着该国一个庞大的水电站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工程。

哥伦比亚的一位大学教授写过一本有关泛美关系的书，有一次他告诉我，美国前总统特迪·罗斯福已经充分意识到哥伦比亚的重要性。据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次指着地图说，哥伦比亚是连接“南美洲拱门的楔石”。我没有去查证其真实性，可是从地图上看，这肯定是真的，哥伦比亚就位于南美洲的顶部，它将北美和南美连接起来。哥伦比亚将所有位于其南部的国家以及中美洲、北美洲国家连接到巴拿马地峡。

不管罗斯福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比喻，这也说明了他认识到哥伦比亚位置的重要性。两百多年来，美国都将哥伦比亚看作是一块楔石，更准确地说，是南半球政治和经济的入口。

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色得天独厚：拥有大西洋和太平洋岸边棕榈成行的美丽海滩，巍峨宏伟的山峦，可与北美中西部大平原媲美的南美大草原，还有一望无际、物种繁多的热带雨林。这里的人们也非常特别，结合了来自不同种族在体形上、文化上和艺术上的特性，有当地的塔里奥那

(Taironas)人，也有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

在历史上，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殖民时期，哥伦比亚是西班牙在秘鲁以北、哥斯达黎加以南所有殖民地的总督府所在地。那时候，金色大帆船从哥伦比亚沿海城市喀他赫纳(Cartagena)出发，把从智利、阿根廷等国攫取的财富运回到西班牙。此外，历史上很多关键性战役的战场都在哥伦比亚爆发，比如1819年对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关键一仗“博亚卡战役”(Battle of Boyacá)，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ívar)将军指挥的军队就在这里战胜了西班牙保皇党人。

在现代，哥伦比亚有拉丁美洲最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其他文人志士，同时其政府廉洁、民主，因而在外界有着极好的口碑。哥伦比亚是肯尼迪总统在拉美国家推行国家建设计划的典范。与危地马拉不同，这个政府并未因为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产物而感到羞愧；与尼加拉瓜不同，这个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并非由右翼独裁者或者共产党人操纵；与别的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在南美洲实力强大的巴西和阿根廷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并不敌视美国。尽管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非常猖獗，美国也同样将其视作战略同盟。

不过，哥伦比亚的光辉历史却被暴力和仇恨抹上了污点。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哥伦比亚是总督府所在地，殖民者用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的血肉之躯建立起宏伟的堡垒、庄园和城市。为了方便运输，殖民者将金银珠宝熔掉放在大帆船运载回国。曾经让哥伦比亚人自豪的文明，在西班牙征服者的利剑和肆虐的疾病之下逐渐荒废。1945年，哥伦比亚举行了一次备受争议的选举，其结果加深了各个政党之间的矛盾，导致了10年暴力统治时期(1948-1957年)，期间超过2万人因冲突而死亡。

纵然哥伦比亚冲突不断、局势动荡，但是在历史上，华盛顿和华尔街都将哥伦比亚看作是促进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要因素，其中的核心因素是哥伦比亚关键性的地理位置。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需要学习哥伦比亚的成功经验。此外，哥伦比亚能够为美国提供大量的产品——咖啡、香蕉、纺织品、翡翠、鲜花、石油和可卡因，同时又是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在 20 世纪末期，美国向哥伦比亚兜售的最重要服务是工程和建筑专业技术。哥伦比亚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国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相对而言，这个国家将很容易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同时哥伦比亚也能用工程利润和国家的自然资源来偿还欠下的债务。这样，对电力输电线路、高速公路和通信工程项目的巨额投资将促使哥伦比亚开放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市场以及不发达的亚马逊流域领土，而所有这些工程，最终产生的利润将用于偿还贷款和支付利息，这就是我们的运作原理。但实际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真正目的是使哥伦比亚臣服于美国，进一步深化全球帝国的进程。我的工作，一如在别的国家那样，就是说服他们接受美国的巨额贷款。哥伦比亚并没有像托里霍斯那样的人，所以我将经济和电力负荷预测的数字放大了数倍。

以往我偶尔会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有种负罪感，不过这一次例外，因为哥伦比亚成了我个人的“避难所”。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时候，安和我曾经在此共处数月，还在加勒比海沿岸山区分期付款买了一个小小的咖啡种植场，我们预付了首期。当感情危机刚出现的时候，我想我们一起回忆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可以减轻对彼此造成的伤害。可是这些伤口太深了，直到我们离婚了，我才开始真正地认识这个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因公司在这里获得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包括水电站设施网络和配电系统。我在滨海城市巴兰基利亚（Barranquilla）有一个办公室，也就在那里，我于 1977 年遇到一位美丽的哥伦比亚女子，她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保拉（Paula）披着长长的金发，有着一双迷人的碧绿眼睛——许多外国人都想不到哥伦比亚女子会长得这样。原来，她的母亲和父亲早年从意大利北部移民至此。她继承了家人的传统，当了一名时尚设计师，并且自己开了一个小工厂，把自己的创意变成了成品，在全国各地以及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高档商店出售。她是一个热情的人，帮助我度过了因婚姻失意而陷入的个人感情创伤漩涡，同时也让我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女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直消极地影响着我。同时，她也警告我，我从事的工作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我之前曾经提及，我的生命是由一系列我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联结起来

的。对我来说，这些偶然包括了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个男校教师的家庭、与安和弗兰克叔叔相遇、越南战争以及遇到艾纳·格列夫。可是，一旦我们遇到这些“偶然”，我们就面临着选择。我们的回应，将会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和结果。比如，在学校的出色表现、与安结婚、加入美国和平队以及选择当一个经济杀手，所有这些偶然情况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今天的生活状况。

保拉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偶然，她对我影响深刻，让我作出了改变生命前进方向的决定并付诸行动。在遇到她之前，我已经很大程度上认同了我所处的这种体系。虽然我常扪心自问，我究竟在做什么？虽然我也因此而不安，可我总会为自己找到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恰好这时候保拉出现了，否则我很可能会去冒这个险，我在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拿马的经历将催促我采取行动。尽管克罗汀这个女子成功地将我拖下水，让我加入经济杀手的行列，而另外一个女子——保拉，也扮演着另外一种“催化剂”的角色，她教我反观自己的灵魂，去看清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继续扮演经济杀手的角色将让我永远无法获得快乐。

第 21 章

美利坚合众国与全球帝国

有一天，我和保拉坐在一个咖啡馆，她对我说：“坦白地说，印第安人和所有居住在准备建造大坝的河流两岸的农民都会憎恨你，甚至是城里居住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受到影响，但他们却对那些不断攻击你们建筑营地的游击队表现出支持。你们的政府把他们称作共产主义者、恐怖分子和毒品走私犯，可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而且他们的家园被你们破坏了。”

我与她谈起有关曼纽尔·托瑞斯（Manuel Torres）的事情。他是美因公司聘请的一位工程师，就是最近被游击队袭击的人中的一个。

“据曼纽尔说，游击队拿着 AK-47 步枪向空中和他的脚射击。”我对保拉说，“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不过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当时已被吓傻了。游击队没有打伤任何人，他们只是给工程师们一封信，将他们送上船，并将船往下游开去。”

“天哪！”保拉惊呼，“那个可怜的人肯定被吓坏了。”

“当然了。”我告诉她，我问过曼纽尔，是不是觉得他们可能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或者 M-19 游击队——当地最有名的哥伦比亚游击队。

他说都不是。他告诉我说，他相信那些人在信中说的那些话。

保拉拿起我给她带的报纸，信的内容全部刊登在当天的报纸上。她将那封信的内容大声读了出来：

“我们每天都在为生存而努力工作！我们对着祖先的血脉宣誓——永远不能让大坝横跨在我们的河流上！我们是淳朴的印第安人和梅索蒂斯混血儿^①。我们宁可失去生命，也不会坐以待毙看着我们的土地被水淹没！我们警告你们这些哥伦比亚的弟兄们：不要再为美国建筑公司卖力！”她放下报纸，问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犹豫了片刻，仅仅片刻。我说：“别无选择。我现在还不能离开美因，我当时问曼纽尔是否觉得信是当地农民写的，但他只是耸耸肩膀。”

她坐在那里耐心地看着我，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我们对望了一下说，“噢，保拉，我实在很讨厌我现在所扮演的角色。”

“那接下来你是怎么做的？”保拉紧接着问我。

“我的拳头用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后我问他知不知道是谁发明了AK-47步枪。”

“那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他低声说是一个俄罗斯人。当然，我确信他是对的，AK-47的发明者是一名共产党员卡拉什尼科夫，是一个获得崇高荣誉的红军军官。我绕着弯子告诉他写下那封信的是共产党员。”

“你相信他是吗？”她问我。

她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我要怎么回答她，如实回答？我回想起在伊朗的时候，亚明将我说成是一个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一个“中间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我更希望自己是被游击队袭击的人中的一员。一种异样的感觉缠绕着我，一种对亚明、博士以及哥伦比亚游击队的妒忌也莫名其妙地油然而生。他们都是恪守原则的人，他们选择了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不定。

“我有我的工作。”最后我这样说。

她微微一笑了一下。

“我讨厌这样，”我继续说，“我总是想起汤姆·潘恩和许多独立战争时的大英雄、海盗以及边缘地区的居民。这些年来，他们的形象时常萦绕在

①梅索蒂斯混血儿：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我的脑海里。他们立场坚定并且勇于承担后果。“每过一天，我对自己的工作就憎恨多一点。”

她拉起我的手：“你的工作？”

我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明白她言下之意，“对！我的工作。”

她轻轻地握着我的手，慢慢点了点头。我感觉到一丝安慰。

“你要怎样做呢？约翰。”

我无言以对，突然觉得自己对这种安慰有了一种防御心理，于是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我那老套的辩驳理由：我想做个好人，我想设法寻找从内部改变这个体系的方法。而且（还是那个老借口）我就算退出，也许有一个比我更坏的人来接替我现在的位置。可我从她看我的眼神中知道，她并不认同我的理由。更糟糕的是，我自己也接受不了这个理由。

“那你呢？”我最终开口了，“你有什么想法？”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松开我的手说：“你是想转移话题吗？”我点点头。

“好吧，”她同意了，“但有个条件，就是哪天我们仍旧要讨论这个问题。”她凝视着手里的咖啡勺，“我知道有些游击队员在前苏联接受训练。”她用勺子在杯子里搅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舔着小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他们得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学会如何对付你们的士兵。为了有钱购买武器而不得不贩卖可卡因，而你们的世界银行并不会帮助他们。实际上，是世界银行这种机构将他们逼到了现在这种境地。我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我也知道，建大坝只对那些腰缠万贯的哥伦比亚特权家族有利，而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水源污染遭遇不幸。”

她的这些反对我们的话，让我全身毛发直竖。

“你怎么对游击队如此了解？”就连我提出问题的时候，也有种要被淹没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想知道答案。

“我和他们中某些人曾经是同学。”她说，接着她迟疑了一下，将杯子往一边推开，“我的哥哥也参加了运动。”

原来是这样，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放了气的球。我自认为对她的了解已经够深了，可是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一个男人回到

家里，却发现自己的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在床上。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我？”

“看起来这是毫不相干的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她停顿了一下，“我已经整整两年没有见过他了，他必须时时刻刻小心谨慎。”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最近政府把他列入通缉名单中。那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那证明他还活着。”

我努力克制着不去发表意见，因为我不希望她发觉我此时的妒忌。“他是怎样加入游击队的行列的？”我问。

还好她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咖啡杯，没有从我的脸上察觉到什么。“因为他在一家石油公司办公室门外抗议，我想应该是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他和几十位朋友一起抗议石油公司在土著人的土地上开采石油，于是他们遭到军队袭击并且关进监狱，尽管他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要知道，他们不过是站在大楼的外边举起标语和横幅而已。”她向身旁的窗户望出去，“他们把他关了半年。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在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出来的时候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这是我和保拉第一次这样的对话，后来我们之间还有不少类似的谈话，我现在才知道，这一次的讨论只不过是开头。我的心绪已经被扰乱了，可是我的钱包和 10 年前就被国家安全局发现的那些弱点却仍然左右着我的思想。保拉一直努力让我明白这一点，让我鼓起勇气面对埋藏在心灵深处对海盗和叛逆者的迷恋，在我通往灵魂救赎的路上，她向我伸出了援手。这个时候，我也开始犹豫起来。在哥伦比亚度过的日子，也让我明白了过去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今天的全球帝国之间的区别。美利坚合众国给予世界的是希望，其建立的基础是道德和哲学，而不是物质主义；美利坚合众国的原则是为所有人追求平等和公正，同时美利坚合众国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般的梦想：它将张开臂膀，去保护那些受压迫的人；它是一种鼓舞，同时也是一种促使人们去思考的力量；一旦有需要的话，它将立刻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行动起来，就像“二战”时期那样，维护其坚守的信念。而大型公司、银行和政府官僚机构等威胁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机构，让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全球帝国的进程，让这个国家偏离了原来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一切为了自身利益、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物质至上的体系。一如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它的羽翼为获取资源、为卷走眼前可见的一切而伸展，它总是试图去满足那永远填不满的胃口，它将用尽一切手段帮助其统治者获取权利和财富。

在认识到这个区别的时候，我也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克罗汀曾经给予我警告，她很坦诚地告诉我，如果我接受美因的工作将得到是什么。可是，如果没有在像印度尼西亚、巴拿马、伊朗和哥伦比亚等国家工作过的经历，我很难明白个中更深层的含义。如果没有像保拉那样一位女子对我表现出耐心和关爱，并和我分享她自己的故事，我想我也无法理解这些。

我忠于美利坚合众国，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在建立帝国主义的进程中，我们一直试图以经济手段取代武力手段达到目的：越南战争中我们使用了武力，结果让自己陷入了泥潭。美军在东南亚的经历让我们懂得武力是有局限性的，于是美国经济师们立即作出回应，共同制定了一个比单纯的武力入侵更好的行动计划。而我们这些援助机构和承包商对实施这些计划游刃有余。

在全球每一个大洲的国家里，我看到人们为美国公司劳碌奔波，尽管那些公司也不全是经济杀手网络的组成部分。像许多美因公司的工程师那样，这些人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后果懵然不知，他们确信为他们生产鞋子、制造汽车零部件的工厂是在帮助当地穷人摆脱贫困，而不是将他们推进如中世纪庄园和南部种植园的那种奴隶制度的深坑。像所有剥削制度的最初表现形式一样，现代的农奴或奴隶已适应了社会化的要求，他们自信与那些依靠救济金生活的可怜人、生活在黑暗的洞穴里的人、在非洲丛林中的土著或者是在美国边疆野外生活的人比起来，他们更幸福。

我一直在内心挣扎，自己究竟应该继续留在美因，还是应该在它变成公开的战场之前离开。毫无疑问，一方面，我的良心告诉我应该离去，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商学院学生和经济师，我却没有那么肯定。我自己的王国也

在不断扩张，我的雇员队伍不断壮大，我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我的网络中来，我获得了更多的股权，这些都让我更加自负。除了金钱和奢侈生活方式的诱惑以及不断膨胀的权力之外，我还经常想起克罗汀当初的告诫：一旦我踏了进来，就永远别想走出去。

当然，保拉对此嗤之以鼻，“她怎么知道呢？”

我告诉她在很多事情上，克罗汀都是对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生活发生了变化。你也有了改变当前这种状况的想法，克罗汀或者别人又怎么可能再影响到你呢？”

这是后来保拉不断重复的观点，最后我也认同了。我向她，同时也向自己承认，所有的金钱、欲望都不能成为制造混乱、贫穷的理由。作为美因的合伙人之一，我日益富有，但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就真的再也别想出去了。

有一天，我们漫步在喀他赫纳（Cartagena）西班牙堡垒旧址附近的沙滩上——这是一个被海盗袭击过无数次的地方，保拉带我走了一条我从未走过的路。

“如果你从不将你知道的那些说出来，会怎么样呢？”

“你的意思是……保持沉默？”

“对。不要给他们跟着你的理由。实际上，你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让他们放开你。”

她说得很对，为什么以前就没有人这样对我说呢。一直以来我都明白，我不可能做一个改革者。相反，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全心全意去享受生活，周游列国，或者与保拉这样美丽善良的女子建立一个家庭。我已经受够了，我只想离开。

“克罗汀教给你的一切都是欺骗，”保拉补充了一句，“你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她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你最近看过自己的个人简历吗？”我说还没有。

“去看看吧，”她建议我说，“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你西班牙版本的简历。如果有英文版本的话，我想你会觉得很有趣。”

第 22 章

骗人的个人简历

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听到了美因总裁杰克·道伯（Jack Dauber）决定退休的消息。美因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麦克·霍尔指定布鲁诺为道伯的接班人。哥伦比亚巴兰基利亚的电话顿时被打爆了，大家都觉得我很快就会得到晋升，毕竟我是布鲁诺的得意门生之一。

事情的变化和流言让我对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更加好奇。我还在哥伦比亚的时候，想起了保拉的建议，查看了自己的西班牙语版本简历，我被吓到了。回到波士顿，我找出了英文简历的原版和一份 1978 年 11 月的《美因干线》（MAINLINES）（公司的内部杂志），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提及到我，标题是“为美因客户提供新服务的专家”。

我曾一度对那份简历和文章非常感兴趣，可是现在与保拉一样，我感觉到愤怒和沮丧，这些档案中所写的都是假的。档案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深入到目前我们向全球帝国迈进的步伐中：他们做足了表面功夫，去掩盖事实的真相。他们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用我的故事作为象征，用一个金灿灿的面具来掩饰其虚伪、阴暗的一面。

当然这种名声并不能让我感到安慰，相反，我知道自己要为简历中所写的那些负责任。这篇文章的结尾描述了我参与美国和平队在厄瓜多尔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提及美国和平队本身的性质，给读者的印象是：当时，我是一个建筑材料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而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协助安第斯造砖农



CREDENTIALS

工作经历

约翰 M. 珀金斯是电力环境部经济分部经理。

自加入美国公司后，珀金斯先生经营了公司在美国境内、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的主要项目，其工作包括发展规划、能源需求预测、市场研究、经济预测、工程选址、能源调配分析、经济可行性研究、环境以及经济影响研究、投资规划以及管理咨询。另外，许多涉及到培训客户应用新技术的课程也是由珀金斯以及美国其他人员制定。

最近，珀金斯先生正负责以下项目：①预测能源需求以及量化经济发展与能源产量之间的关系；②评估项目的环境及社会经济影响；③在国家和区域经济规划中应用马尔可夫和计量经济学模型。

加入美国之前 3 年，珀金斯曾在厄瓜多尔进行市场研究，组建并管理建筑材料公司。他对在厄瓜多尔设立信贷和储蓄合作社也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教育经历

工商管理文学学士学位

波士顿大学硕士学位

研究课题

建模、工程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规律

语言能力

英语、西班牙语

所属专业学会

美国经济学会

国际开发学会（美国）

著作

《马尔可夫程序在预测电力需求中的应用》

《能源预测中的马尔可夫算法》

《描述经济与环境之间直接与间接作用的模型》

《互联系统中的电能》

《马尔可夫算法在规划中的应用》

资格

预测研究

市场研究

选址研究

经济影响研究

投资规划

原料供给研究

经济开发规划

培训课程

配置规划

管理咨询

客户资源

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

亚洲开发银行

博伊西加斯凯德公司

城市服务公司

代顿电力与照明公司

通用电器公司

科威特政府

巴拿马国家水电资源公司

美洲开发银行

伊朗能源部

纽约时报

纽约州电力署

印度尼西亚国营电力公司

南卡罗莱纳州电力燃气公司

纸浆及造纸业技术协会

联合坎普公司

美国财政部、沙特阿拉伯王国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为美因客户提供新服务的专家

看着桌子背后的那些面孔,很容易就看出经济学和区域规划已成为最近美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的学科之一。迄今为止,这个小组约有20位专家,共同进行一个为期7年的项目。这些专家不但包括了经济师,也包括了城市开发规划师、人口统计学家、市场分析师以及美国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尽管经济学小组是很多人参与发起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约翰·珀金斯先生,他已经成为该组的领头人。

1971年,他作为电力负荷预测师的助手被聘用。约翰是当时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经济师之一。他第一次是随同一个11人小组外派到印度尼西亚作电力需求研究项目。

“他们想知道我是否能在这里活上3个月。”回忆往事,他笑道。可是以他的背景,约翰毫不费劲地“活下来”了。他曾在厄瓜多尔的一个建筑材料合作社工作了3年,期间他帮助了当地的盖丘亚(Quechua)人,印加人

的后裔。约翰说,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在工作遭受严重剥削,为了保护他们,厄瓜多尔当地的机构请求他帮忙办了一个合作社。后来约翰租了一辆火车帮助他们将烧制的砖块直接送给顾客。结果,他们的利润猛涨60%。两年半之后,所得的利润在合作社的家庭中进行平分,其中有200户盖丘亚人受益。

这段时间里,约翰·珀金斯结识艾纳·格列夫(一名美国公司前雇员,他离开美国后,成为图森燃气与电力公司的总裁),格列夫当时正好在厄瓜多尔的波蒂(Paute)镇为美国公司的一个水电项目工作。两人通过书信来往很快成为朋友,随后,约翰在美国公司谋得一职。

大约一年之后,约翰成为电力负荷预测师的领队,而且,由于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客户的增加,他意识到,美国应该引入更多的经济师。“尽管美国是一个咨询公司,但是,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必须走出自身的局限。”1973年,他聘请了更多的经济师,



Perkins

同时也制定了一套规章,后来他成为首席经济师。此后,约翰参与的规划包括巴拿马的农业开发项目。而与此同时,美国公司的第一个社会学家玛莎·海斯在巴拿马进行了公司的首次社会学调查。玛莎在巴拿马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调查,其分析项目将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文化带来较大的影响。为了进行这个研究,美国也聘请了一些农业专家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专家。

经济与区域规划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然而约翰却认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很有幸运有这么一班专业的专业人士相助——约翰对他属下的关心和感激溢于言表。

《美因干线》 1978年11月

民建立一个合作社的志愿者而已。

简历后边列出了一大串公司客户的名称，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世界银行的通称）、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科威特政府、伊朗能源部、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巴拿马国营水电公司、印度尼西亚国营电力公司以及许多其他公司的名称。最能引起我注意的莫过于最后几个：美国财政部、沙特阿拉伯王国。我很惊讶，这样的一个条目居然会出现在我的简历上。

我把这份简历放在一边，开始看美因公司的《美因干线》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作者采访我的情景，那是一位非常聪明和善良的年轻女记者。在文章发表之前，她还先让我看过文章以得到我的应允，我当时十分满意她对我这种形象的刻画。

我当即认可了这篇文章。而现在看来，我为我当时的认可感到羞愧。文章开头如下：

看着桌子背后的那些面孔，很容易就看出经济学和区域规划已成为最近美因公司迅速发展起来的学科之一……

尽管经济学小组是很多人参与发起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约翰·珀金斯先生，他已经成为该组的领头人。

1971 年，他作为电力负荷预测师的助手被聘用。约翰是当时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经济师之一。他第一次是随同一个 11 人小组外派到印度尼西亚作电力需求研究项目。

文章简要地叙述了我之前的工作经历，点明我“在厄瓜多尔的 3 年里做了些什么”，接着的文字如下：

这段时间里，约翰·珀金斯结识了艾纳·格列夫（一名美国公司前雇员，他离开美因后成为图森燃气与电力公司的总裁），格列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夫当时正好在厄瓜多尔的波蒂（Paute）镇为美因公司的一个水电项目工作。两人通过书信来往很快成为朋友。随后，约翰在美因公司谋得一职。

大约一年之后，约翰成为电力负荷预测师的领队，而且由于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客户的增加，他意识到美因应该引入更多的经济师。

这两份材料都是一种间接谎言，两份材料都有复印件记录存在我的档案之中，可是我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已经被扭曲了。在一个崇尚正规档案的文化里，他们要的是一种更阴险的花招。因为，直白的谎言一下就会被驳倒，而这样的两份材料却无法反驳，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真实的，它们是由一个被其他公司所信任的企业、国际银行和政府写出来的，而不是公然的欺骗。

简历唯一真实的地方是——它是一份官方档案，而与之并列的文章，是一本公司内部杂志刊登的采访而且还署上了记者的名字。简历的右下角还印有美因公司的标志。只要有必要，美因不少计划书和报告的封面都会出现我的这份简历，因为这能为计划书和报告增色不少。我的简历在国际商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我身份权威、真实的证明，与学历证书和装裱起来的资格证书上的图章一样。

档案把我描述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师，一个有名气的咨询公司的部门主管，足迹遍及全球，研究课题广泛，旨在让世界变得更加文明和繁荣。这种欺骗在字里行间无法读出，而是在其所省略的内容里才能体现出来。若我设身处地将自己看作一个局外人，即以客观的角度来看，我必须承认省略的内容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

例如，档案从未提及我被国家安全局招聘，也没有提到艾纳·格列夫与军队的联系，更没有说明艾纳是一名国家安全局联络员。对我在高压之下不得不作出极度夸张的经济预测的事实也只字不提，另外对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给印度尼西亚和巴拿马那样无偿还能力的国家设下巨额债务圈套的这个事实也刻意隐瞒。对我的前任霍华德·帕克没有一句赞许之词，也没有提

到我是因为“合作态度好”，愿意提供上司爱看的电力负荷预测而成为负荷预测师的带头人，我不像霍华德那样因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被解雇了。最让人不解的就是在所有的客户名单下面最后一行：美国财政部、沙特阿拉伯王国。

我不断地看那一行字，我在揣测人们会怎样理解其中的含义。他们可能会问，究竟美国财政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印刷错误，将两行字错误地排成了一行。绝大多数的读者都猜不出事情的真相，这样的编排有着特殊的原因。只有在我那个圈子里的人才会明白：我是“世纪大计”的参与制定者，这桩买卖将改变世界历史，但却永远不会公之于众，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报纸上。在我的穿针引线之下缔结的盟约，保证了石油源源不断流进美国，同时也捍卫了沙特阿拉伯王室在国内的统治。

《美因干线》杂志的文章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我的评价。可就是这段评价，触动了我敏感的那根神经：

经济与区域规划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然而约翰却认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很幸运有这么一班努力的专业人士相助——约翰对他属下的关心和感激溢于言表。

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师。我从波士顿大学的商业管理学院毕业的时候是理科学士，专业是市场营销，我的数学和统计学都学得很糟糕。在米德尔布里学校，我主修美国文学，写作对我来说是毫不费力的。我能当上首席经济师和经济与区域规划经理，并不能归因于我在经济学或者是规划上的能力。我的成功，不过是因为我愿意作出老板喜欢看的研究和结论，加上我天生有一种能通过文字来说服别人的本领。

我把这两份文件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档案放在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在走出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又或者在同事的办公桌之间走动的时候，看着他们为我孜孜不倦地劳碌，我为自己对他们隐瞒真相感到惭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愧，对自己在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深感内疚。我想起了那些每天都要饿着肚子的人，而我和下属却每天出入高档的酒店和餐厅，同时为自己账户上不断增加的钱而沾沾自喜。

我意识到，我一手带出来的人现在都已加入了经济杀手的行列。我招聘了他们，培训了他们，亲手将他们拉了进来。当今的形势已与当年我进入这个圈子时大有不同。世界沧海桑田，公司王国也已桃红柳绿，而我们也变得更加邪恶。为我卖力的这些人与我又有不同。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被国家安全局测谎的经历，也没有接受过克罗汀这样的人的培训，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全球帝国履行使命。对经济杀手，或者是其简称“EHM”，他们都闻所未闻，更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深陷其网络之中。他们只知道以我为榜样，弄清我奖惩制度中的具体条款，作出让我满意的研究，得出我想要的结果。他们的工资、圣诞节奖金、甚至他们的工作都是建立在取悦我的基础上。

当然，我也竭尽所能去减轻他们的负担。我写了不少论文，作了不少演讲，利用每一个机会向他们灌输作出乐观预测的重要性，让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性，乃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重要性。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通过努力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对他国的诱惑、威胁已经成功地披上了一种更加隐讳的外衣，采用了一种更加温和却能给其他国家人们洗脑的形式。在我的办公室门外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已经整装待发，到全世界推广全球帝国的丰功伟绩。从某种很现实的角度来说，是我造就了他们，就像克罗汀造就了现在的我。可与我不同的是，他们仍然被蒙在鼓里。

我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一想到这些，我就心乱如麻。由保拉提出的简历一事，让我越来越不安，我时常对职员们的“无知”羡慕不已。我故意欺骗了他们，可这样一来也让他们免受良心的谴责。“无知”反而让他们无需与自己的道德良心反复斗争，无须像我那样愧疚。

我总是在考虑商业中的诚信问题，想到了外表与本质的联系。我也安慰自己说，从人类有历史记载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就从未停息。人物传奇和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多少被歪曲的事实与欺骗：弄虚作假的地毯商

人、放高利贷的债权人、哄骗皇帝的两个假裁缝……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事情历来都是如此，历史充满欺骗。我在美因的简历及背后事实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当然，我内心还是明白，这也是一种欺骗，虽然一切都改变了。我也明白我们的骗术已经达到一个新境界，一种通往自我毁灭的新境界。这不仅是道德上的沦丧，也是躯体上的灭亡，就像一个消失的文明那样，除非我们立刻作出翻天覆地的改变。

或者我可以用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过程来作比喻。黑手党的头子一开始都是地痞流氓，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组织得到壮大。其中一些人开始爬上了社会顶层，他们不仅变得富有，而且更重要的是和政界有了联系，于是他们的组织开始彻底的改头换面。这些人穿上了合身笔挺的西装，从事合法的职业，他们用正直社团的外衣掩盖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们支持当地的慈善机构，备受人们尊重。他们还很乐意向那些陷入绝望的人伸出援手。就如在美因公司简历中描述的约翰·珀金斯一样，他们从表面上看都是良好市民，然而在这个光环之下隐藏的是一缕一缕的血痕。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杀手们就会提出他们的合法却不合理的要求；一旦要求不能达到，豺狼们就手持大棒包围他们；最后，他们才出动他们的撒手锏——枪炮。

我明白，所有套在我头上的光环，什么首席经济师、经济与区域规划总监，与地毯商人的骗术没有什么两样，买家不会轻易察觉出来的。不过，与地毯商人不同的是，我的这些头衔是一个邪恶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体系的目的并非是欺骗单个的顾客，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我的每一位员工，都有一个头衔，像财务分析师、社会学家、计量经济师、影子定价专家^①等等。然而这些头衔，都无法体现出他们经济杀手的真实身份，他们是不同形式的经济杀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全球帝国的利益服务。这些头衔背后的真相并不意味着只有我们才是经济杀手。每一个跨国企业，从体育用品制造商到那些重型设备生产商，都有他们自己的经济杀手。强盗们丢弃了他们的皮夹克，换上笔挺的西装，摆出一副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架势。

①影子定价(Shadow Pricing)：对非市场流通货品的任意定价。——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这些人，纷纷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伦敦和东京等大城市的企业里走出来，涌向全球每一个大洲，劝说腐败的政客接受他们贷款，让公司王国为他们的国家套上永远打不开的枷锁，让绝望的人不得不向工厂和生产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我心烦意乱，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简历和那篇文章背后的欺骗本质：我们已被一个道德败坏、终将走向自我毁灭的体系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第 23 章

厄瓜多尔总统与石油巨头之争

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工作让我有许多机会接触与游览我的“第二故乡”——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一直以来都在独裁者和由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操纵的右翼寡头统治之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典型的香蕉共和国^①，是公司王国开战的主战场。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的对厄瓜多尔境内石油大量开采，掀起一小撮统治着厄瓜多尔的家族与国际性银行的买卖热潮。这些家族承诺用石油收入来偿还，于是公路、工业园、水电大坝、输电站与配电站，以及其他电力工程在厄瓜多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际工程与建筑公司在这里又一次大发横财。

但是在这个安第斯山脉国家，却有一个人公然站出来反对厄瓜多尔权势家族的腐败，反对他们与帝国主义政府勾结，这个人就是海梅·罗尔多斯。海梅·罗尔多斯三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名大学教授和律师，我曾经与他见过好几次面，他拥有不凡的领袖气质，深得民心。有一次，我有点急躁地主动提出：只要他需要，我可以乘飞机到基多给他做免费经济咨询。我用的是半开玩笑的语气，但也是因为我很乐意在我度假的时候可以给他咨询，因为我对他颇有好感，而且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去厄瓜多尔玩的借口。他笑着也向我提出了类似的约定，说只要我需要与他谈石油开支问题，可以随时找他。他是人民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的代表，深信穷人拥有应

^①香蕉共和国 (Banana Republic)：中、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得的权利，也深信政治家有责任谨慎地支配自己国家的自然资源。从1978年角逐总统开始，他得到了厄瓜多尔国民的关注，得到了来所有石油资源被外国公司掠夺的国家人民的关注，也得到了那些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摆脱强大的外力控制、取得独立的人民的关注。罗尔多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现代政治家，他从不畏惧与强权的抗争，紧紧盯着美国石油公司和背后支持着他们的那个体系。

最好的实例是，他对美国萨默语言学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IL）发起诉讼，萨默语言学院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新教会传教士团，与石油企业其实是一家的。我在美国和平队的那段日子里，对萨默语言学院颇为熟悉，这个传教士团已经走进了厄瓜多尔并打着研究、记录以及翻译土著语言的旗号深入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石油勘探开发的早期，萨默语言学院在亚马逊盆地与当地的奥拉尼族（Huarani）^①有全面的合作，一种令人烦扰的“协助模式”在那时候出现了。只要地质学家向石油公司领导层汇报某个区域的地表之下很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萨默语言学院的人就会立刻来到此处。他们游说当地的土著民族迁离此地，搬到传教士团的驻扎地去，土著居民在那里可以得到免费的食物、住所、衣服、医疗服务以及接受教育，条件是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土地转让给美国公司。

曾经有传言说，传教士用一种秘密手段让奥拉尼部族居民舍弃了自己的房屋，搬到使团的驻扎地去。最普遍的说法是传教士骗奥拉尼部族人吃下含有大量泻药的食物，然后给他们提供治疗腹泻的药物。在奥拉尼族人居住的土地上，萨默语言学院的人空投下装满食物的箱子，里面安装有微型雷达发报机；而驻扎在贝壳城军事基地的通信站点的美国军队操纵着精密的雷达接收器，接收发报机发回的信息。一旦部落的某个成员被毒蛇咬了或者病重了，萨默语言学院的代表就会立刻带着抗蛇毒血清或者其他急救药物和设备

①奥拉尼族：也被称为 Waorani、Waudani 或者 Auca（南美洲方言的“野蛮人”之义），奥拉尼人是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的一个原始部落。该部落的土地、林木资源目前受到国际非法伐木活动的威胁。——译者注

从天而降，而他们乘坐的通常是石油公司的直升机。

在石油探测的早期，5 名萨默语言学院宣传者的尸体被发现，他们的身体被奥拉尼族人的长矛刺穿。后来，奥拉尼族人放出口风，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警告这些人，让他们赶紧滚蛋。可是美国人对他们的警告却充耳不闻。实际上，奥拉尼人的警告最后还起了反作用。雷切尔·桑特（Rachel Saint）是其中一个被害者的姐姐，她后来在美国各州巡行、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露面，为支持萨默语言学院和石油公司筹款，她认为萨默语言学院和石油公司是帮助“野人”变得文明，帮助他们接受教育。

萨默语言学院从洛克菲勒慈善组织得到大笔善款。海梅·罗尔多斯认为，洛克菲勒与萨默语言学院的关系证明：洛克菲勒集团实际上是一个盗窃土著部落土地和一个提倡石油勘探的前沿阵线组织；洛克菲勒家族的年轻一代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创办的标准石油公司后来跻身主要石油公司——包括雪佛龙、埃克森和美孚石油的行列。

罗尔多斯和托里霍斯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两人都站出来与全球最强势的国家对抗。托里霍斯誓要夺回运河，而罗尔多斯捍卫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吓倒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像托里霍斯一样，罗尔多斯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可他选择了坚定地保卫国家自决权利的立场。然而他的命运也像托里霍斯一样，权威的政治学家认为，大公司和华盛顿绝不容许罗尔多斯继续保住他的总统之职，因此一旦他当选，就可能面临着危地马拉总统阿尔本兹或者智利总统阿连德那样的厄运。

对我来说，这两位总统是拉丁美洲一场新政治运动的先锋，这场运动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着全球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不是卡斯特罗也不是卡扎菲（Gadhafi）^①，他们没有与前苏联结盟，他们与阿连德不同，也没有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结盟。他们是深得民心、睿智超群、魄力

①卡扎菲：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Omar Mouammar Gaddafi）1969 年 9 月 1 日，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并晋升为上校。1970-1972 年任总理兼国防部长，1977-1979 年任总人民委员会总书记处总书记。1977 年起成为革命领导人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82-1983 年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逼人的领袖，他们务实而不独断。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但并不敌视美国。如果公司王国建立在三根柱子之上——大型企业、国际银行和与之勾结的政府——那么最有可能让这三根柱子倒塌的人就是罗尔多斯和托里霍斯。

罗尔多斯的政治纲领主要由“碳氢化合物政策”（Hydrocarbons Policy）^①的能源政策组成。这个政策指出，尽管厄瓜多尔蕴藏着巨大的石油资源，但是石油开采必须以能够为厄瓜多尔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为前提。罗尔多斯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国家有义务全力帮助国内的贫困人民以及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他希望其能源政策能实实在在为社会带来改变，他必须坚定这种信念。因为他深知：厄瓜多尔就像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没有那些具有影响力家族的支持，他不可能成功当选；同时他也明白，就算没有他们的支持，他或许也能胜出，但是他的政策要真正实施，也必须得到来自国内显赫权势家族的支持。

不过幸运的是，这段时期美国政府由卡特执掌。尽管有来自德士古和其他石油公司的压力，这段时期华盛顿对厄瓜多尔事务并没有特别加以干涉。如果是其他总统当政，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我相信这个“碳氢化合物政策”比其他任何一切更能说服厄瓜多尔支持罗尔多斯，并把他迎入基多的总统府里。他是厄瓜多尔经受多年的独裁政府统治后，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他在1979年8月10日的就职演说中归纳了这项政策：

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保卫国家的能源资源。国家必须保持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但同时又不能失去经济独立……我们的决策必须体现国家的利益，同时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

上任伊始，罗尔多斯就将重点放在德士古公司上。当时，德士古是厄瓜多尔领土上“石油争夺战”的主角。厄瓜多尔政府与德士古之间的关系摇摇

①碳氢化合物政策（Hydrocarbons Policy）：这里的碳氢化合物指石油。石油由碳氢化合物为主混合而成。——译者注

第 23 章 厄瓜多尔总统与石油巨头之争
Chapter 23 Ecuador's President Battles Big Oil

欲坠。石油巨头德士古不信任新上任的总统，也不愿意成为新政策殃及的“池鱼”，他们也不愿意开任何先例。德士古对此项政策非常警惕，认为这样的政策日后将成为拉美其他国家的模范。罗尔多斯的一位主要顾问何塞·卡瓦哈尔（José Carvajal）在演讲中总结了新政府的态度：

如果一方（德士古公司）不希望承受风险，不愿意投资石油勘探，或者在有石油特许经营权的区域开采石油，另一方有权利进行投资并且以所有者的身份接管……

我们认为我国与外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公平的，我们必须在斗争中保持强硬，必须准备好承受各种压力，而且没必要在与外国人谈判的时候表现得很紧张或者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1980 年的元旦，我下定了决心，那天是新一年的开始。再过 28 天，我就 35 岁了。我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作出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改变，我将以海梅·罗尔多斯以及奥马尔·托里霍斯为榜样，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另外，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马克·霍尔解雇了布鲁诺。

第 24 章

辞职

马克·霍尔解雇布鲁诺的消息在美因公司无疑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公司内部议论纷纷。尽管布鲁诺在公司也有一些“敌人”，可就连这些“敌人”也大吃一惊。不少员工认为霍尔解雇布鲁诺是出于妒忌。无论是午餐时，还是在咖啡车旁边，大家都议论纷纷。他们认为霍尔感觉到比他年轻15岁的布鲁诺对他造成了威胁，而且布鲁诺在当总裁期间将美因利润增长率提高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

“霍尔不会让布鲁诺继续这样威风下去，”其中一个人说，“霍尔觉得布鲁诺接替他的位置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到时候这个老家伙就该出局了。”

霍尔还似乎真要证明这些流言都是真的，他任命保罗·普里蒂（Paul Priddy）为新的总裁。保罗在美因公司工作多年，他是一个和蔼亲切、一丝不苟的工程师。在我看来，他却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一个只会随声附和的人，一个永远不可能以傲人的业绩威胁到霍尔地位的人。不少人也有同样的看法。

对我来说，布鲁诺的离开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他是我的导师，也是公司国际项目的关键人物。而普里蒂只是专注于国内业务，他对公司的海外项目知之甚少。美因自此之后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成了未知数。我给布鲁诺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的语气泰然自若。“嗨，约翰，我知道霍尔解雇我没什么合理的理由，”他说，“所以我要求他给我一笔数目不菲的遣散费，他答

应了。霍尔控制了多数有表决权的股票，一旦他作出决定，我就别无选择了。”布鲁诺在电话里还暗示，曾经是美因客户的几个国际银行有意聘请他担任要职，他也在考虑之中。我问他我该怎样做。

“睁大你的眼睛，”他说，“马克·霍尔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可是没有人会告诉他这个事实，尤其是现在，他居然这样对待我。”

1980年3月底，布鲁诺被解雇的事实仍然影响着我，因此我决定到维京群岛（Virgin Islands）去放松放松。与我同行的是一个叫做“玛丽”的美因公司同事。当初我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料到此行对我最后作出决定、达成我的新年愿望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天下午，我们环绕圣约翰岛（St. John Island）展开了航行，不久便驶入分隔美洲和英属维京群岛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海峡（Sir Francis Drake Channel）。

这个海峡是以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那一位英国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命名。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十年里我常常想到的历史人物，像德雷克和亨利·摩根爵士等，他们如江洋大盗般抢掠和剥削，可他们的事迹仍为世人称颂，甚至因为其所作所为而被授予爵位。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从小开始，我们的老师就教育我们去尊重这些人。我早就应该质疑他们的行为，他们对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一种剥削。数不清的英雄人物，像伊桑·艾伦、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戴维·克罗科特（Davy Crockett）、路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他们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残酷掠夺，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奴隶，并且强占了本不属于他们当作自己的土地，而我却把他们当作英雄。此时船只驶过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海峡，我发现自己过去是多么的荒唐，居然认为此等罪行是合情合理的。

我还想起了这些年来几乎完全忘记了的事情。伊桑·艾伦曾经在肮脏醒醒的英国监狱船上度过几个月，绝大部分时间他身上都套着30磅重的铁枷锁，后来他在英国地牢呆了更长的时间。他是一名战犯，1775年的蒙特利尔战役（Battle of Montreal）中，他像现在的海梅·罗尔多斯以及奥马尔·托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里霍斯那样，为其人民争取自由而被俘。托马斯·杰弗逊、乔治·华盛顿以及其他的开国元勋为了同样的理想奋不顾身。在革命未完全胜利之前，他们明白，一旦失败，他们将被作为背叛者推上绞刑架。丹尼尔·布恩、戴维·克罗科特、路易斯和克拉克同样经历过苦难，作出过牺牲。

那么德雷克和摩根呢？我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比较模糊，可我依稀记得，当时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受到了来自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极大威胁。我不得不承认，德雷克和摩根是为了深入西班牙帝国的心脏腹地、攻击“无敌战舰”、捍卫英国的尊严而成了海盗，而不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的野心。

我们在海峡中继续航行，船逆风行驶，向着远处海面上的山——北边的大蒂奇礁石和南边的圣约翰岛——慢慢靠近。那些历史事件，仍然未从我脑海里消失。玛丽递给我一瓶啤酒，并将吉米·巴菲特（Jimmy Buffett）^①的歌曲音量调高。可是，四周如画般的风景以及海上航行带来的自由感却未能驱走我的愤怒。我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试图抛开这种愤怒的感觉。

然而，那种感觉仍旧驱之不散。我为这些历史事件而愤慨，可更加愤怒自己竟然企图利用这些史实为自己洗脱贪婪的罪名。我对我的父母、对提尔顿那所自以为是的预备学校仍有满腔怒气，是他们将那些历史知识灌输到我的脑袋里。我打开了另外一瓶啤酒，我甚至想杀了马克·霍尔，他怎么可以那样对待布鲁诺？

忽然，一艘挂着彩条旗的木船迎面驶来，它的船帆朝两边鼓起来，顺着风飞快地经过我们身边。船上的十几个年轻男女向我们欢呼招手，他们中有的穿着色彩鲜艳的嬉皮士服装，前甲板上的两人则几乎完全赤裸。从那一条船的风格和他们自由、放荡不羁的外表来看，他们应该是群居海外的“现代海盗”。

我想向他们挥手，可是我的手却不听使唤。一阵妒忌几乎将我淹没。

玛丽站在甲板上，看着他们消失在我们后面。“你觉得那样的生活怎样？”她问我。然后我明白了，这与我的父母、提尔顿或者马克·霍尔毫不

^①吉米·巴菲特（Jimmy Buffett）：美国乡村摇滚歌手，1946年12月25日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的乡村音乐历程。——译者注

相干。我憎恨我自己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我选择的，该为此负责、该被唾弃的人是我自己。

这时，玛丽大声地喊了起来，她往船的右舷方向指去。“伦斯特海湾，”她说，“这是我们今晚的停泊点。”

就是它了，静静地依偎在圣约翰岛旁边的一个小海湾，英国海盗船曾经潜伏此处等待“无敌舰队”驶入水域。我的船向海湾驶近，我将舵柄交给玛丽后，径直走到船的前甲板上。她操纵着船绕过“西瓜礁”（Watermelon Cay），开始进入美丽的海湾。我把船头的三角帆降下并收起来，将船锚从小舱里面拉出来，而玛丽却利索地将主桅帆收起来。我把锚轻轻地推到一边，链条卡嗒卡嗒地垂落进水晶般清澈的海水里，船顺着海浪漂流最后停了下来。

我们安顿下来，玛丽游了会泳就去小憩。我给她留了个纸条，然后将小划艇划到岸边，停靠在一个古老的种植园废墟旁边。我在海边坐了很长时间，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任何事情，集中注意力以清空我所有的情绪，可这根本不管用。

傍晚，我费了好大的劲爬上陡峭的小山，发现自己脚下是一片废墟，那曾经是一堵墙，一堵老种植园的墙。我看着太阳沿着加勒比海的边缘落下，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可我知道，我身处的这个种植园曾经历过灾难：成百上千的非洲奴隶葬身此地，他们在枪口的威胁下，建起了宏伟的高楼，种植、收割甘蔗，将甘蔗变为朗姆酒的原材料。现在，这里的宁静将当初的野蛮全然掩盖。

太阳消失在一个山峦起伏的小岛后面，一道绛红色的光弧横贯天空，海面开始慢慢变得黯淡。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怵目惊心的事实：我已成了一个奴隶主，在美因的工作不仅让贫穷的国家掉进无底的债务深渊，还被纳入全球帝国的魔掌之中；我那些言过其实的预测不仅仅让美国在需要石油的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攫取本不属于我们的资源；我的工作还剥夺了很多家庭的幸福，那些倒在现在我脚下这片废墟中的人们，那些被美因及其竞争对手剥削过的人们，是我让他们失去了幸福生活。

10年了，我充当着奴隶主的角色已经10年了，尽管我没有深入非洲丛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林，将那里的部落的男男女女赶上商船。我用的是更现代、更隐蔽的方法，我从来不需要面对奴隶的尸体、不需要嗅到刺鼻的腐臭、也无须听到绝望的号叫，可我犯下了与奴隶主同样的罪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或许比奴隶主更狠毒。

我再次向停泊在岸边的单桅帆船望去，它正随着海浪摇曳。玛丽懒洋洋地躺在甲板上，好像在喝着玛格丽塔酒，也许还等着给我也递上一杯。那一瞬间，我借着白天的最后一丝阳光，看着她躺在那里是那么的轻松、那么毫无戒心，我突然想到我对她以及所有为我工作的职员所做的一切，想到我正在将他们慢慢转化为经济杀手的事实。我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与当初克罗汀的行为无异，不同的是我欠缺克罗汀的坦白。我用加薪和升职来引诱他们，让他们也变成奴隶主。他们也像我一样被这个体系的桎梏套住，因此，他们也是另外一种奴隶。

我厌倦了眼前的海水、海湾和紫红色的天空。我闭上眼睛不去看那堵墙——那些由被迫背井离乡的非洲奴隶的血肉砌成的墙，我要赶走这一切。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直愣愣地盯着一根弯曲粗糙棒子，有棒球棍子那么粗但比它长一倍。我跳了起来，抓起那根棍子用力地往石头墙上一阵猛砸，我狠狠地敲击着，直到我筋疲力尽瘫了下来。随后我躺在草地上，看着云朵从天上徐徐飘过。

最后我开始往回走，回到游艇停泊的地方。站在沙滩上，看着游艇在蔚蓝的海面上漂浮，我知道我该怎样做，也知道如果再继续以前的生活，回到美因或是所有公司帝国的分支机构中，我将永远迷失自我。加薪、退休金、保险还有补贴、股票……在其中停留的时间越长，我就越难以脱身出来，我将变成这个体系的奴隶。我不可以让自己的良心像我敲击那堵墙那样被敲打，我必须脱身出来。

两天之后，我回到波士顿。1980年4月1日，我走进保罗·普里蒂的办公室，递上辞呈。



第四部分

1981—今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 25 章

厄瓜多尔总统之死

要

离开美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保罗·普里蒂并不相信我的决定，他眨着眼睛笑着说：“你这是愚人节的把戏啊？”

我再三跟他解释我是认真的。回想起保拉曾告诫过我不要得罪任何人，也不要做任何事情使别人知道我经济杀手的身份。因此，我对保罗说，我很感激美因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一直想写写那些通过美因而认识的朋友，他们使我认识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工作以外许多美好的事物。我告诉保罗，我的梦想是成为《国家地理杂志》还有其他一些杂志的自由撰稿人，我还想继续周游列国。我向他表明我对美因的一片赤诚之心，并保证会利用每一个机会为其歌功颂德。最后，保罗让步了。

从那以后，我身边的朋友都不断尝试说服我打消辞职的念头，他们提醒我留在美因的种种好处，甚至有人说我是疯了。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我辞职这个事实，因为这样会迫使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情况：假如我离开美因不是一个疯狂的决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继续留在美因是不明智的？他们显然更愿意将我看作是一个疯子。

我的下属的反应让我倍感困扰。在他们看来，我抛弃了他们，而且当时看来也没有一个特别有魄力的人能接我的班。然而，我去意已决。经过这些年的摇摆不定，我决定来一个彻底的了断。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但不幸的是，事情的发展并未如我所愿。诚然，我已经没有工作了，但由于我还不是—位法定合伙人，我在美因的股份就算全部兑现也未必能安心退休，享受生活。如果我继续留在美因几年，我才可能如我设想的那样在40岁时成为—个百万富翁。可是，35岁的我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一年，四月的波士顿阴冷而又沉闷。

后来有一天，保罗·普里蒂致电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我们有个客户威胁要跟我们中止合作。”他说，“他们当初邀请美因作顾问公司，就是希望你能做他们公司的专家证人。”

为此我考虑了很多。当我再次坐在保罗面前的时候，我作出—个决定。我给他开了个价，薪金是我当初在美因时的3倍。出乎我的意料，他接受了我的条件，于是我开始新的职业生涯。

在之后的几年，我成为—名高薪的专家。聘请我的主要是美国几家电力设备公用事业公司，他们希望新的能源电厂能通过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兴建审批程序。其中—位客户是新罕布什尔州公共服务公司。我的工作则是评估备受争议的西布鲁克核能发电厂(Seabrook Nuclear Power Plant)的可行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在接受工作时曾宣誓保证自己所言属实，并无任何欺瞒。

虽然我已不再直接插手拉丁美洲的相关事务，但我仍十分关注当地的事态发展。作为—名专家，我可以随时到那里去，继续与保拉联系，也与当初在厄瓜多尔和平队认识的那些老友们重新联系上。厄瓜多尔突然之间就—跃成为世界政治舞台关注的焦点。

总统海梅·罗尔多斯继续他前进的步伐：他恪守其竞选纲要中对厄瓜多尔民众的承诺，对石油公司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他似乎对巴拿马运河两边的人通常遗漏或者刻意忽略的问题明了于心；他很清楚地知道当前局势背后的含义：整个世界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帝国的威胁，而他祖国的人民正沦为二等公民，并被套上奴役的枷锁。当从报纸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时，我被他向民众作出的承诺所深深折服，更佩服他能看到许多深层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向世界政局的新纪元迈进。

1980 年 11 月，卡特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败给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他与托里霍斯磋商的《巴拿马条约》，伊朗的局势，特别是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以及人质拯救的最终失败，都是导致他落选的重要因素。

但此时一些更加微妙的变化发生了。卡特最大的政治目标是实现世界和平，同时致力于减轻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性，而接替他的里根总统则坚信，军事力量才是让美国登上全球政治金字塔之巅的最有效武器，控制全球各地所有的油田是美国不可推卸的“天定命运”。那个曾在白宫屋顶安装太阳能聚集板的卡特总统下台了，入主白宫的里根总统第一时间就下令拆除这些太阳能面板。^①

卡特或许是一名效率不高的政治家，但至少他为这个国家所规划的蓝图与我们在《独立宣言》里描述的美好愿景是相吻合的。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因循守旧，才让我们的先辈们的理想重新展现。当我们将卡特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相比较，他无疑是个另类。他的世界观与经济杀手完全背道而驰。

里根则截然相反，他是一位目标明确的全球帝国缔造者，公司王国的忠实奴仆：在他参选期间，我就已经发现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好莱坞演员，他对企业大亨们言听计从，擅长使用见风使舵的伎俩；他迎合那些出入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银行会议厅、政府大堂的显贵们；他为那些表面看起来在为他服务，实际上却大权在握的人——包括副总统乔治·H. W. 布什、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理查德·赫敏斯（Richard Helms）以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等人服务。他大肆鼓吹这些人的勃勃野心：由美国控制世界及所有资源，建立一个由美国来发号施令的世界，由美国的军队来实施美国撰写的法律，建立一个支持美国担任全球帝国“首席执行官”的国际贸易及银行体系。

①吉米·卡特支持节约能源。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就把太阳能聚集板放置在白宫屋顶上以推进能源保护。里根当选总统后不久，就把这些太阳能面板拆除了。
——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展望未来，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对经济杀手发展的极有利时期。而我选择在这个历史时刻离开确实是命运的一次转机。对问题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庆幸自己的退出，我知道自己作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至于从长远来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不敢说了，我没有能预知未来的水晶球。然而，我知道任何一个帝国都不能长盛不衰——钟摆永远是向两边摆动的。在我看来，像罗尔多斯这样的领导者总是能给人以希望。我肯定，厄瓜多尔的新总统定能洞悉当前局势的微妙之处，我知道他一直是托里霍斯的崇拜者，同时对卡特在巴拿马运河事件中英勇无畏的立场赞赏有加。我可以肯定罗尔多斯不会动摇，只希望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坚韧不屈的精神，能为其他国家的首脑们点燃一盏希望之灯，他们需要罗尔多斯和托里霍斯的这种鼓舞。

1981年初，罗尔多斯正式向厄瓜多尔国会提交了新的能源法案，其中的法规若能得到贯彻，将从此改写厄瓜多尔与美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从多个角度而言，新法都是一种改革，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和激进的举措。其目标指向很明确，就是要改变现有的商业操作模式。它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厄瓜多尔的国界，延伸至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乃至全世界。

石油公司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从所有的油站撤出，他们的公关人员四处游走，诽谤海梅·罗尔多斯，他们的说客横扫基多和华盛顿，大行威胁及贿赂之道。他们企图将厄瓜多尔现代史上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描绘成另一个卡斯特罗。然而罗尔多斯不会向威逼和胁迫低头，他公然声讨政治家与石油公司，甚至与教会之间的阴谋，他公开斥责萨默语言学院与石油公司勾结，最后甚至使出大胆的、也许是不顾后果的一招：命令将萨默语言学院逐出国境。

向国会提交新法案仅数周后，也就是驱逐萨默语言学院传教士的几天后，罗尔多斯便告诫包括石油公司在内的所有海外利益机构，除非他们实施的计划有利于厄瓜多尔的民众，否则将同样被驱逐出境。他先在基多的阿塔瓦尔帕奥林匹克体育馆（Atahualpa Olympic Stadium）发表了大型演讲，然后便动身前往厄瓜多尔南部的一个小社区。

1981 年 5 月 24 日，他在飞机事故中丧生。

霎时间举世震惊，拉丁美洲人人义愤填膺，整个南半球的报章都公然刊登“中央情报局暗杀！”的头条。众所周知，华盛顿政府及石油公司对罗尔多斯恨之入骨，另外还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一指控，而随着更多事实逐步被揭发出来，猜疑的声音也愈来愈高。虽然事情尚未得到证实，但是有目击者声称，罗尔多斯事先知道有人要谋杀他，并且作了预防措施，包括使用不同的两架飞机飞行。据说，在登机之前，罗尔多斯的一名安全官员劝说他登上了那架用来诱敌的飞机，但最后却是这架飞机爆炸了。

尽管世人反应强烈，美国舆论界却没有就此事作任何的追踪报道。

奥斯瓦尔多·乌尔塔多（Osvaldo Hurtado）继任成为厄瓜多尔新总统。他恢复了萨默语言学院及其石油公司赞助商在厄瓜多尔的活动。当年年底，他实行了一项野心勃勃的商业计划，增加德士古公司以及其他海外公司在瓜亚基尔湾（Gulf of Guayaquil）和亚马逊盆地的钻探业务。

奥马尔·托里霍斯在颂扬罗尔多斯时将他称为“兄弟”。他也提及自己曾经做过被暗杀的噩梦，在梦中他看见自己随着巨大火球从天空中坠落，没想到竟一语成谶。

第 26 章

巴拿马：又一名总统之死

得知罗尔多斯的死讯，我十分震惊，不过或许我不该惊讶。我不应该如此天真。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世上还有阿尔本兹、摩萨德、阿连德以及其他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存在，他们的名字或许不曾出现在报章杂志或历史教科书上，但是他们都是因为对抗公司王国而被夺去性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措手不及。这种手段未免太过于明目张胆。

我之前曾以为，自从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大获全胜后，这种公然挑衅的行为已经成为历史，那些“豺狼”已经重返动物园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毫无疑问罗尔多斯的死绝非偶然，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中央情报局自编自演的一出暗杀丑剧。他们之所以如此明目张胆，目的不过是要放出点口风（新的里根政府还有他那好莱坞牛仔的形象就是传达这个信息的最好工具），“豺狼”们又回来了！他们就是要奥马尔·托里霍斯，还有所有想加入反对公司王国行列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然而托里霍斯并没有屈服。像罗尔多斯一样，他拒绝在恐吓面前退缩。他也将萨默语言学院驱逐出境，并态度鲜明地拒绝了里根政府要求就运河条约重新举行谈判的要求。

在罗尔多斯遇害后两个月，奥马尔·托里霍斯的梦魇成真，他死于一场飞机事故，时间是1981年7月31日。

这个消息在拉丁美洲以及全球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托里霍斯在世界各地

都享有盛名，因为他曾经迫使美国政府将巴拿马运河物归原主，并坚持与里根总统分庭抗礼从不退缩。他是人权的坚决拥护者，在他领导下的国家敞开胸怀为政治迫害下的流亡者提供避难所，受到他们庇护的包括了伊朗国王，他甚至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莫名其妙地丧生了。“中央情报局暗杀！”的大字标题又重新成为新闻和评论的头条。

格雷厄姆·格林在《走近将军》一书（就是我与他在巴拿马酒店相遇的时候他开始酝酿的一本书）的开头这样写道：

1981年8月，当我接到电话得知我的朋友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将军的死讯，我立即收拾行李，开始我的第五次巴拿马之旅。在托里霍斯将军乘坐小型飞机前往他在科克勒西多（Coclesito）府邸的时候，飞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全部罹难。数天后，他的安全警卫丘曲（Chuchu）军士，别名约瑟·德·杰索斯·马丁内斯（José de Jesús Martínez），曾先后任巴拿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以及教学教授的学者兼诗人向我透露，“那架飞机上藏有炸弹，但在电话里我不方便向你解释事情的缘由。”

世界各地的人纷纷哀悼这位世界伟人，他们齐声讨伐华盛顿，要求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径展开调查。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什么作用，痛恨托里霍斯的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了许多权倾一时的人物。在托里霍斯生前，他们就毫不掩饰对他的憎恨，譬如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国防部长温伯格、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以及许多有权势的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尤其是《托里霍斯-卡特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的规定更是激怒了这些军事首脑，因为条款要求美方关闭设在巴拿马的美国学校以及美国南方司令部的热带战事中心。

军事首领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如果没法规避新条约，就要另行找一个愿意帮他们接收这些军事设施的国家，而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后期几乎是个空想了。当然，他们还有另一个选择：铲除托里霍斯，然后与他

的继任者重新谈判，修订条约内容。

托里霍斯的商界敌人主要是大型跨国企业。他们当中大部分都与美国政界人物关系密切，这些公司几乎都涉嫌剥削拉丁美洲劳动力资源及石油、木材、锡、铜、矾土、农业用地等自然资源，其中包括制造公司、电讯企业、船运业巨头以及其他工程及技术类的企业等。

贝泰集团就是私人企业与美国政府勾结的典型。我对贝泰十分熟悉，在美军期间我们曾有过密切合作，我与他们的首席建筑师私交颇深。贝泰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工程公司，其总裁及高层管理人员乔治·舒尔茨、卡斯帕·温伯格都对托里霍斯恨之入骨，因为托里霍斯竟“厚颜无耻”地采纳了一份日本项目书，计划将巴拿马目前的运河改建成一个利用率更高的新运河。该计划不仅使美国对运河的所有权转交回巴拿马，同时也将贝泰公司排斥在这项本世纪最激动人心、也可能是最赚钱的工程之外。

托里霍斯以优雅的姿态、迷人的风度以及诙谐的言谈与他的敌人分庭抗礼。现在他已与世长辞了，取而代之的是撑着保护伞的曼纽尔·诺列加，他缺乏托里霍斯所具备的敏捷才思、超凡魅力以及非凡才智，没有人期待他能对抗里根、布什以及贝泰公司之流。

这个噩耗让我悲痛欲绝，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我与托里霍斯之间交往的情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静静坐着，凝视着他在杂志上的一张照片，回想起我初到巴拿马的那个夜晚，在雨中，我乘坐的出租车停在巨幅广告牌前，上面写着“奥马尔的理想是自由，能扼杀自由理想的导弹无人能造！”回想起这些题词，我不寒而栗，感觉回到了那个暴风骤雨的夜晚。

当时我不可能想象得到，托里霍斯与卡特能共同努力使巴拿马运河物归原主，他的这一胜利以及他为缓解拉丁美洲社会党人与独裁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作的努力，会激怒里根-布什政府，引来杀身之祸；我当时也不可能想象到，在另一个深夜，他像往常一样乘坐他的双水獭飞机（Twin Otter）时会被杀害；也无法想象到，美国以外的所有人都坚信不移，年仅52岁的托里霍斯是中央情报局那串长长的暗杀名单下的另一个亡魂。

托里霍斯倘若在世，绝对不会对那些蔓延在中美洲、南美洲国家日渐升

级的暴力冲突坐视不理。根据他以往的行事方式，他必定会设法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以减轻国际石油公司对亚马逊地区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家的破坏。托里霍斯的措施必定能使目前频繁发生的冲突有所缓和，华盛顿将这些冲突事件称为恐怖活动以及毒品战争，但托里霍斯则认为这是绝望的人们奋起保卫家园所做的反抗。更重要的是，他有可能为美洲、非洲、亚洲等地新一代领导人树立榜样，而这恰是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经济杀手所不能容忍的。

第 27 章

我的独立电力系统公司、安然 和乔治·W. 布什

托

里霍斯遇难之前的几个月里，我都没有与保拉见面。我与其他女人约会，包括威妮弗雷德·格兰特（Winifred Grant），她是我在美因时认识的一位年轻的环境策划人员，而她的父亲恰好是贝泰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保拉那时候正与一名哥伦比亚记者交往。我们仍然是朋友，但已结束恋人关系。

我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挣扎，特别是评估西布鲁克核能电厂的工作使我身心疲惫，感觉好像在出卖自己。我似乎又回到那曾经为了赚钱而忙碌的日子。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威妮弗雷德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她虽然是一名环境专家，但是她对保持电力系统持续供电有很独到的见解。她在旧金山伯克利的东湾区长大，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是一名理性主义者，她对生活的理解与我父母灌输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态度明显不同，与安的看法也相异。

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威妮弗雷德向美因请了假，陪我开始了海上旅行。我们乘坐小船由大西洋西岸向佛罗里达州漂流，一路上两人随心所欲，走走停停。由于我的工作需要，我们经常把船停泊在不知名的港口，我上岸搭乘飞机飞往各地进行工作。我们最后在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停泊并上了岸，在那里租了一套房子，我们结了婚。1982年5月17日，我们的女儿杰西卡出生。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相比其他那些和我一样经常出入心理助产法学习班的父亲们来讲，我的年纪确实偏大了点。

在西布鲁克公司，我的主要职责是让新罕布什尔州公共服务委员会信服，对该州来说，核电才是最适用、最经济的发电方式。然而不幸的是，我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怀疑自己论据的正确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证据表明有很多新形态的能源比核能更具有技术优势，而且也更经济。

我开始怀疑“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能源”这种观点。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继而浮出水面，如何保证后备系统的良好运行，如何有效地对设备操作人员进行培训，采用何种机制来减少员工的犯错行为，如何解决设施老化对其运作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处理核废料……我开始对自己的立场感到不安：我在这家公司领取高薪俸禄，就必须对自己在这里的一言一行负责。与此同时，我相信现代新兴科学技术甚至可能提供一种更环保的发电方式，而且这种技术还能变废为宝，将有些废弃物转化成有用的物品。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新罕布什尔州公用事业服务公司的顾主们说明，我无法再继续为他们服务。这样，我放弃了这份报酬优厚的工作，着手创立自己的能源公司，将一些新研发的科学技术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使理论成为现实。尽管这种做法风险颇高，加上那时我刚成家不久，所幸初为人母的威妮弗雷德对我的决定给予百分之百的支持。

1982 年，在杰西卡出生的几个月后，我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独立电力系统公司”（Independent Power Systems, IPS），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开发环保型发电系统，并且希望借此带动和吸引更多人参与开发环保型发电技术。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许多竞争者多数以失败告终，然而，这时候“偶然”又出手相救了。事实上，每次有贵人相助的时候，我都相信这是对我过去工作以及我信守缄默承诺的回报。

布鲁诺·扎姆波蒂当时在美洲开发银行担任高层管理人员，他同意加入独立电力系统公司董事会，资助这家羽翼未丰的公司。另外我们还得到不少公司以及机构的帮助，包括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ESI 能源公司（ESI Energy）、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乍得-伯恩-帕克事务所（Chad-Bourne and Parke）（华尔街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前美国参议院议员、前总统候选人以及前国务卿的埃德蒙·马斯基曾

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及莱利锅炉公司(Riley Stoker Corporation, 一家由阿什兰石油公司控股的工程公司, 专业设计、生产高精度、新型的发电站专用锅炉等), 甚至连美国国会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免除了独立电力系统公司的某些特殊税收, 并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待遇。

1986年, IPS和贝泰公司分别开始建设发电厂。两家发电厂都采用最尖端的高新技术燃烧废弃煤来发电, 发电的同时并不会产生酸雨。到了80年代末期, 这两家发电厂证明了所谓的废弃物也是可以转化为电力的, 这就彻底革新了电力公用事业的面貌, 同时也证明了燃烧煤可以不生成酸雨, 为国家反污染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家发电厂的成功, 也驳倒了老牌电力事业公司的错误观点。独立电力系统公司的发电厂也向外界证明了, 通过华尔街及其他常规的途径, 此类未经证实的最尖端的技术也能运用于小型独资企业。独立电力系统公司的发电厂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措施: 将发电过程中排放出来的热气输送给3.5英亩液体培植温室, 而不是按常规送去冷却池或冷却塔。

担任独立电力系统的总裁让我在能源行业地位显赫。我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业界人士打交道: 律师、说客、银行家以及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我还有另外一个有利条件, 我的岳父在贝泰公司干了30多年, 现在已经被提升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目前在沙特阿拉伯负责修建一座城市, 这个项目是我在70年代早期在沙特阿拉伯工作时努力的成果, 也是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的直接产物。威妮弗雷德在旧金山长大, 她的家就在贝泰公司全球总部附近, 她也曾是这个企业大家庭的一员——她从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贝泰公司。

那时候, 美国的能源产业正经历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大型工程公司想方设法从公共事业公司手中抢夺能源的区域垄断权, 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打破常规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旧有的规则可能一夜之间发生改变。这种局势使法庭和国会一筹莫展, 而野心勃勃的人则希望借此机会大发横财。业界学者戏称此为“能源的西部大开发”时代。

美因公司在这次能源产业的结构调整中严重受挫。如布鲁诺所预测, 马

克·霍尔已经与现实脱节，但其他人却不敢向他直言，而保罗·普里蒂则从不掌权。在这种形势下，美因不仅没能在这场席卷业界的变革中获利，反而犯下了很多致命的错误。在布鲁诺离开美因后仅几年时间里，美因在经济杀手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并且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后来，公司的合伙人把美因卖给了一家在变革中把握时机的大型工程建筑公司。

1980 年，我持有的美因股票价格接近每股 30 美元，大约 4 年后，股价跌了一半多，美因公司近百年的光辉历程最终以耻辱收场。美因的溃败使我黯然，但却证明了我及时抽身的决定是明智的。美因的名号在新东家手下沿用了一段时间就被弃用，这家曾经在全球无数个国家名堂响当当的企业的最最终销声匿迹。

美因是在这场能源产业变革中没有把握时机的典型。与之相反的是一家我们能源行业的人都很关注的公司——安然（Enron）。安然是业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公司之一，安然似乎是突然从某个角落冒出，但瞬间达成了数亿巨额交易。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安然公司的会议中，与会人员看上去总像在闲聊，他们悠闲地靠在座椅里，喝着咖啡，偶尔翻阅一下文件。那时在安然，扎堆闲聊的人随处可见，但外人永远无法理解安然为何能瞬间崛起，创造业界奇迹。而安然人对我们外人提出的疑问总是笑脸迎人，缄默不言。有的时候被逼得紧了，他们会讨论一些新式的管理办法，例如“开创性融资”，聘请的高层执行人员要懂得与世界各国政要打交道的诀窍等。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经济杀手们的新伎俩。全球帝国正加快脚步向前迈进。

对于我们这些关注石油以及世界局势的人来说，另一个经常成为讨论话题主角的是副总统的儿子乔治·W. 布什。他的第一家能源公司阿尔布斯托（Arbusto，“布什”对应的西班牙文）原本濒临倒闭，在 1984 年与光谱 7 公司（Spectrum 7）合并后，这家公司起死回生。而光谱 7 公司在 1986 年面临破产的时候被哈肯能源（Harken Energy）收购，同样是丝毫不损。乔治·W. 布什则在哈肯保留董事会成员及顾问的身份，年薪 12 万美元。

我们都猜想，哈肯之所以决定聘请乔治·W. 布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因是布什是总统的儿子。因为尽管小布什曾经担任石油公司管理人员，可是他的成绩还不够资格坐上那个位置。而无独有偶，当时哈肯公司首次决定在世界上几个大型油田设立分支机构，并在中东地区开展了积极的石油勘测投资。《名利场》杂志中写道，“自布什在董事会任职以来，哈肯就一帆风顺——新投资的项目、突如其来的融资、石油开采特许权等都从天而降”。

1989年，美国石油公司正在与巴林政府谈判海底石油开采权的问题。这时，副总统布什当选为新一任总统。随即国务院顾问迈克尔·阿曼（Michael Ameen）被委派前往巴林，下达新任美国驻巴林大使查尔斯·奥斯勒（Charles Hostler）的任命书。迈克尔·阿曼此行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安排巴林政府与哈肯能源公司会面。于是突然间，美国石油公司换成了哈肯，虽然在此之前哈肯从未在美国东南部以外的地区开采过石油，更从未尝试海底钻油，却赢得了在巴林的独家石油开采权，这是阿拉伯世界事先无人知晓的怪事。数周后，哈肯能源的股票价格上涨了20多个百分点，由原来的4.50美元涨至5.50美元。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能源专家都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希望布什不是想通过他父亲获得什么好处。”一位专门负责能源行业事务的律师朋友告诉我。他是一个忠实的共和党拥护者，而我们当时正在华尔街街角的世界贸易中心顶楼一家酒吧喝酒，他很沮丧，“我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他摇摇头继续说道，“为什么商业总得和政治扯上点关系？”

但对于我来说，一切似乎都是意料中事。我看待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独特的视角，我曾经为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伊朗的政府工作，很熟悉中东地区的政治，也清楚布什和安然的执行人员一样，都是经济杀手所创立的全球帝国网络中的一员。他们扮演着封建地主和种植园主的角色。

第 28 章

新一代经济杀手的诞生

在这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我曾视为学习楷模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当上国防部长兼任世界银行行长，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心。麦克纳马拉奉行进攻型领导作风，这种由凯恩斯经济理论衍生的经济手段已经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经济杀手理念在各个角落蔓延，企业的管理人员虽然不是由国家安全局聘用的，或许也没有像我那样在测谎仪监控下进行测试，但他们却与经济杀手无异。

唯一不同的是，担任公司高层执行人员的经济杀手们无须再借助国际银行系统提供资金。就是像我这种老一辈经济杀手的队伍仍然在壮大，而相比之下，新一代经济杀手却更邪恶，20 世纪 80 年代，不少信奉“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原则的年轻人晋升为企业中层管理人。全球帝国仅仅是获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方式而已。

这种新的趋势在能源产业，也就是我工作的领域尤其明显。1978 年，国会通过了《公共事业规范法案》（*The Public Utility Regulatory Policy Act, PURPA*）。该法案的合法性屡遭质疑，但仍然在 1982 年正式成为法律。国会最初的设想是借此法案鼓励独立的小型公司开发可替代能源，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发电方式，我的独立电力系统公司也属此类。新的法案要求几大主要的公共事业公司须以合理、公平的价格购买小公司生产的能源，国会推出该政策，延续了卡特政府减轻美国对国内以及进口石油的依赖性的原则。显而易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见，此项立法目的就是鼓励开发可替代能源，鼓励体现着“美国企业家精神”的私人企业的发展。然而，形势的发展却背离了他们的初衷。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美国加强了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期间我也亲眼目睹不少小型公司被大型工程与建筑公司以及公共事业公司吞并。一些大型企业找到了法律漏洞，通过成立控股公司的方式，在拥有受管制的公共事业公司的同时，也拥有受管制的独立能源公司。大部分公司的做法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迫使独立小公司破产，再实行并购。其他一些大型企业则更直接，由零开始自行设立独立公司。

于是，减轻对石油依赖的想法被暂时搁置。里根得感谢这些石油公司。布什是石油商人，他因此也赚了不少钱。卡特以及里根两任政府的多数政要、内阁成员，要么与石油工业、工程建筑公司有密切的联系，要么就是其中的成员。此外，石油工业和工程建筑公司并不偏向某一党派，所以不少民主党人也从中获利并对这些石油公司满怀感激。

在这种形势下，独立电力系统公司仍然继续致力于开发环保型的能源，立志要实现《公共事业规范法案》的目标。所幸冥冥中似乎有神灵的护佑，独立电力系统公司是少数能存活并继续发展壮大独立企业，我当然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当年心甘情愿为公司王国卖力。

能源产业发生的改变反映了当时全球形势变化的一个缩影。人们对整个社会利益、环境以及对生活质量的关注都给贪念让路，这一段时期，人们对私营企业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一开始，这种转变还能找到理论依据，譬如资本主义优于且必定阻遏共产主义的理论，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依据都是不必要的。人们普遍认为，由实力雄厚的私人投资者负责的项目必然比政府来得更好。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组织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建议对一些当时仍由政府控制的项目解除管制并且使之私有化，这包括供水及污水处理工程、通信网络、公共事业和其他公共设施。

结果，经济杀手的构想更大范围内推广并且变得相当容易，只需将那些原先仅由少数老资格的经济杀手专门负责的任务，分配给不同领域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即可。这些人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他们努力寻找最廉价的劳动

力、最易获取的资源以及最广阔的市场。他们的行事方式非常残酷，正如那些老一代的经济杀手（就像我当时在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的工作一样）他们找到了使罪行合理化的途径。像我们一样，他们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国家设下圈套，许下动听的承诺，承诺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财富，引导这些国家从国内的私有部门寻求摆脱债务的途径。他们兴建了学校、高速公路，给这些国家捐赠电话、电视，提供医疗服务等。然而到最后，当他们发现别的地区能够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更唾手可有的时候，便离弃了那些心中希望刚被点燃的民众。他们这样做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后果通常都无法设想，可是他们却从不迟疑。

我很想知道，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否有感觉到良心的不安，是否也曾像我那样极力挣扎？他们是否曾经站在肮脏的河边，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年轻妇女正欲以河水沐浴，而上游的一个老人却蹲在河边排泄？难道像霍华德·帕克这样敢于提出尖锐质问的人就再也找不到了？

虽然我自己的公司非常成功，家庭生活也非常幸福，但我却总在某些时刻感到极度的沮丧。我现在是一个小女孩的父亲，我非常担心她将来会怎样生活在一个残酷的世界里。我过去所做的一切，让我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回过头来看，历史的发展趋势实在让人担忧。“二战”后期，各国首脑齐聚在我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现代国际金融系统就此形成。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该机构旨在协助重建战后的欧洲。那时欧洲已经是一片废墟，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发展迅速，而我们深信这个体系可以让我们避免与共产主义国家直接冲突。

但我又不禁要怀疑这个体系将我们领向何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前苏联解体以及世界共产主义活动的瓦解，遏制共产主义已不再是这个体系的目标。同时，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全球帝国开始畅通无阻。正如世界形势论坛主席吉姆·加里森所说：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及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帝国的形成——没有任何国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家能够抵制全球化的进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避免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和‘契约’，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无论那些国际金融机构如何地不能胜任，他们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者和游戏规则制定者，并最终决定服从者可以获得赏赐、违抗者将得到惩罚。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体化的、全球性的自由市场。”

第 29 章

美国人侵巴拿马

虽然托里霍斯已与世长辞了，但巴拿马在我心目中仍占有很特别的位置。我住在佛罗里达州南部，但我仍可以通过不少途径得知中美洲的相关信息。虽然托里霍斯的继承者们没有具备他悲悯苍生的爱心以及坚忍的性格，但他的精神仍继续得以传承。在他去世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尝试解决南半球的分歧，巴拿马也决心强迫美国遵守《运河条约》的规定。

托里霍斯的继任者曼纽尔·诺列加在新上任的时候，一开始也表现出追随前辈足迹的决心。我从未与曼纽尔·诺列加有直接接触，但据大部分人说，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不遗余力地继续为拉丁美洲贫穷和受压迫的人民作出努力。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继续研究修建新运河的可行性，该项目由日本资助并负责施工。毫无疑问，诺列加的举措也遭到华盛顿及美国私人企业的强烈抗议。诺列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是跨国工程与建筑公司贝泰的执行官，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曾任贝泰的副总裁，贝泰当然最希望赚取运河建筑工程所能带来的数十亿美元……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深恐日本最终控制运河修建工程项目，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美国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商业利益。美国的建筑工程公司必定会失去这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然而诺列加并非托里霍斯。他并不具备托里霍斯那样的非凡魅力和魄力，不久便闹出了贪污及毒品交易的丑闻，甚至还被怀疑参与了暗杀其政敌休戈·斯帕达福拉（Hugo Spadafora）。

诺列加曾担任巴拿马国防军 G-2 ——军事情报司令部的陆军上校，他带领的 G-2 部队是该国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机构，此间他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凭借他的地位，他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威廉·凯西（William J. Casey）建立了密切关系，这支军事情报部队是中央情报局的国际盟友。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个关系，继续开展美军在加勒比海以及中、南美洲地区的活动，譬如，在 1983 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Grenada）前，里根政府希望预先给卡斯特罗一个警告，凯西则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诺列加。此外，诺列加上校还协助中央情报局渗透进哥伦比亚以及其他贩毒集团。

1984 年，诺列加被授予将军军衔，晋升为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报纸曾报道某年凯西到访巴拿马城时，在机场的时候他向前来接机的驻当地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问道：“我的孩子诺列加在哪儿呢？”而诺列加将军到访华盛顿时，两人曾在凯西的府邸私下见面。多年后，诺列加回想起来或许会承认他与凯西的密切关系，而这段关系也让他自己感觉良好。在他看来，中央情报局和 G-2 一样都是最具实权的国家机构，不管他在巴拿马运河条约以及美国驻巴拿马地区军事基地的立场如何，他相信凯西都会为他提供庇护。

因此，托里霍斯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正义、平等的象征，诺列加则成为了腐败、堕落的代名词。1986 年 6 月 12 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巴拿马强人涉嫌毒品及违法金钱交易”，他的恶名再次远播。曝光此事的是一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文中称诺列加将军是拉丁美洲非法公司的幕后合伙人，并指责他是美国和古巴的双重间谍，G-2 部队在他的命令下处死休戈·斯帕达福拉，诺列加本人还亲自统领巴拿马最大的贩毒集团。报道旁边配有一幅诺列加照片。次日的追踪报道披露了事件更为详尽的细节。

尽管诺列加的问题层出不穷，但他却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美国将设在巴拿马的美洲学校期限延长 15 年的要求。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了其中的一些内幕：

我们坚定不移地继承托里霍斯的遗志，并引以为荣。但美国却不愿看到这一切发生。他们希望能够延长“美洲学校”在巴拿马的期限，或者就此问题重新展开谈判。但是这所学校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尴尬的问题，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土成为敢死队以及激进右翼势力的军事训练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许都可以预料到事态将如何发展，1989 年 12 月 20 日，美国对巴拿马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空袭，这让所有人大惊失色。巴拿马并未挑衅美国，但巴拿马无辜的平民却成了受害者。显然，巴拿马及其人民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绝对没有构成威胁，而全球各地的政治学家、各国政府以及舆论界都称美国这次单方面的行动是对国际法规的一次公然挑衅。

巴拿马并未犯下任何所谓的滔天罪行：它只不过是敢于反对那些大权在握的政客和企业高官，它坚持双方要遵守已经签订的运河条约，它不过是与社会改革者进行探讨，也只不过是与日本金融机构、建筑公司研究兴建新运河的可行性。但是，它却遭到惨无人道的军事袭击。如诺列加所写的：

我要明确地告诉各位：美国在 1986 年发动的那场造成社会动荡的总统选举和 1989 年美国入侵巴拿马，全是因为美国拒绝接受即将丧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事实。美国不愿意看到独立、自主的巴拿马人民在日本的支持下掌握运河管理权，威胁自己在当地的利益……因此舒尔茨和温伯格戴上一个关注公共利益的人民公仆的面具，表面上对自己所代表的强权经济一无所知，暗地里却谋划了一场想要把我赶下台的政变。

华盛顿为发动此次战争找到仅有的一个理由，就是诺列加。他们派遣国内年轻的士兵，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和良心的谴责杀害巴拿马的无辜平民，包括不计其数的儿童，美军在巴拿马城中四处放火危害居民生命及财产安全。诺列加被美国刻画成邪恶的化身、人民的敌人、魔鬼般的大毒枭。就这

样，美国人以他为由，大举出兵入侵一个拥有 200 万居民的国家——这个坐落在巴拿马运河岸边，拥有全世界价值最高的土地资产之一的国家。

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消息使我陷入了一种消沉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诺列加有贴身警卫，但是我也很清楚那些走狗有办法除掉诺列加，就像之前对付罗尔多斯以及托里霍斯那样。我怀疑他大部分的警卫都是由美国军人所训练出来的，他们甚至可能已经被美国收买，所以事发时，这些警卫可能冷眼旁观、坐视不理，甚至可能亲自参与暗杀诺列加。

我不断跟进此事的报道，我对此次美国入侵巴拿马的军事行动思考得也越多，愈加相信战争将让美国倒退回旧式的帝国霸权时代，我也更确信布什政府比里根统治下的美国更为强硬，他们向世界宣告美国为获取利益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入侵巴拿马的目的除了要扶植一个听命于美国的傀儡政府，并借此消除托里霍斯政策的后遗症外，美国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向伊拉克等国家发出一个警告信号，使他们屈服于美国的威慑之下。

《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畅销书作者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对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时间作出独特的分析。他在 2001 年出版的《飞向月球》（*Shooting the Moon*）一书中写道：

世界上所有的领导者当中，曼纽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因为诺列加，美国建国后 225 年来，唯一一次在兴师动众入侵他国后，将该国首脑带回美国进行审判，并最终以其荒谬的理由——诺列加在巴拿马触犯了美国法律，将其关押在美国监狱中。

但是，美国的这次军事袭击也给它自己带来了麻烦。

布什政府要证明自己并不窝囊，但是在外界看来，美国人发动的这次军事袭击完全是不人道的。有消息透漏，在轰炸结束后的 3 天内，美国军方禁止新闻媒体、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外界观察员进入空袭重灾区，而美军士兵则利用这段时间忙着焚烧、埋葬死难者尸体。媒体曾问及一些敏感问题，譬如

这次军事袭击导致了多少人丧生，有多少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药救治而死亡等等，但这类问题从未有人作出回答。

于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次入侵背后的真实内幕，也无法得知这次屠杀的实际规模。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宣布的死亡人数为 500~600 人之间，但是根据独立人权组织估计，死亡人数应为 3 000~5 000 人，还有 2.5 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在此次行动中，诺列加被捕并被押解前往迈阿密受审，最后被判处 40 年的有期徒刑，由此他也成为了当时唯一一名美国官方宣布的战犯。

美国以全球最先进的军事武器对付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公然破坏国际法规的卑劣行径，又一次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本土公民却对华盛顿所犯下的罪行和外界高昂的声讨呼声浑然不觉，而媒体对此事也是遮遮掩掩。这是由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隐瞒自己的罪行，包括政府的策略，白宫与报社、媒体的勾结。而国会议员对此秘而不宣，新闻记者则认为公众对英雄的崇拜应比他们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更为重要。

唯一的例外是彼得·埃斯纳（Peter Eisner），《纽约日报》编辑兼美联社记者，他跟进报道了美国入侵巴拿马事件，此后几年一直保持对事态的关注和研究分析。在 1997 年出版的《曼纽尔·诺列加回忆录：美国囚犯》（*The Memoirs of Manuel Noriega: America's Prisoner*）一书中，他写道：

以诺列加的名义实行的屠杀、破坏以及非人道主义行为——还有围绕入侵巴拿马所找的种种托词——无一不是对美国民主基本准则的严重威胁……士兵被告知出兵的目的是为了从一个残暴、邪恶的独裁者手下拯救众生，他们接到命令对巴拿马进行轰炸，一旦他们开始行动，他们祖国（美国）的人民也紧随他们的步伐前进。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包括了对关押在迈阿密监狱的诺列加本人进行采访，埃斯特写道：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证据不能够证明那些指控诺列加的罪状能够成立。我认为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军事领袖兼政治领袖的所作所为，不能够证明美国对巴拿马的入侵行为是正当的，我也无法认同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论调。”

埃斯特的结论是：

“根据我对巴拿马政治局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出兵巴拿马前、入侵期间以及战后我在当地的采访报道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一次强权国家滥用权力的无耻行径。傲慢自大的美国政客与巴拿马盟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惜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

自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后，一直是阿里亚斯（Arias）家族和政治寡头统治这个国家，他们都是听命于美国的傀儡政府，直至托里霍斯从他们手中夺得统治权。而现在诺列加被捕，一切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新的《运河条约》名存实亡。不管官方文件上如何规定，华盛顿政府仍是这条运河的实际控制者。

当我细想这些事变，再回想起我在美国的经历，不禁一遍遍地问：当人们就某问题作决定——甚至是影响千百万民众生命安全的重要决策的时候，有多少人是从关心别人的角度出发的？而那些政府要员中，有多少人作出决策之时，完全是为了一己私欲而不是出于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尤其令人愤怒的是，竟然有一个国家的总统为了证明自己并不窝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实行军事打击。

第 30 章

我受贿了

美国入侵巴拿马的行为令我义愤填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还击！美国对这个毫无招架之力的国家进行无情打击，这使我的努力化为乌有，我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现在因此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当时我接受了托里霍斯的要求，我们一起对问题的探讨也是真诚的。

且看现在发生的一切吧。

沮丧和无力感将我重新推到这本书的开头。不同的是，这一次写作的重点落在托里霍斯的经历上。我希望通过写这本书，讲述托里霍斯将军的故事，能让大家看到不义行为怎样影响着这个世界，同时，我也借着写这本书来减轻我的负罪感。我将之前写的所有片段聚集起来，从上次《一个经济杀手的良知》（*Conscience of an Economic Hit Man*）停笔的地方继续开始写。实际上，这本书仍是我上次写的那一本。然而，我将在其中注入有关巴拿马最近局势的内容，让该书的揭示更加有力，更能反映当前的现实。

当着手写作时，我才惊讶地发现，经济杀手所完成任务数量之巨、涉及区域之广，着实令人震惊。我尝试将写作的重点侧重在其中一些国家，竟然发现这些我工作过的地方，在我离开之后情况更糟糕。我也对自己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感到十分震惊。以往在我做这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时，常常很自责；然而当我身处其中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在印度尼西亚时与霍华德·帕克的讨论让我倍感焦虑；雷西的印度尼西亚朋友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们提出的问题使我感到不安；在巴拿马，菲德尔向我介绍的贫民窟、运河区以及歌舞厅，给我的灵魂带来极大震撼；在伊朗，亚明和博士的谈话也使我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写这本书使我有机会回顾并总结过去，我发现当自己身处其中之时就有如井底之蛙，只能看到视线范围内的东西，而看不到行为背后的本质。

道理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不证自明。然而，这些经历背后的却是一个潜移默化过程。对于我来说，我想到的是一个士兵到“职业军人”的心路历程：一开始，士兵是很单纯的，他对杀害别人是否道德表示质疑，但是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战胜自己的恐惧，想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当他杀害第一个对手的时候，各种复杂的情绪将他包围起来，几近窒息。他或许会想到死者的家人，于是产生了深深的自责；但随着时间的慢慢逝去，他参与的战争越来越多，死在他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最终变得冷酷麻木，成了一个“职业军人”。

而我早就转变为一个职业军人了。在接受这个理论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罪行是如何发生的，而帝国霸权又是如何建成的。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暴行，为什么心地善良的伊朗人愿为残忍的秘密警察（SAVAK）卖命，本性善良的德国人会追随希特勒，而那些善良的美国士兵会对巴拿马城进行狂轰滥炸。

作为一个经济杀手，我从未从国家安全局或其他政府机构领过一分钱，给我报酬的都是美因公司，我不过是一个受雇于私人企业的市民。认识到这一点，我更清楚地明白那些身为经济杀手的决策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就像那些被派往世界各地的士兵，逐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麻木不仁。我写道：

如今，许多美国人纷纷涌向泰国、菲律宾、博茨瓦纳、玻利维亚那些失业率高的国家，这些美国人放弃他们在曼哈顿、旧金山、芝加哥奢华舒适的办公室，乘坐豪华航船，跨越大洲和海洋，入住一流的星级酒店，享受当地最豪华餐馆的佳肴。他们的目的是寻找那些为了生存拼命寻找工作机会的人，寻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惨

的人——那些人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甚至随时可能饿死；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矮棚里，已经丧失对美好生活和未来的希望。

如今，我们的社会仍然有奴隶贩子的存在，但是新式的奴隶贩子已经不再需要深入到非洲丛林里去寻找“猎物”——那些能在查尔斯顿、喀他赫纳以及哈瓦那的拍卖场卖得好价钱的奴隶。他们只需兴建一家工厂，然后聘用那些绝望的人做工人，在流水线上生产外套、牛仔裤、运动鞋、汽车零部件、电脑元件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可以在他们选定的目标市场出售的商品。他们甚至不需要亲自管理工厂，只需在当地聘请一名商人就可以替他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些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他们衣锦还乡，带回离奇有趣的风景照和历史悠久的古迹废墟的照片向孩子炫耀。他们积极参加交流会，在会上大家相互交流经验，分享在遥远的国度适应当地习惯的心得。公司的老板聘请律师做他们坚实的后盾，确保他们在当地的行为合乎法律要求。精神治疗师以及其他人力资源专家也为他们所用，专家们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在第三世界的行为是为了救助那些绝望的人们。

旧时代的奴隶贩子认为，他们所买卖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而新时代的奴隶贩子觉得，奴隶对于他们至关重要，是他们经济的来源。新时代的奴隶贩子则使自己深信，对于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而言，尽管每天只是赚到一点点钱，也比什么钱也赚不到要强，而且他们还得到进入更广阔社会群体的机会。现代奴隶贩子很清楚地知道，这些绝望的人正是自己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维持自己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从未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所处的经济体系对这个世界更深层面的含义，或者对他们子孙后代的影响。

我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决定写一本名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良知》的书，告诉大家所有我知道的故事。我当时并不打算关起门来完成这本书。直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至现在，我也不是那种习惯将自己“隔离”起来的人。我一直认为通过与别人的讨论，对我的写作会有很大帮助，同时可以从其他人身上获得灵感，并请他们帮我回想书中提及的内容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发表看法。我还喜欢把正在写作中的内容读给朋友听，听取他们的建议。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很冒险，但是除此以外，我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因此，撰写这本关于我在美国工作期间所作所为的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1987 年的一个下午，美国的另一个前任合伙人和我联系，给我看了一份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顾问合同，合同里的条款非常诱人。斯通-韦伯斯特是当时最著名的工程建筑公司之一，在能源产业形势风云突变的环境下，该公司成功地站稳了脚跟。斯通-韦伯斯特聘请我担任该公司属下的一家新分支机构的顾问，这是一家以我的独立电力系统公司为模型的独立能源公司。我知道我无须参与任何国际项目，也无须加入与经济杀手有牵连的项目时，这让我松了口气。

他告诉我，实际上我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我是建立并成功经营了一家独立能源公司的少数人之一，而且我在业界享有盛名。斯通-韦伯斯特聘请我主要是利用我的工作经历，在他们公司的顾问名单上写下我的名字，这种做法合乎法律规定，是业界的一种常用做法。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很有诱惑力，那时由于种种原因我正打算卖掉 IPS。加入斯通-韦伯斯特的行列，领取一份丰厚的收入，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一天去上班，斯通-韦伯斯特的首席执行官约我共进午餐。我们坐下闲聊了一会儿，在谈话过程中我突然有种冲动，想重新从事顾问的工作，我不想再去经营一个复杂的能源公司，我不想为我的一百多名员工负什么责任，我也不想再去处理那些烦人的债务问题。我甚至已经计划好要利用斯通-韦伯斯特提供给我的顾问费以及资源，组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

用餐后甜点的时候，首席执行官提起了一本我已经出版的名为《远离压力的习惯》（*The Stress-Free Habit*）的书。他说他曾听人说这本书写得非常出色。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问我：“你还打算写其他的书吗？”

突然间，我明白了所有的一切。我一刻也没有迟疑，“没有，”我回答

道，“目前我还没有再出书的计划。”

“我很高兴你这样说”，他说，“和美因一样，我们也很重视隐私。”

“我明白。”

他微笑着坐了回去，背靠椅子，似乎完全放松了。“当然，像你上一本书那样，写些关于远离压力的内容是很不错的，有时甚至能对事业有所帮助。作为一名斯通-韦伯斯特的顾问，你完全可以写那样的书。”他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答复。

“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

“但是，你不能在书中提及我们公司的名字，也不要提及我们公司的业务以及你在美因期间工作的性质。你也不能在书中提及政治问题，也不能提及国际银行和我们公司之间的关系。”他看着我，说：“因为这些都需要保密。”

“这是当然的。”我向他保证。在那一刻，我的心跳几乎停止。那种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像那时在印度尼西亚与霍华德·帕克共处、坐在菲德尔旁边开车穿梭于巴拿马城的感觉，也像那时和保拉一起坐在哥伦比亚咖啡馆的感觉。我再一次出卖了自己。这不是法律上所说的受贿，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只是把我的名字列入员工花名册，要求我提供建议以及让我时不时参与公司会议，这些都是光明正大、合乎法律规定的，但是我明白我得到这份工作背后的真正原因。

他给我提供的顾问年薪与一个企业总裁的薪水不相上下。

当天下午，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飞机场等着飞回佛罗里达的那一趟飞机，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刚把自己卖给别人的妓女。更糟糕的是，我觉得我背叛了我的女儿、我的家庭和我的祖国，但是我告诉自己，我别无选择。我很清楚如果我不接受这种贿赂的话，等着我的就是恐吓。

第 31 章

经济杀手落败伊拉克

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独立电力系统公司的总裁，之后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大部分时间任斯通-韦伯斯特顾问，这两份工作经历使我有机会了解伊拉克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事实上在 80 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它并不在美国的雷达防线范围之内。但无论如何，我对伊拉克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

一直以来，我都与在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朋友们保持着紧密联系，也一直和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及其他主要工程与建筑公司的人员，包括我岳父在内有所接触。许多 IPS 承包商聘请的工程师和一些独立能源公司都参与了在中东国家进行的项目。因此，我很清楚经济杀手们在伊拉克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里根和布什政府都立志要把伊拉克变成第二个沙特阿拉伯。对萨达姆·侯赛因而言，有太多复杂因素驱使他模仿沙特阿拉伯议院，他只须看到他们从洗钱事件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就行了。协议达成之后，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中兴起了现代化城市，首都利雅得那些到处觅食垃圾的羊群已经换成了锃亮的垃圾回收卡车，最新式的脱盐工厂、污水处理系统、通信网络以及输电线路纷纷进入这个沙漠国家，人们也开始尝到了现今世界最先进技术的甜头。

毋庸置疑，萨达姆·侯赛因清楚，在涉及国际法律的问题上，沙特阿拉伯人享受特殊的待遇。他们在华盛顿的好朋友对他们的很多行为都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包括向那些激进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其中许多是世界上公认与恐怖分子相差无几的激进分子）或向各国流亡人员提供政治庇护。事实上，是美国主动寻求和接受了沙特阿拉伯支持奥萨马·本·拉登发动的旨在反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里根和布什政府不仅鼓励沙特阿拉伯人这样做，还对其他许多国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也效仿自己，至少要对沙特阿拉伯人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 世纪 80 年代在巴格达的经济杀手为数众多，他们坚信萨达姆最终会开窍，我也不得不同意这种假设。毕竟，如果伊拉克与美国达成类似与沙特阿拉伯间的协议，萨达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控他的国家，甚至在整个中东地区扩大其影响力。

至于萨达姆是否是一个暴君，双手是否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甚至他怪异残忍的行为是否让人联想到阿道夫·希特勒丑恶的嘴脸，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美国早已习惯容忍这样的人，甚至为他们提供援助。我们非常乐意给他们提供美国政府债券，而我们换取的是石油美元、持续供应原油的保证，以及他们同意用债券的利息来请美国公司在伊拉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兴建新的城市、把沙漠变成绿洲。我们会非常乐意卖给他们坦克和战斗机，并且帮他们建造核电站，就像我们对其他很多国家那样，哪怕这些技术完全可以用于制造先进武器。

伊拉克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同小可，远远超过表面看起来的那种程度。与公众观点不同的是，伊拉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还包括水资源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流经伊拉克，这样一来，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中，伊拉克就控制了最为重要的、日益稀缺的水资源。在 80 年代，水资源的重要性尤为明显，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而对于在那里工作的我们来说，水就是生命。在供水部门私有化的过程当中，许多原本打算吞并一些小型独立发电厂的大公司的目光纷纷投向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地区的日益稀缺的水资源。

除了石油和水资源的重要性之外，伊拉克的地理位置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它毗邻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并且拥有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波斯湾的一段海岸线，以色列和前苏联均在其导弹射程之内。军事战略家把伊拉克的重要性比作在英法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哈得逊河谷（Hudson River）。在 18 世纪，法国、英国和美国都知道，谁控制了哈得逊河谷，谁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北美大陆。而今天，谁控制了伊拉克，谁就控制了整个中东。

除此之外，伊拉克对美国专业工程及技术需求巨大。伊拉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油田（某些评估结果显示，甚至比沙特阿拉伯更丰富），这就保证了伊拉克有能力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提供资金。

所有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建筑与工程公司，计算机系统供应商，飞机、导弹、坦克制造商，医药化学制品公司等都盯上了伊拉克。然而，直到 80 年代末期，萨达姆显然还不愿意买经济杀手的账。这对布什政府来讲是一大耻辱，让他们尴尬无比。像巴拿马一样，伊拉克也让布什出了丑。在布什努力寻找机会改善他在民众面前的形象的时候，萨达姆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1990 年 8 月，萨达姆入侵了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布什立刻强烈谴责萨达姆违反国际法，尽管那时候距离布什政府非法单方面入侵巴拿马还不到一年时间。

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在人们意料之中。布什总统最终下令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军事打击，50 万美军被送往伊拉克参加战事。在 1991 年初期的几个月内，美国对伊拉克的军用和民用设施进行了空袭，紧随其后的是长达 100 多个小时的地面袭击，把武器装备落后的伊拉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科威特安然无恙。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萨达姆这个暴君也总算受到了惩罚。而此时美国人民对布什的支持率狂升到了 90%。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开会，那是斯通-韦伯斯特要求我实际参与的为数不多的会议之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对于他们为布什的决定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拥护场面记忆犹新。斯通-韦伯斯特的所有员工自然是十分兴奋，这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决定对萨达姆实施军事打击，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获得胜利，他们就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利润以及升职和加薪的机会。

这种兴奋感并不仅仅体现在我们这些直接从战争中获益的商人身上，整

个美国似乎都迫切希望能在军事上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相信这种态度背后有很多原因，包括在里根击败卡特当选总统之后的一些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伊朗释放了在美国驻伊朗领事馆劫持的人质以及里根宣布将会就《巴拿马运河条约》重新展开谈判等等。布什入侵巴拿马，恰恰点燃了酝酿已久的火焰。

然而我相信，在顶着爱国主义光环的巧言辞令和军事行动的背后，美国的商业利益以及绝大多数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人，对整个世界的态度有着更为细微的转变。全球帝国已经成为现实，而美国多数人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双重概念已不容否认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

从最终的分析来看，并不仅仅美国是如此，全球帝国的发展穿越了所有的边境线。从前的美国公司，现在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即使从法律的角度讲也是如此。许多集团在世界多个国家成立了分公司，他们可以挑选那些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法规来开展公司活动，而众多的国际贸易合作协议和组织使得事情变得更简单。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词汇几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公司王国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因素。

形势发展出人意料、跌宕起伏，在1990年11月，我卖掉了独立电力系统公司，我也向公司王国低头的了。这笔交易对我和我的合伙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虽然当时卖掉公司是迫于阿什兰石油公司（Ashland Oil Company）的压力。我的经验告诉我，跟他们对着干会得不偿失，而卖掉公司还可以大赚一笔。不过让我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石油公司竟然会成为我的能源公司的新主人，我觉得自己像个叛徒。

斯通-韦伯斯特的工作只占用了我很少的时间。他们偶尔会要我到波士顿参加一些会议或者帮忙给些建议，有时候我会被派到像里约热内卢那样的地方去，与拥有决定南半球命运的民意领袖以及权力人士亲密接触。有一次，我乘私人飞机到危地马拉，然后一直打电话给当地的项目经理，提醒他们可以帮忙。拿那么高的薪水却只做一点点事，让我觉得良心颇为不安。我熟悉业务，也很想帮忙做些事情，但是后来他们并没有安排我做什么。夹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在中间做人让我很不舒服，我要做些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且这些事情是积极的、正确的，不会让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继续秘密地写，虽然写写停停，时断时续，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文字会有结集出版的那一天。

从 1991 年开始，我开始带领一些人到亚马逊河流域和殊瓦都族生活，向他们学习环境管理和原住民的土法子，当然他们也十分愿意与我们分享。随后的几年间，这类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最后顺应要求，一个非营利组织——“梦想改变联盟”（Dream Change Coalition）成立了。这个组织致力于改变工业化国家中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和生活方式，从而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梦想改变联盟”发展十分迅速，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追随者，并且鼓励更多人去创办类似的机构。后来，它当选《时代周刊》评出的最能体现地球日精神的 13 个网站之一。

在整个 90 年代，我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协助成立了几家非营利机构，并且在几家机构的董事会任职。这些机构很多都是从“梦想改变联盟”出来的那些富有奉献精神的人所创办，并且都涉及与拉丁美洲土著居民的协作，譬如亚马逊流域的殊瓦人和阿舒瓦人、安第斯山脉的盖丘亚人、危地马拉的玛雅人（Mayas），向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朋友教授当地的文化。斯通-韦伯斯特非常认同我在慈善行业的工作，因为这正好和他们对国际联合公益基金会（United Way）的承诺不谋而合。我也写了一些书，小心翼翼地将重点放在强调当地原住民教我的东西，而绝口不提自己作为经济杀手的过去。这样除了能够打发我的无聊，也让我能够得以与拉丁美洲保持联系，并且了解那些对我来说举足轻重的政治事件。

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热心于非营利事业和写作是为了弥补自己以前所作所为带来的过失，但是却越来越难以令自己信服。在内心深处，我明白自己其实是在逃避。在杰西卡将来所要面对的世界中，有无数无数的孩子背负着永远无法偿清的债务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我就是罪魁祸首。

我的书越来越畅销，尤其是一本叫做《世界如你所愿》（*The World Is As You Dream It*）的书。这本书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人请我做培训、开讲座。而有的时候，站在波士顿、纽约或者米兰的讲台上，面对听众，我会觉

得这是一种讽刺。如果世界真能如你所梦想的那样，为什么我还要有这样一个梦想世界呢？

1997年，我被派去加勒比地区的欧米加学院（Omega Institute）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讲座，地点在圣约翰岛的度假村，到的时候已近午夜。第二天早晨醒来以后，我走到房间的小阳台上，看着外面的伦斯特海滩，想起了17年前，那天我坚定了退出美因的决心。然后，我倒在了椅子上，思绪万千。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大部分的空余时间都是在这个小阳台上度过的，看着下面的伦斯特海滩，整理混乱的思绪。我开始明白，虽然自己已经退出经济杀手的行业，但并没有再进一步，徘徊不前绝对是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到那一周的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所处的世界并不是我所梦想的，而我需要做的是完全按照教给学生们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梦想，让梦想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回到家之后，我决定放弃在公司里的顾问工作。之前聘请我的斯通-韦伯斯特总裁已经退休。新上任的总裁是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人，他显然对我的经历和提议丝毫不关心，他发起了一个节约成本的计划，他很高兴再也不需要给我支付昂贵的顾问费用。

我决定写完这本已经写了很久的书——光是作出这个决定已经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和一些好朋友分享了关于写书的心得，他们大部分都是致力于亚马逊原著文化和热带雨林的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者。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并不支持我的想法。他们怕把这些事说出来会影响我的教学工作，并影响我所支持的公益组织，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帮助亚马逊流域的部落为保护土地和石油公司抗争，还告诉我，这样做可能会使我声誉受损，而且会影响整个公益运动的发展，甚至还有人威胁我，如果我这样做，他们就不再支持我。

于是，我只好再次搁笔。我将我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帮助人们去了解亚马逊流域这件事上，我要让他们去瞧一瞧那个几乎未受现代文明侵袭的地方。当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那里。

第 32 章

“9·11”事件的后果 及其对我个人的影响

2001年9月10日，我与我的那本《殊瓦精神》（*Spirit of the Shuars*）

一书的合作者沙凯姆·查姆比（Shakaim Chumpi）在厄瓜多尔亚马逊河里顺流而下。我们带着16位北美人士，向沙凯姆在热带雨林深处的聚居处进发，这些客人到这里来是为了了解当地人的习俗，并帮助当地人保护珍贵的亚马逊雨林。

沙凯姆是最近一次厄瓜多尔与秘鲁的战争中的一名士兵。一些主要石油消耗国的人们也许对这次战争闻所未闻，然而战争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给他们供应石油。尽管这两个国家多年以来一直纷争不断，可是直到最近，解决这种纷争的迫切需求才浮出水面。石油公司必须知道，和哪个国家谈判，才可以使他们让步，并最终夺取在这片石油资源丰富的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

殊瓦人结成了厄瓜多尔的第一道防守阵线。他们证明了自己是勇猛的斗士，经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殊瓦人对战争背后的政治含义浑然无知，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将为石油公司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抗争，是因为他们有历史悠久的尚武传统，是因为他们不愿让外国士兵践踏他们的家园。

我们划着船桨顺流而下，看着一群唧唧喳喳的鸚鵡从头上飞过，我问沙凯姆休战协议是否仍具有效力。

“对，”他说，“但恐怕我还得告诉你，我们现在也准备与你们开战。”

第32章 “9·11”事件的后果及其对我的影响
Chapter 32 September 11 and its Aftermath for Me, Personally

他接着解释说，他说的并不是我或者是我们这一队人之中的一个。

“你是我们的朋友。”他安慰我。他指的是我们的石油公司和即将派驻
到他们丛林里的军队。

“他们是怎么对待奥拉尼族人的，我们都有目共睹。他们破坏了奥拉尼
人的森林、污染他们的河流，杀死了许多人，包括小孩，奥拉尼人甚至不能
再说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民族。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
绝不会让石油公司侵占我们的领土，就如我们不会让秘鲁人入侵一样，我们
会坚持抗争，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为止。”

那一夜，我们的队伍在殊瓦人的房子环绕的火堆旁边扎营，房子是竹条
搭起来的，房顶用茅草覆盖。我与他们谈起了和沙凯姆的对话。我们真不知
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对我们的石油公司和美国有同样的看法。还有
多少人，像殊瓦人那样，日夜提防我们侵入他们的生活，摧毁他们的文化，
掠夺他们的土地？

第二天早上，我到放置双频无线电对讲机的小办公室去。我需要安排飞行
员在几天之后到这里来接我们。我和他们对话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惊叫。

“天哪！”对讲机另一端的人喊道，“纽约被袭击了！”他调到商业电
台，播音还伴有背景音乐，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听到了远在美国的整个
事件的实况追踪报道。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永远难以忘记这一刻。

回到佛罗里达的家中，我知道我必须到事故发生的地点——零地带
(Ground Zero)^①去看看，这里是世贸中心大楼的原址。我立刻订了前往纽
约的机票。第二天下午，当我在酒店登记入住以后便想立即前往纽约。那是
11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气候有点反常的温暖。我沿着中央公园漫步，心
潮澎湃地朝着那个我曾经去过无数次的地方，华尔街附近，那个现在被称作
“零地带”的地方走去。

当我离那里越近，就感到越来越深的恐惧。迎面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硝
烟气味，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毁灭。曾经蔚然矗立的高楼变成了一座废墟，

①零地带 (Ground Zero)：原义为爆破目标，投弹中的目标，如导弹或炸弹，美国
人已习惯把世贸中心废墟称作“零地带”。——译者注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到处是扭曲和熔化的钢筋，空气里弥漫着烧焦的气味，我对此毫无准备。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此工作的人们——两个月之前，他们还在我的身边，那些在附近工作和居住的人。一个埃及人在他的小小修鞋店外闲逛，摇着头似乎不相信眼前这一切。

“真是难以相信，”他嘟哝着说，“我失去了多少客户啊，还有许多朋友。我的外甥就死在那里。”他指着蓝天，“我想我看到他跳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有人手牵着手从上面跳了下来，扇动手臂，好像会飞似的。”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人们似乎无法接受发生在他们周围的这一切，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忧伤、悲痛。

可是还有点儿什么别的不太对劲。一开始我弄不清楚，后来我突然想到了：阳光，下曼哈顿一直是个漆黑的峡谷。回想起那些我长途跋涉到这里为独立电力系统公司筹集资金的日子，我与投资银行家在“世界之窗”^①一边进餐，一边商量策略，只有在世界贸易中心的顶层那种高度，才能看到阳光。现在，在街道上就可以看到阳光。黑暗峡谷被完全劈开，站在街道上就可以感受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温暖。阳光是有了，但是人们的心扉是否也能因此而敞开？我对自己有那样的想法而感到愧疚。我从“三一教堂”^②转弯处转了过去，向华尔街走去，重新回到被封锁在阴影之中的老纽约城。没有天空，没有阳光，街道上人人行色匆匆，无暇顾及旁人，一个警察对着一辆抛锚的车吼叫。

我在一处阶梯上坐了下来，华尔街14号。不知从哪里传出来风扇和鼓风机机的轰鸣声，这个声音遮盖了街道上其他的噪音。我想应该是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那一堵巨大的石头墙里传出来的。我看着这里走过的人们，他们离开办公室，穿过街道，或许赶回家中，又或是到餐厅、酒吧去谈生意，人来人往，却没有谁与我有目光交流。

我静静地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过了一会儿，我把手伸到衣兜里，拿出

①世界之窗 (Windows on the World)：原世贸1号楼顶层的酒吧。——译者注

②三一教堂 (Trinity Church)：位于百老汇街与华尔街交叉口的三一教堂，建于1697年，高达26米的尖塔是最显著的特征。——译者注

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纸，上面写满了经济数据。

然后我留意到街上的一个男人，低着头，拖着沉重的步子。他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穿着一件与华尔街温暖的下午毫不相称的脏兮兮的外套。我觉得他应该是个阿富汗人。

他也看了看我。他仅仅迟疑片刻，便向我走了过来，踏上了台阶，朝我点点头后坐在我旁边，我们之间只隔着一码左右的距离。他直直地盯着前方，我想应该由我来开始话题。

“下午天气不错啊。”

“很好。”他的口音很重，“这样的時候，我们需要阳光。”

“你的意思是……因为世贸中心？”

他点点头。

“你从阿富汗过来？”

他盯着我，“这样你也看得出来吗？”

“我去过很多地方，最近我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他摸了摸他的胡子，“那里正发生战争啊。”

“是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不是对这种教派之间的斗争感到惊讶？”

我们目光相触，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几乎深得像黑色。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智慧和悲伤。他向着背后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转过头去，用手指着那栋楼。

“可能吧，”我表示赞同，“这与经济有关，而不仅仅是宗教。”

“你当过兵？”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不，我是经济顾问。”我把那写满了数据的纸递给他，“这就是我的武器。”

他伸手接过去，“数字。”

“全球各国的数据。”

他认真地看着那些列表，然后微微笑了笑。“我读不懂”，然后他把那些数据还给我。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全球每天有 24 000 人饿死。”

他低声地发出一声惊叹，思考了片刻，然后叹了一口气：“我差点儿就成了他们中的一个。我在坎大哈^①有一个小石榴园，俄国人来到我们那个地方以后，有很多穆斯林游击队员就躲在我那个小石榴园里。”

他举起手，仿佛端起一支步枪一样，“埋伏。”他放下手，“我所有的树和水沟都被毁了。”

“后来呢，你怎么办？”

“我的石榴园都被毁了，我也成了乞丐。”他摇摇头，仿佛陷入沉思之中。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他开口了：“我不喜欢做乞丐，我的孩子都死了，所以我种罂粟。”

“鸦片？”

“没有树，没有水，这是养家糊口的唯一方法。”他耸耸肩膀。

我觉得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一种忧伤愧疚之感涌上心头。

“我们把种鸦片的人叫做魔鬼，可是我们中的许多有钱人，就是靠毒品交易发家的。”

他看着我，眼睛像是要穿透我的灵魂。“你肯定是个军人。”他说，一边点着头，似乎要再次确定他单纯的结论。然后，他慢慢地站起来，蹒跚着走下台阶。我想叫他留下，可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我好不容易站起来跟着他，走到楼梯最下面一级的时候，我被旁边的一个标志吸引。这个标志上面有一幅画像，画中正是我刚才坐过的那栋大楼，顶上的一行文字说明，这个标志是由纽约遗产保护组织出资建造的。上面写着：

华尔街 14 号设计理念来源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钟楼和纽约证券交易大楼（Corner of Wall and Broad）上的摩索拉斯陵墓（Mausoleum of Halicarnassus）雕塑。它曾经是全球最高的银行大厦，539 英尺（约 164.3 米）高的摩天大楼原来是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美国最有钱的金融机构之一——总部所在地。

①坎大哈（Kandahar）：阿富汗城市。——译者注

第 32 章 “9·11”事件的后果及其对我的影响
Chapter 32 September 11 and its Aftermath for Me, Personally

我站在那里，满怀敬畏地抬头看着这座大厦。20 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华尔街 14 号的角色与现在的世贸中心无异，它就是权力与经济控制的标志。这里也是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的所在地，也是我曾经与之商量投资我的能源公司的机构之一。

这次与阿富汗老人的相遇和交谈，看起来像是一次偶然。偶然，这个词让我停了下来。我不禁开始思考我们对于偶然的反应将怎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我对这一次的偶然，又该作何反应？

我继续向前走，看着人头攒动，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在一座建筑物旁边，有一座巨大的雕像，蒙着一块蓝色的塑料布。大厦正面一块石墙上的雕刻告诉我，这是联邦大厅（Federal Hall），华尔街 26 号。1789 年，乔治·华盛顿在此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并宣誓他将维护全民族的生命、自由，为全民族谋取幸福的生活。这里与“零地带”比肩而立，与华尔街咫尺而邻。

我继续在这里兜兜转转，来到了潘街（Pine Street），与大通银行（Chase）迎面相对。大通银行由戴维·洛克菲勒创立，这家银行在石油美元的滋养下生根发芽。大通银行，一个为经济杀手服务的机构，也是深谙推广全球帝国之术的大师，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公司王国的象征。

世贸中心是戴维·洛克菲勒于 1960 年开始筹建的一个项目，近年来，这座综合大厦却被视作一个累赘。在外人看来，世贸中心大楼并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其昂贵和低效率的电梯系统也是人们埋怨它的原因。双子塔的两栋楼还曾经被人戏称为“戴维”和“纳尔逊”。现在，累赘消失了。

我在街上慢慢地溜达，脚步沉重。尽管下午非常温暖，但我却感觉到阵阵寒意，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和不祥之兆排山倒海向我扑来。我无法分辨这种预感从何而来，我加快了脚步，试图将它赶走。最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仍然冒着浓烟的大黑洞前。我倚在一座侥幸逃脱厄运的大楼墙边，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那个深坑。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人们惊慌失措地从快要倒塌的大楼里跑出来，消防员奋不顾身冲进大楼里救人。我努力想象着那些万不得已跳下来的人们，试图去体验他们那种绝望的感觉，可是我看不到，更体验不到。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相反，我看到了奥萨马·本·拉登双手接过了美国公司送上来的钱，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合同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然后我看到自己坐在电脑面前，面对着一个空白无物的显示屏。

我的目光离开了“零地带”，环顾四周，看着纽约那些幸免于难、业已恢复常态的街道，我不知道今天走在这里的人是否会想到这些——不仅仅是双子塔的毁灭，还有那些被毁坏的石榴园以及地球上每天活活饿死的 24 000 人。我怀疑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能不能将自己与工作、与他们耗油的汽车，以及他们的利息剥离开来，又是不是可以想想他们对这个世界，即这个将属于他们的子孙的世界的贡献。我想知道他们对阿富汗是否有一丝了解——并非电视上的阿富汗，不是那个遍布美国军队营帐与坦克的阿富汗，而是那一位老人的阿富汗。我想知道，他们获悉每天因饥饿而死去的那 24 000 人后，究竟会怎么想。我又看到了自己，坐在空白的电脑屏幕前面。

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回“零地带”。那一刻，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政府现在想的是如何采取行动报复，现在已经将焦点对准了阿富汗那样的国家。而我，想到的是地球上那些贫困地区的人民，那里的人们憎恨我们的公司、军队、政策以及我们向全球帝国迫近的策略。

我想知道，巴拿马、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危地马拉和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会怎样？

我的背离开了靠着的那堵墙，迈步离开。突然一个个子矮小、皮肤黑黝黝的男人挥动着手中的报纸，嘴里用西班牙大喊着。我停下了脚步。

“委内瑞拉革命即将爆发！”他的声音甚至盖过了街道上的行人汽车的声音、盖过了喇叭声，也盖过了熙熙攘攘的人流。

我从他那买了一份报纸，站在原地迅速浏览了一遍头条文章。文章是关于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这位委内瑞拉民主选举产生的反美总统，以及美国政策在拉美地区引起的仇恨暗流。

第 33 章

委内瑞拉：被萨达姆救了一命

委 内瑞拉又会怎样呢？

我注意委内瑞拉已多年。委内瑞拉原来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是因为发现了石油而让他一夜暴富。但是，石油也导致了这个国家被公司王国无耻剥削，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成为像我这样的经济杀手聚集地的国家典型。

那天我在“零地带”读到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事件是 1998 年委内瑞拉选举的结果，当时委内瑞拉的穷苦大众以及被剥削民权的人以压倒性的投票选举了查韦斯为他们的总统。查韦斯立刻制定了激进的措施，控制了法庭和其他机构，解散委内瑞拉议会。他谴责美国实行的是“毫无廉耻的帝国主义”，大量发表反对全球化的言论，还提出一项能源法案，该法案无论是名称上还是内容上都与罹难前的海梅·罗尔多斯在厄瓜多尔实行的法案相仿，此项法案将外国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利金翻倍。同时，查韦斯将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的高管人员换成了对其效忠的人。

委内瑞拉石油对全球各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02 年，该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石油输出国也是美国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雇员 4 万，年销量达 500 亿美元，占了该国出口总额的 80%。该公司是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国家收归该公司后，查韦斯作为主要参与者成功地跻身世界舞台。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许多委内瑞拉人都认为这是上天安排的。1922年12月14日，一股巨大无比的石油从马拉开波湾（Maracaibo）附近的泥土里喷出，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每天数十万桶的原油不断涌出。这改变了委内瑞拉的历史，到1930年，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第三大的石油输出国。

接下来的40年里，石油收入让委内瑞拉从贫穷国家一跃跻身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全国上下关于国计民生的统计指数都有所提高，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国民寿命以及婴儿存活率等。商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1973年欧佩克石油禁运期间，原油价格暴涨，委内瑞拉趁机大捞了一笔。于是，经济杀手转战到委内瑞拉，国际银行蜂拥而至，为委内瑞拉提供大笔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及摩天大楼建设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以公司职员形象出现的经济杀手“杀”到委内瑞拉，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得以在此一展拳脚。委内瑞拉的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因而为各种产品提供了成熟的市场。

石油价格下降后，委内瑞拉无法偿还外债。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加拉加斯施加压力，责令其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使其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支持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委内瑞拉人对此反应强烈，在后来发生的暴乱中死亡人数达两百多人。1978-2003年，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下降40%以上。

贫困的加剧导致了民怨的高涨，两极分化因而形成，中产阶级与贫苦大众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深。就如所有经济发展依赖原油生产的国家一样，人口群体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下滑的经济让中产阶级跌进穷苦大众的群落中。新总统查韦斯上任以后，就采取措施挑战布什政府。“9·11”事件之前，华盛顿考虑是要对委内瑞拉“表态”了，现在经济杀手失败了，是时候让“豺狼”出动了。

“9·11”事件改变了所有行动的次序。总统布什及其顾问将重心放在了获得社会舆论以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和入侵伊拉克上面，紧接着美国经济又陷入衰退之中，解决与委内瑞拉的冲突问题已经退居次席了。然而在某些方面，布什与查韦斯的冲突已经很明显地白热化了。由于伊拉克和其他

中东地区的石油来源受到威胁，华盛顿不得不再次把精力放在委内瑞拉上。

看到“零地带”的景象，与阿富汗老人的偶遇，读到有关查韦斯的新新闻，所有的这些让我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多年以来我极力回避的问题上来。这让我不得不好好想想，过去的三十多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我不可能否认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是一个经济杀手的事实，给我女儿这一代人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知道不能再继续拖延，必须采取措施弥补我的过失，我得将我的生活真相和盘托出，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公司王国的真面目以及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人憎恨我们。

于是我又提起了笔，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的故事显得太陈旧和遥远了。我得让我的故事贴近当今的时势，于是打算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走一趟，我要为这三个国家写时事评论。这似乎是对当今世界时事的一大讽刺：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政治动荡，最后都由一位不尽如人意的领导人执政（残酷暴虐的塔利班、疯狂的萨达姆以及经济上无能的查韦斯）。然而，美国却绝不会尝试去为这些国家寻找解决深层问题的方法，相反，它的反应仅仅是将这些阻挡美国石油政策的国家领导人铲除。在许多方面，委内瑞拉是最复杂的例子，当军事干涉已经出现在阿富汗和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在伊拉克的时候，布什政府对查韦斯的反应仍难以琢磨。就我个人的看法，事情的发展与查韦斯是否是一位好领导人无关，而是与华盛顿政府对一位阻挠帝国前进的领导人作出怎样的反应有关。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去开始我的旅行，情况又有了改变。2002 年，因为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我不得不连续去了几次南美洲。我和一个生意即将破产的委内瑞拉人一起到亚马逊河去，后来我们成为好友。在南美洲，我与各个经济层次的拉美人见面，也有人认为查韦斯是个救世主。

2002 年 12 月，委内瑞拉与伊拉克的局势都变得危机四伏，两国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经济杀手与豺狼们在伊拉克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他们都无法迫使萨达姆屈服，而现在我们已准备好使用最后一招——军事入侵。在委内瑞拉，布什政府运用了克米特·罗斯福的伊朗模式，如《纽约时报》报道：

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今日走上街头，高呼他们罢工的决心，目前罢工已经进入了第 28 天，强烈要求总统乌戈·查韦斯下台。

约有 3 万石油公司的工人参与了罢工，这给这个国家——全球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最近，罢工已经陷入了僵局。查韦斯利用不参与罢工的工人，试图让国营石油公司的运作正常化。他的反对者们在工商联盟领袖的带领下，声称他们的罢工将迫使石油公司倒闭，继而让查韦斯政府倒台。

这也是当年中央情报局让摩萨德下台、伊朗国王上台使用的同样的手段，二者如出一辙。两次事件相距 50 年，历史不可思议地重演了。50 年，这一切爆发的原因还是石油。

2003 年 1 月 4 日，反对查尔斯的人与他的支持者发生了冲突。据报道，有工人在事件中中弹身亡，另外数十人受伤。第二天，我与一位数十年来与“豺狼”为伍的人交谈。像我一样，他也从未直接为政府工作，可他在不少国家进行了秘密的活动。他告诉我，一个承包商与他商议共同在加拉加斯煽动罢工游行，并且贿赂军队的官员（其中不少军官当年在美洲学校接受训练）以说服那些军官反对他们的总统。但是他拒绝了那个承包商的请求。

石油公司的高层人员和华尔街害怕石油价格猛涨以及美国石油库存量有所下降。如今中东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布什总统将不惜一切代价来推翻查韦斯。后来传来的消息表明他们成功了：查韦斯被驱逐。《纽约时报》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确定谁将在现代委内瑞拉社会中扮演克米特·罗斯福的角色：

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以及冷战之后的时期，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支持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独裁主义政权。

1954 年，在弹丸之国的危地马拉，中央情报局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政府，并且扶持右翼政府反对左翼叛军组织。

在智利，中央情报局发动一场政变，奥古斯托·皮诺切克 (Augusto Pinochet) 被任命为新总统。在秘鲁，一个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仍然显示了中央情报局 10 多年来对现在已被免职的前总统艾伯特·K. 藤森 (Alberto K. Fujimori) 以及其声名狼藉的间谍头子弗拉蒂米洛·L. 蒙特西诺斯 (Vladimiro L. Montesinos) 的支持。

1989 年，巴拿马的独裁者兼毒枭曼纽尔·A. 诺列加倒台了，20 多年来，诺列加一直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发起一场对抗尼加拉瓜左翼分子的非武装斗争，包括向伊朗出售武器。不过，里根政府的那些高级官员却因此而受指控。那时候被调查的还有在反抗查韦斯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奥特·瑞切 (Otto J. Reich)，但他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他后来成为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现在是总统特派的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查韦斯的倒台是他的卓越成就之一。

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一次反击战中，查韦斯再次占了上风，政变后不到 72 小时他重新执政。不像伊朗的摩萨德，尽管查韦斯身边的那些政府官员都被美国所笼络，但是查韦斯还是成功地保住了军权。此外，他还保住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国营石油企业。

随后，查韦斯政府加紧了对石油公司雇员的控制，肃清了几个背叛查韦斯的军队军官，并将那些反对他的人驱逐出境。他要求将两位著名的反对党领袖关押 20 年，这两个人与华盛顿政府一起煽动了全国性的罢工。

这件事对布什政府来说是一场灾难。《洛杉矶时报》报道：

布什政府于星期二宣布，政府曾经讨论数月，试图用委内瑞拉当地军队和民间领袖组织的力量除掉总统乌戈·查韦斯……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而布什总统也因为此事受到调查。

很明显，在委内瑞拉，不但经济杀手失败了，豺狼们也失败了。2003

一个经济系学生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年的委内瑞拉与 1953 年的伊朗二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我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预兆或者仅仅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我想知道华盛顿政府的下一步棋会怎样走。

至少目前来说，我相信一场重大的危机已经从委内瑞拉转移了，查韦斯得救了，被萨达姆所救。布什政府不能同时兼顾阿富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此时此刻，美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充分的政治理由这样做。可是我知道，形势随时会改变，查韦斯总统也许将遭到更加强烈的反抗。虽然查韦斯得以重新上台，委内瑞拉国内发生的一切，说明 50 年来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第 34 章

重返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的确是一个典型。可是，当我回头再去看发生在那里的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这时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我热爱的国家，一个我最初以美国和平队身份在这里工作的国家：厄瓜多尔。

我首次到厄瓜多尔是 1968 年，在那以后的日子里，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我和我在美国的那些同行，已经成功地让这个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们向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因此厄瓜多尔有能力聘请我们的工程与建设公司，建设那些仅仅对该国最富有的家族有利的项目。结果是，在过去的 30 多年，官方统计的贫困人口从 50% 上升至 70%，就业不足或失业率从 15% 上升至 70%，国债从 2.4 亿美元狂飙至 160 亿美元，而分配给每个贫困国民的自然资源从 20% 下降到 6%。如今的厄瓜多尔 50% 以上的预算都必须用于偿还外债，而不是用来帮助国内那些极端贫穷的人。

厄瓜多尔发生的这一切都表明了这并非是个单阴谋的后果。这是一个在民主党与共和党执政时期都存在的进程，一个牵涉到所有主要跨国银行、企业和不同国家的外国援助机构的进程。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领导的角色。

在那 30 多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到将厄瓜多尔推到悬崖边上的行动当中。其中一些人，比如说我，明明清楚自己的行径，可多数人确实以为自己仅仅是将在商学院、工程学院或者法学院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又或者仅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仅只是想以像我这样的上司为榜样。最糟糕的是，这些参与者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出自善良的本意，还乐观地以为他们在帮助一个备受贫困煎熬的国家。

尽管他们是不知情的、是被欺骗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自我欺骗，他们也并非任何秘密阴谋组织的成员，但他们仍然是帝国主义体系的产物。不需要有人走出来寻找那些可以受笼络和威胁的人，他们已经被公司、银行和政府机构招募了，贿赂的形式包括工资、奖金、养老金和保险政策；而威胁则是基于社会道德观念、来自同辈人竞争的压力。

这个体系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新千年到来的时候，厄瓜多尔已经完全陷入我们设的圈套之中。我们清楚厄瓜多尔的热带森林里蕴藏着大片的石油，也很清楚那一天终究会来临。

那一天终于在 2003 年初到来，我开着我的斯巴鲁“傲虎”从基多辗转向森林小镇贝壳城进发。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时已经夺回政权，他藐视布什政府，而且他最终胜出。而萨达姆则没他那么好运，等待他的将是美国的人侵。石油供应一时间达到了三十多年来的最低点，而要想从伊拉克获得更多的石油看来希望渺茫。而这个时候，布什政府的财政开始出现危机。

我开车经过帕斯塔萨河上的那一堵庞然大坝，我知道在厄瓜多尔那里的斗争不仅仅是世界上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的阶级斗争，也不仅仅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斗争，这些斗争最终将定义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破坏者的身份。我们强迫这个小国将亚马逊森林向我们的石油公司开放。最后所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如果我们坚持讨回我们的债务，最终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可以计算的范围。那将不仅仅是对原始文明的破坏，也是对人们生命、对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破坏，而这里面可能有治疗人类疾病的东西。热带雨林不仅仅吸收了我们的工业排放出的温室气体，释放出我们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氧气，还促进了云的形成，最终为地球带来很大一部分的干净水源。这就已超越了生态学家要求保护亚马逊森林的标准论据，直接深入到我们的灵魂之中。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这个战略，我们将延续一种早在罗马帝国之前就已出现的帝国主义模式。我们谴责奴隶制，可我们的帝国却比罗马帝国使更多的

人沦为奴隶。

从我的斯巴鲁车窗望出去，看着外面那已被砍伐光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我在和平队的时期，这里曾经覆盖着葱葱郁郁的热带雨林。我突然又被另外一个认识吓呆了，因为我渐渐意识到，不仅仅是厄瓜多尔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实际上我工作过的每个国家，凡是资源被全球帝国觊觎的国家，破坏程度都同等的严重。我对厄瓜多尔情有独钟，而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留在这里的那些日子让我失去了“清白之身”。

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非常珍贵，但是在这里居住的土著民族和其他任何生命一样他们与伊朗的沙漠和以亚明为代表的贝多因人一样，他们也与爪哇的山峦、与菲律宾海滩外的海洋一样，与亚洲大草原、非洲的稀树大草原、北美洲的森林、北极的积雪和全球其他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一样，都同样珍贵。

我记起了一组数据：同样是占世界人口的 1/5，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的人口平均收入比例从 1960 年的 30 : 1 变成 1995 年的 74 : 1。而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所有银行、企业和牵涉到国际“援助”的机构却告诉我们，情况已经得到改善。

我再一次来到了厄瓜多尔，一个在我的心里有着特别位置的国家。那是 2003 年，距我第一次踏足此地已经有 35 年了，那时候我作为一个打着和平幌子的美国组织的志愿者来到此处。这一次我来到这里，为的是平息一场过去 30 年里我一直努力促成的战争。尽管看起来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发生的事件足以让我们接受教训，然而在厄瓜多尔，情况非常特殊。

这场战争并不需要美国士兵的介入，那些拿着长矛、弯刀、单发的前膛炮步枪的土著战士，将与厄瓜多尔现代部队——以美国特种部队为顾问且被石油公司招募并受过豺狼训练的雇佣兵——发生正面冲突。这场战争，就像 1995 年厄瓜多尔与秘鲁的战争一样，也许并不为身在美国的人知道。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也就是 2002 年 12 月，石油公司代表指控一个土著社区将其员工劫持为人质，他们指控参与此事的人是恐怖组织成员，并可能与基地组织（Al Qaeda）有联系。这件事被闹得沸沸扬扬，因为该石油公司并未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得到开采石油的许可证。可是，该公司称其员工有权进行开采前期的勘探工作——这个说法几天后激起了土著人的强烈抗议，他们道出的是事情的另一面。部族的代表坚持说，石油公司工人已经踏进了禁地，而土著战士并未携带武器，他们也并未使用暴力或任何其他方式胁迫石油公司工人。实际上，他们将工人们带到村里，还用食物与吉开酒（Chicha）款待该公司工人。与此同时，部族人劝说石油公司的工人坐船离开，并坚持说他们并没有将工人扣留，石油公司的工人随时都可以离开。

我想起 90 年代时殊瓦人对我所说的话。当时我卖掉了自己的能源公司，帮助他们保护森林。“梦想是怎样的，世界就是怎样的。”他们说，然后他们又指出，我们北美人的梦想是规模庞大的工业、数不清的汽车以及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们的梦想实际上是一场噩梦，一场最终将毁灭自己的噩梦。

“改变你们的梦想。”殊瓦人建议我说。可是十多年以后，尽管一些非营利组织和个人都非常努力，但是这场噩梦却让人觉得越来越恐怖。

在到达森林小镇贝壳城以后，我便急忙赶去赴约。参会的男女代表来自不同的部落：契川、殊瓦、亚川（Achuar）、殊瓦尔以及扎帕罗（Zaparo）。其中有一些人花了好几天时间穿过森林来到此处，还有些人乘坐非营利组织的小飞机到此。一些人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脸上涂着图案，戴着插着羽毛的头饰，尽管多数人还是模仿城里人的穿着打扮，他们穿着休闲裤、T 恤和鞋子。

被指控绑架人质的社区代表们首先发话。他们告诉我们，就在工人们回到石油公司后，大约有 100 名厄瓜多尔士兵来到他们的小村庄。他们提醒我，现在是热带雨林的一个特殊季节——桉恩特棕（Chonta）结果的季节，在土著文化中，这是一种很神圣的树。这种树开始结果的时候，就标志着这个区域许多鸟类的交配期开始，其中包括不少濒临灭绝的品种，而士兵的进入，让鸟儿没办法正常繁殖。部族本身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在桉恩特棕结果的季节，任何人不得捕捉这些鸟类。

“士兵们来的时间真是糟糕透顶了。”一名妇女解释说。听他们述说了

整个事情的经过，我能感受到她及其同伴们的痛苦。士兵们的枪口对准了鸟儿，这是他们娱乐的方式，也让他们大饱口福。另外，他们袭击了当地人的院子、香蕉林和树薯地，将珍贵的表层泥土破坏得无法复原。他们使用炸药在河里捉鱼，甚至吃掉了农家养的动物。他们没收了当地猎人的枪和喷雾器，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还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把燃油和化学溶剂倒进河里……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男人说，“我们可以斗争，不然我们就得忍辱求全——那时候我们认为还不到起来抗争的时候。”他描述了他们当时是怎样通过鼓励自己的族人通过绝食来抗议军队的行动。他将此称作斋戒，但听起来更加像是自愿的挨饿。老人和儿童因此营养不良，有的人病倒了。

他们谈起了威胁和贿赂。一个妇女说：“我的儿子会说英语和西班牙语以及几种土著语言，他给一个生态旅游公司当导游，他们付给他一笔不错的薪水。而石油公司则给他十倍的钱。

“他能怎样呢？现在他写信公开谴责原来雇他的公司和其他那些过来帮助我们的人，他在信中把石油公司称作我们的朋友。……他已经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我的孩子……”

一位戴着犀鸟羽毛饰物的年迈萨满教长者站了起来，说道：“你知道那三个我们选举出来代表我们部族与石油公司对抗的人吗，他们在飞机失事中罹难。我站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那些大多数人都会说的话，我要说的是，他们三人的死亡使我们的组织出现了人员空缺，而那些石油公司的人不失时机地渗透到我们的组织中来。”

另外一个人拿出一份合同开始念了起来，合同约定以30万美元的代价将一大块土地出售给伐木公司，合同由三个部族领袖签署。

“那不是他们的真正笔迹，”他说，“我清楚，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是我的兄弟。这是另外一种形式暗杀，这让我们的领袖蒙受耻辱。”

也许这种事情发生在别的国家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但是像厄瓜多尔这个石油公司尚未得到开采权的地方来说，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奇怪。石油公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司在附近不少地方开采了石油，因此土著人直接看到了钻探石油带来的后果，他们亲眼目睹了邻居家园的破坏。我坐着聆听的时候，不禁要问自己，如果在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电视台（CNN）或者晚间新闻上播出这种集会的片断，我们美国公民究竟会有何反应。

这次的集会吸引了很多人，也披露了一些让人困扰的事实。在会议休息的时候以及傍晚时，在与其中一些人私下的谈话中，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美国要侵略伊拉克。有关这场战争的新闻刊登在厄瓜多尔官方报纸的头版，丛林中的小镇也得知此事，对此事厄瓜多尔媒体的报道与美国媒体的大相径庭。这里的报道提及了布什家族拥有石油公司和统一水果公司的事实，也提到副总统切尼（Cheney）曾经是哈里伯顿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

有人给从未上过学的部族人念了这些新闻。每个人似乎对此都很感兴趣。我身在亚马逊的热带森林，身处被北美人认为是“落后”甚至是“野蛮”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之中，可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却直指全球帝国的核心。

我开车离开了贝壳城，再次经过那堵大坝，回到高高的安第斯山上。一路上我不断地想，这一次厄瓜多尔之行所见到的这一切与我在美国见到的那一切有什么区别。看起来亚马逊部落也可以教给我们不少知识，尽管我们上学念了许多书，花了不少时间看杂志和看电视新闻，可我们缺乏他们那种民族保护意识。

这一连串的想法让我想起了“秃鹫和鹰的预言”，这个预言我在拉丁美洲听过无数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预言。

几乎所有我知道的文明都预言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们将进入一个转折期。在喜马拉雅山的僧院、印度尼西亚的礼仪场合以及北美洲的土著保留区，从亚马逊的深处到安第斯山脉的顶峰以及中美洲古代玛雅城，我都听到过，我们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每个人都肩负着必须完成的使命。

当然，由于语言不同，说法也各不相同：新世纪、第三个千年、水瓶座世纪、第五个太阳的开端以及新的开始等。

尽管所用的词语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这个预言说的是在历史混沌时期，人类社会分成两派，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进：一

条是秃鹭的道路，另外一条是鹰的道路。在15世纪90年代，预言说两条道路将合并，鹰将秃鹭赶到濒临灭绝的边缘。然而500年后，就是20世纪的90年代，一个新纪元即将开始。这时，鹰和秃鹭将有机会重新联合，沿着同一条路，共同翱翔在同一片蓝天下。

“秃鹭与鹰的预言”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阐释——标准的解释是，科学技术将与土方法相结合、阴阳平衡、南北文化现象联合……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其有关觉悟的提法。这种提法指出，我们将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期，我们可从对自己、对世界的反观中提升自己，而且可以利用这种反观来提高自身的觉悟水平。作为人类，我们可以真正地觉醒，从而进化成为更高级的物种。

亚马逊的秃鹭让一切变得很明朗，如果我们提出新世纪人类的本质是什么，提出我们有关接下来几十年所作所为的意图是什么，那么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清自己在伊拉克和厄瓜多尔所作所为的后果——鹰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清醒：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停止继续关心肥皂剧的结局、足球赛、季度收益表以及每天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我们必须重新估量自己的位置，还有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最终何去何从。如果我们不反复地叩问自己这些问题，那么将来的日子将会过得很艰难。

第 35 章

揭穿骗人的面具

2003年，我刚刚从厄瓜多尔回到家中，美国就入侵了伊拉克，这是十年多以来的第二次——经济杀手失败了，豺狼失败了，所以年轻的美国男女士兵被派上战场，在沙漠中杀戮与牺牲。入侵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极少美国人能设身处地考虑到的问题，那就是这对沙特阿拉伯王室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夺取了伊拉克这个许多人认为石油储备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国家，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继续保持 20 世纪 70 年代达成的协议——当初因为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而引发的协议。

萨达姆的结局，将和巴拿马的诺列加一样。就巴拿马而言，一旦我们在该国设置傀儡政府，我们就可以控制运河，而无须顾忌当年托里霍斯与卡特总统签订的协议。但现在是不是一旦我们侵略了伊拉克，就可以拆散欧佩克呢，沙特阿拉伯王室是否就与全球石油政治毫不相干了呢？一些专家已经开始质疑，为什么布什政府不在阿富汗追击基地组织而是要积极攻打伊拉克？确保石油供应，同时确保建筑合同的签订，是不是比打击恐怖分子更加重要呢？

还有一种情况是，无论如何，欧佩克将努力重申其主张。如果美国控制了伊拉克，其他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将孤注一掷提高油价或者削减供应。与之相联系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暗示着，尽管只会发生在高级国际金融机构以外的少数人身上，却能让已有的政治体系失去平衡，并将最终颠覆公司王国尽心竭力建立起来的体系，让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

的全球帝国走向自我灭亡。

归根结底，全球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而美国铸币厂（United States Mint）有权印美钞。这样一来，尽管深知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我们还是要向他们贷款。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他们兑现这些债务，而是让他们还不起债务，被我们控制，让我们能够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将冒着最终蒙受巨大资金损失的风险，毕竟没有任何债权人可以承受太多拖欠的贷款，不过我们的情况有点特殊，美国印出来的钞票并非由黄金来支持的。实际上，背后支持着美元的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全世界对我们美国经济的信心，以及我们为建立帝国而配置军队与资源的能力。

印美钞的资格让我们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这意味着，我们随时都可以去放那些别人永远还不清的债，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自己可以累积巨额的债务。到 2003 年末，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 6 万亿美元，而且在 2004 年底之前将会达到 7 万亿美元，平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就是 2.4 万美元。这些债大部分是欠着亚洲国家的，尤其是日本与中国——通过向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销售消费品累积起来的资金。

只要世界还接受美元为主要货币，这笔巨额债务对公司王国来说就不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如果有另外一种货币能代替美元的位置，同时如果美国的债权人（例如日本和中国）决定要追讨他们的债务，情况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美国将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事实上，这样的货币已经出现了。2002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登上国际金融舞台，之后数个月，欧元的威望和实力不断攀升。欧元的出台给欧佩克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欧佩克国家想要为美国入侵伊拉克实施报复或者以其他任何理由向美国施加压力的话，如果欧佩克决定选择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主要货币的话，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帝国的根基。如果这成为事实，同时美国的一个或者两个债主要求我们以欧元偿还债务的话，其影响将无法估量。

2003 年 4 月 28 日，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我从家里走到由车库改造而成的办公室的路上，脑子里充斥着这些想法。我坐在桌子前面，打开电脑，如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往常一样点击了《纽约时报》的网站。网站的头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把我从刚才那些国际金融、国债以及欧元的想法中转移到我的老本行上来：“美国给予贝泰公司重建伊拉克的主要合同。”

文章的开头是：“布什政府今日将伊拉克庞大的重建工程中的第一个主要合约授予旧金山贝泰集团。”页面下方，作者告知读者，“伊拉克人将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美国的机构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

我点击了网站上另外一篇文章的链接，“与华盛顿有联系的公司，以及与伊拉克有联系的公司。”我在其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贝泰与国家安全设施工程有长期的密切联系……其中一名主管乔治·P.舒尔茨，他是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副国务卿。在加入里根政府之前，舒尔茨先生也是贝泰公司的总裁，与卡斯帕尔·温伯格并肩作战。温伯格被任命国防部长之前，曾经在这家总部在旧金山的公司出任执行要职。今年，总统布什指派贝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利·P.贝泰（Riley P. Bechtel）到总统出口委员会（President's Export Council）任职。

这段话所描写的是那些大型工程建筑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是全球帝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是35年以前克罗汀训练我的结果，也是其他那些为了满足自己贪欲的人带来的后果，这也显示出了目前公司王国的发展程度。

这些文章还报道了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事实，还有关于已经签署了的重建合同的事实，重建那些被美军破坏的伊拉克石油设施，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伊拉克。

允许（实际上是授权）美国工程和建设公司以及石油公司接管一个沙漠王国的开发，SAMA在这方面成为了一个先例。以同样迅猛的势头，SAMA为全球石油管理、重新定义的地区政治设立了新的规则，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结成联盟，保证他们的霸权，同时也保证他们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我

读着这些文章，不禁要想，究竟有多少局外人像我一样知道，萨达姆如果能像沙特阿拉伯人那样遵守游戏规则，他现在也许还能保住总统的位子，可以保住他的导弹和化学工厂，我们甚至还可能帮他建造这一切并可以为这些设施提供维护。伊拉克本来是一块可口的肥肉——甚至与沙特阿拉伯的协定一样诱人。

直到现在，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都非常低调。可是如今，它就摆在眼前。虽然这些文章报道的只不过是细枝末节，但是事情的本质开始慢慢浮出水面。我想知道《纽约时报》是如何报道在伊拉克发生的这一切的，于是我进入了 CNN 的网站，看到的是“贝泰赢得伊拉克合同”的标题。CNN 的报道与《纽约时报》的非常相似，不同的是，CNN 还提及：

曾经有不少报道指出，其他一些公司也参与此合同的竞标，其中包括哈里伯顿的子公司克鲁格·布朗·鲁特公司（Kellogg Brown & Root, KBR），副总统曾经是哈里伯顿的首席执行官……哈里伯顿赢得了价值 70 亿美元的合同，为期约为 2 年，是对伊拉克战后的石油基础设施进行修理。

美国终于开始暴露出其全球帝国的野心，虽然尚未具体到细节，尚未暴露其是一个债务、欺骗、奴役、剥削的实质，也尚未暴露其事实上是对心灵、思想、灵魂和全世界资源最明目张胆的掠夺的本质。这些文章也并未揭露，现在这些公司参与到伊拉克的重建只不过是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另外一种方法；文章也没有揭露，全球帝国扩张的规模和他的隐蔽手法。

不过，事情的真相还是慢慢浮出了水面，这让我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要说出事情的真相，但是我却一直没有行动。我知道自己需要忏悔，然而却一拖再拖。回想起来，我看到我所有的疑惑、愧疚，都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它们在克罗汀的公寓里开始滋长，甚至在我前往印度尼西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来，它们一直在缠绕着我。

我也知道，若非这些怀疑、痛苦以及愧疚不时地困扰着我，我可能永远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无法从中抽身。像许多人那样，我可能已身陷囹圄，永远不可能站在维京群岛的沙滩上，作出退出美因的决定。

这些报道暗示了大企业、国际银行以及政府之间的联系，但是就如我的美因简历一样，这些报道仅触及到了问题的表面，这些只不过是骗人的面具。而事情的真相并非大型工程与建筑公司再一次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合同，按照美国的形象去开发一个国家那么简单。

事情的真相是，如果我们想要让哪个国家听我们的话，就得让像我这样的经济杀手出动，让这些国家接受美国的巨额贷款，而条件是所有的工程都必须由美国来接手，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将背上巨额债务。而且，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听话，不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将他踢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地打开电视机而将其他问题抛诸脑后，然后安慰自己说：“他们”将包揽一切，船到桥头自然直。

那么，我们可能要等到下一轮的选举，所有的事情才可能好转。

那天早上报纸上报道的问题并没有揭露全球帝国剥削绝望的人们、不择手段的掠夺能源的事实。但所有的这些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当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面对事实的真相。我们更倾向于相信数千年人类社会的进化，最终将造就最理想的经济制度，说服自己相信经济发展对人类有益无害，而且发展越快，对人类就更有利。最后，我们互相说服对方这个概念是正确且在道义上是正义的：那些给经济增长添砖加瓦的人，会受到赞赏和奖励，而那些生于贫困的人，却注定要被剥夺。

这个概念及其推论被用来证明所有的强盗行为都是正确的，那些在伊朗、巴拿马、哥伦比亚、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肆意强奸、掠夺与谋杀无辜平民的人的行为有了理论依据。只要其活动能保证经济增长，经济杀手、“豺狼”和军队在该出动的时候就会出动，在需要扩大队伍的时候也一定会扩大。根据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模型，即便你炸掉一个城市再重建，数据显示也能带来经济的巨幅增长。

而事情的真相是我们过着骗人的生活。

像我在美因的简历，只不过是掩饰自己丑恶行为的面具。我们对外

界吹嘘，美国是多么的富有，美国人民是多么的幸福。而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和富有的国家里，却同样有着让人不可容忍的高自杀率、滥用毒品、高离婚率、亵渎孩童、强奸案和谋杀，这些就像恶性肿瘤，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触角也将会延伸得更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感受到痛苦，我们呼吁改变，可是我们却将拳头伸到嘴里，硬是将那些呼之欲出的呼喊压了下去，于是没有人听到呼叫。

如果可以仅仅将这个当成一个阴谋，那非常好，可是我们不能。全球帝国依靠的是大银行、企业和政府共同支撑的公司王国的力量，而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阴谋。这个公司王国就是我们本身，我们让它出现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中的多数人难以站起来反对它的原因。我们宁可看着阴谋者慢慢潜伏在阴影之中，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为大型银行、企业或者政府工作，我们又怎能对我们的衣食父母恩将仇报呢？

我在电脑屏幕前盯着这些头条时候想到了这些。我也不禁要问自己，你怎么站起来反对一个看起来给了你车子和房子、让你吃饱穿暖、给你能源和医疗服务的体制？尽管你知道就是这个体制，让全球每天 24 000 人死于饥饿，让全球数百万人对你深恶痛绝。你怎么能对你们选出来的代表们制定的政策深恶痛绝，你又怎能鼓起勇气站出来挑衅一个你以及所有邻居认为是真理的概念？尽管你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一个随时自我毁灭的体制。我慢慢地站起来，回到房子里，给自己再斟了一杯咖啡。

我绕了一个弯，取了当天的《棕榈海岸邮报》（*Palm Beach Post*），躺在车道旁的邮箱附近看了起来。这里也有同样的贝泰-伊拉克报道，版权注明报道来自《纽约时报》。可是现在我才注意到报头上的日期：4 月 18 日。这是著名的一天，至少在新英格兰，我的脑子里立即充满了具有独立战争意识的父母从小灌输的那种观念，以及朗费罗的那首诗：

听着，我的孩子们，这样你们会听见

保罗·里维尔在夜色中飞马报信，

在 1775 年，4 月 18 日，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如今没有几个在世的人能记得这著名的一年和这一天。

今年的耶稣受难日正好是保罗·里维尔 (Paul Revere)^① 骑马报信的纪念日。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看到这个日期，让我想起了这个殖民时代的银匠，驱赶着他的马，穿过新英格兰黑暗的小镇，挥舞着他的帽子，大声地喊叫：“英国人来了！”里维尔冒着生命危险发出了这个警告，美国人立刻起来响应，他们阻挡了英国殖民者的前进。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推动了他们，为什么这些殖民地的美国人愿意突破常规，像里维尔这样的领头人很多很多。究竟是什么鼓动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理由，可是肯定还有一种让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一种能量或者动因，一把可以在历史上重要的一刻、点燃所有独立火焰的星星之火。

然后我想到的是：语言。

大英帝国的自私、重商主义体制最终导致其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通过汤姆·潘恩、托马斯·杰弗逊这些人物的语言，揭露出这个体制贪婪、自私的本性，激励人们去反抗。于是，殖民地居民开始怀疑，他们在怀疑之中发现了能够驱走所有谎言的新现实。他们认清了光环背后的真相，明白了大英帝国实际上不过是在控制、欺骗和奴役他们。

英国殖民主义者欺骗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对这块土地上的人说：这是人类社会上最好的一个体制，世界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商业以及政治体制。而实际上，事情的真相是：这个体制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成全极少数人的贪婪。这个弥天大谎以及伴随它而来的剥削，延续了数十年，直到少数的几个人——哲学家、商人、农民、渔夫、边远居民、作家，以及演说家道出真相。

语言。我再次加满了咖啡杯走向我的办公室，我想到了语言的力量，于是我再次回到电脑面前。

我断掉了与 CNN 网站的链接，拿起了前天晚上开始写的文章。我看着

①保罗·里维尔 (Paul Rever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志士。——译者注

我写的最后一段：

这个故事不得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机遇与危机共存的时代。经济杀手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为什么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无法逃避的危机；这个故事我不得不说，因为，我们只有认识到过去所犯的错误，才能避免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犯错；这个故事我不得不说，这不仅是为了那埋葬在世贸大厦瓦砾之下的 3 000 亡魂，更是为了地球上每天被饿死的 24 000 人。

然而，人类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她有改变这一切的能力、财富和实力。我生在这个国家，也为她而做了一辈子的经济杀手，这就是美国。

这一次，我绝不会停笔。我生命中的数个偶然以及围绕它们所作出的选择让我处于现在的位置。我会继续下去。

我再次想起了那个人，那个在黑暗中疾驰穿过新英格兰乡村，发出大声警报的孤独骑士。这位银匠知道，潘恩的话语已经比他早了一步，人们已经在家里、在客栈里纷纷议论潘恩的消息。潘恩已道出了大英帝国暴虐的真相。杰弗逊总统将宣布我们的国家将献身于对生存的意义、自由，以及幸福的追求。而在夜色中骑马飞奔的里维尔，他明白整个殖民区的人们将因为他的消息而获得无穷的力量，他们将奋起反击，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

语言……

我决心不再耽误哪怕一刻钟的时间，去完成这些年来反复拈起又放下的文字，将我所犯的罪行公之于世，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忏悔。

尾 声

书到了尾声，也是一个开始，也许你会问，下一步将走向何处。你要怎样做才可以阻止公司王国继续扩张，阻止美国走向疯狂的自我毁灭的全球帝国之路的步伐。现在你可以抛开这本书，走进真实的世界。

你需要些指引么？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你阅读的那些篇章中，有关贝泰工程公司和哈里伯顿公司的事情已经是旧闻了，你读到这些章节的时候，可能感觉有点多余。但是，这些新闻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这些内容的时效性，我希望你去挖掘新闻报道字里行间的真实意义，从而引导你去认清你从电台或电视报道知道的每一则新闻背后的事实真相。

事情的实质往往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为通用电气公司所有，美国广播公司（ABC）是迪斯尼旗下的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隶属电信业巨头维亚康姆，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 Warner）的一部分，美国的很多报纸、杂志和出版社都由大型跨国企业控制着。那些通信和传媒领域的执行官们都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的一生都谨记着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持、加强和扩展他们继承下来的这个制度。他们精于此道，所以一旦遇到阻力，他们可以冷血无情。而这个包袱就丢在了你们身上，让我们揭开那个面具，去发现事情的真相，并且把它揭露出来，告诉你的朋友和亲人，让他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其实你们可以做一些更实际一点的事情。比如，省点油吧。1990年，在美国首次入侵伊拉克之前，我们进口 800 万桶原油；到 2003 年，第二次进军伊拉克之前，美国的消耗量已经增长了 50% 到 1 200 万桶。不要总想着去疯狂购物，去运动一下、冥想一下吧，去图书馆阅读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住的房子、衣橱、车、办公室甚至你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节俭些。抗议一下“自由贸易”和那些利用剥削穷人血汗的公司，抵制那些掠夺地球自然资源的公司。

我可以告诉你，希望仍在人间。目前这个体系并不是不可救药。银行、跨国企业、政府又或者是那些控制着这些机构的人都并非本质恶劣，他们并不是非要建造某一个帝国主义。我会继续告诉你，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哪个机构恶意的阴谋导致的结果；相反，是他们对经济发展的错误理念衍生的结果。错并不在于这些机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些机构运作和相互影响的方式理解有误，对他们的领导层在那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理解有误。

实际上，如果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或者那些跨国公司，都以人类的和平幸福为己任，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的美好。设想一下，假若耐克、麦当劳以及可口可乐，都来帮助那些贫苦的人们，让他们可以吃饱穿暖，那将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事！相对于将一个地球人送上月球、让前苏联解体和建造那些让大型企业通过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基础设施，这更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教育的改革我们需要全新的方式，让自己、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去思考、去发问，也敢于去行动。你也可以身作则，你可以是一名教师，也可以是一名学生，用你自己的实际行动去鼓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鼓励你身体力行，以行动来影响你周围人的行为。在任何可以体现真实意见的论坛上大胆发表肺腑之言，通过书信、电子邮件、电话提出你的问题和关注。

我可以提醒你 20 世纪 90 年代殊瓦人告诉我的话：梦想是怎样的，世界就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将造成环境污染的工业、堵塞的高速公路以及拥挤的城市这个往昔噩梦，换成以尊重地球、对社会负责的可持续发展观以及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新的梦想。改变自己、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是我们力所

能及的事情。

现在，我们拥有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机会，我可以列出的机会数不胜数：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有足够的药物治疗疾病，去预防每天让无数人备受折磨的流行病；建造可以将生命所必要的物质输送到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去的交通系统；提高文化教育水平，提供能让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任何其他他人联系的互联网服务；拥有解决冲突的工具从而让战争永远成为过去；探索浩瀚无边的太空以及研究如秋毫之末的亚原子能源，让这些能源应用于为每个人建造更符合生态学的家园；有足够的资源完成以上所有的一切；还有更多。

我建议你可以立刻按照以下的步骤，帮助别人去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机会是什么。

√向研究团体提供《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你可以在当地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得到这本书（在 www.johnperkins.org 网站可以找到相关的指引）。

√就你最喜欢的题目（运动、烹饪、蚂蚁——可以是任何食物），向你附近的小学做一次展示，用它帮助学生们认识到他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的本质。

√向你地址本上所有的电子邮箱地址发送邮件，表达你因阅读此书和其他书籍而产生的想法。

你只需要挑选其中你觉得最有意义的几件事情，然后行动起来，同时要明白，所有这些都是你与我必须承担的重大义务之一。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并且毫不含糊地唤醒身边每一个人，让他们觉醒过来，然后行动起来。

当然，这本书并非是一个药方，它只是一部忏悔书。这是一个曾甘心让自己被利用的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个因为各种恩惠而相信了腐败体系那一套的人，同时也因为很容易就找到理由让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的人的自白；也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不断寻找借口的人的自白；一个生于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因为自己的父母不是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感到自卑的人的自白；一个听从老师教诲，阅读有关经济发展的教科书，然后以那些提倡全球帝国的行为合法化的人作为自己学习榜样的人的自白，尽管

如此行为通常导致谋杀、种族屠杀甚至环境的破坏；一个告诫他人不要重走自己路的人的告白。这是我的忏悔。

书你已经看到了这里，表明从个人角度而言，你已经能够与我的忏悔产生共鸣，你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不少相同的看法。我们也许走在不同的路上，可我们开着的一样是车，使用的一样是燃油，去的也是同一个集团管理下的餐馆。

像所有的忏悔一样，它是向赎罪迈出的第一步。

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也必须作出自己的忏悔。当你将你是谁和盘托出，将为什么你在这个时期存在、为什么你有如此的所作所为以及你下一步打算去哪里全然道出，你将有种顿然释放的感觉。这绝对是种愉快的感觉。

相信我，在写下这本书时内心充满了感情，而且通常是一种痛苦和羞愧的感觉。某种程度上说这让我惊恐万分，而我之前所面对的从未让我如此恐惧。可是这却让我有种直到现在才感觉到的轻松感，一种只能用欣喜若狂来描述的感觉。

问一问自己这些问题：我需要忏悔些什么？我是怎样欺骗了自己和别人的？我为什么让自己到了如此地步？为什么要附和一个以欺骗、掠夺为本质的体系？我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让我们的孩子以及全球各地的孩子们去实现我们的开国先驱的梦想，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梦想？我究竟要有什么办法才能让那些贫困的孩子免受饥饿的痛苦，让“9·11”那样的悲剧永远不会再发生？我要怎样才能帮助孩子们明白，我们要唾弃那些心怀贪念、过着极度奢华生活的人，尽管那些人通过他们控制的自诩是文明象征的媒体，企图说服我们只有别墅和游艇才能带来幸福？我的态度和我的观念究竟还需要作怎样的改变？我自己要借助什么样的讲坛去教育其他人学习更多的知识？

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并且清晰地、毫不含糊地给出答案。潘恩、杰弗逊以及所有的爱国者都在凝视着我们，他们的言语直到今天仍然鼓舞着我们。那些离开了自己的农场和捕鱼船，走向前沿与大英帝国抗争的勇者的灵魂，以及那些在美国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内战（Civil War）中为解放奴隶而奋起抗争的斗士的灵魂，还有那些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世界不受法西斯侵犯的烈士的灵魂，都在向我们发出忠告。还有那些在家中准备饭菜、在精神上支持我们的人的灵魂，以及所有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的人：教师、诗人、艺术家、企业家、医疗工作者、体力劳动者……还有你和我。

这一刻是属于我们的。现在，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到了站出来的时候，请扪心自问，探究我们灵魂深处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采取行动。

你们生命中的许多偶然，还有你们面对这些偶然所作出的选择，让你们站在了今天这个位置上……

约翰·珀金斯年谱

- 1963年 预科学校毕业，到来德尔布里学院进修。
- 1964年 结识伊朗将军的儿子法哈德，从米德尔布里辍学。
- 1965年 就职于波士顿的赫斯特报社。
- 1966年 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
- 1967年 与前来德尔布里的同学结婚，其“弗兰克叔叔”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高层执行人员。
- 1968年 被美国国家安全局认定为经济杀手的理想人选。托“弗兰克叔叔”的福，加入到美国和平队，被派遣到厄瓜多尔亚马逊流域。当时，那里的土著人正与美国石油公司展开斗争。
- 1969年 在热带雨林的安第斯山脉生活。受雇于石油公司和政府机构，认识到现代文明对当地文明和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 1970年 在厄瓜多尔，与国际咨询公司美国公司的副总裁见面，他也是一名NSA的联络官。
- 1971年 加入美国公司，在波士顿接受克罗汀的经济杀手训练，随一个11人的小组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爪哇。
- 1972年 由于“合作”态度好，被提升为首席经济师，视作“专家”。与重要的领导人会面，包括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派往巴拿马执行特别任务。与巴拿马极具领袖魅力的奥马尔·托里霍斯会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面，托里霍斯告诉他，一定要将运河的所有权从美国人手中夺回来。

1973年 事业如日中天。在美国公司内部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继续在巴拿马工作，周游列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作研究。

1974年 经济杀手在沙特阿拉伯又一次成功了。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投资数十亿美元的石油资金购买美国的债券，同时聘请美国公司帮助沙特阿拉伯建设电力和水力系统、高速公路、港口以及兴建城市。交换条件是，美国保证沙特阿拉伯王室继续执掌政权。这将成为经济杀手未来行动的榜样，包括在伊拉克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行动。

1975年 再次得到升迁，成为美国公司百年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合伙人，并被任命为经济与区域规划经理。发表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同时在哈佛以及其他机构讲学。

1976年 在非洲、亚洲、拉美、北美，以及中东国家负责项目管理。从伊朗国王的革命中悟出一条建立经济杀手王国的道路。

1977年 在哥伦比亚，看到被诬蔑为恐怖分子的农民和游击队，而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了保护自己家园。

1978年 与法哈德一起匆忙离开伊朗，飞往法哈德父亲——一位伊朗将军在罗马的家中，法哈德的父亲预言伊朗国王即将下台，并谴责美国政策、腐败的领导和霸道的政府引发了遍及整个中东的仇恨。他警告如果美国再不停止他们的脚步，情况将变得更加糟糕。

1979年 伊朗国王逃离伊朗，伊朗人围攻美国领事馆，挟持 52 名美国人质。认识到美国只不过是总在掩饰其帝国主义本质的国家。在压力和频繁矛盾中，他与第一位妻子离婚。

1980年 他感到非常沮丧和失落，意识到以前在美国的那些金钱欲和权力欲只不过过眼云烟，随后，他离开了美国公司。

1981年 厄瓜多尔总统杰姆·罗尔多斯（站在反对石油公司的讲坛上参选）和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因为他对巴拿马运河以及美国军事基地的态度激怒了势力强大的华盛顿）因飞机失事丧生，他为此深感不安，因为这明显是中央情报局采取的行动。这一年，他开始

第二次婚姻，与贝泰公司首席建筑师的女儿结婚，该建筑师负责设计和建造沙特阿拉伯城市工程——1974年经济杀手接过来的工程。

1982年 创建独立电力系统公司（IPS），一个致力于生产环保电力的公司。这一年，他的女儿杰西卡出生。

1983-1989年 引人注目地成为IPS的首席执行官，得到很多“偶然”的帮助——身处高位的人、税务的减免等等。作为一名父亲，被世界危机以及前经济杀手的经历困扰。开始写一本道出真相的书，接到一笔诱人的咨询费，条件是停止写书。

1990-1991年 在美国入侵巴拿马以及诺列加被监禁后，出售IPS公司，于45岁时退休。开始考虑写一本经济杀手故事的书，但却再次被说服将精力转到建立非营利组织上去，他的那些非营利组织的搭档告诉他，一旦他写下这样一本书，将影响非营利组织的正常活动。

1992-2000年 眼看经济杀手落败伊拉克而导致海湾战争爆发。第三次提笔继续写经济杀手之书，但却在威胁和贿赂面前屈服了。为了让良心得到抚慰，写下有关原住部族的书籍，并继续支持慈善组织，在新世纪论坛讲学，深入亚马逊地区和喜马拉雅山脉。

2001-2002年 带领一队北美黑人深入亚马逊丛林，在那里与原住部落度过了2001年9月11日，在“零地带”附近游荡一天，决心写一本能够消除自己痛苦并能揭露经济杀手背后真相的书。

2003-2004年 回到厄瓜多尔的亚马逊流域与当地原住部族人面会，这些土著部族当时威胁与石油公司展开殊死斗争；写下《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

致 谢

我要感谢曾与我共同分享生活的人，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根本无法完成。能有这些经历，接受这些教训，我心存感激。

除此以外，我要感谢他们鼓励我走出困境，聆听我的心声。他们是：斯蒂芬·赫特夏芬 (Stephan Rechtschaffen)、比尔和林·特威斯特 (Bill and Lynne Twist)、安·坎普 (Ann Kemp)、亚特·罗菲 (Art Roffey)，还有那些参加“梦想改变”联盟 (Dream Change) 旅行计划和工作室的人们，尤其是我的合作规划者夏娃·布鲁斯 (Eve Bruce)、林·罗伯茨-赫里克 (Lyn Roberts-Herrick) 和玛丽·田达尔 (Mary Tendall)，以及我的好妻子——25年的老搭档——威妮弗蕾德 (Winifred) 和我的女儿杰西卡。

我还要感谢下面这些女士和先生们，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关跨国银行、国际公司的内部消息，以及世界各国政要的个人见解，尤其要感谢迈克尔·本-艾里 (Michael Ben-Eli)、塞布丽娜·波罗格尼 (Sabrina Bologni)、胡安·加布利·卡拉斯科 (Juan Gabriel Carrasco)、杰米·格兰特 (Jamie Grant)、保罗·肖 (Paul Shaw) 和其他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人。

在我完成本书的草稿后，BK (Berrett-Koehler) 出版社的创始人斯蒂文·皮尔森提 (Steven Piersanti) 花了大量的时间为我的书做了编辑工作，帮助我一遍又一遍地完善本书，对此我深表感谢；同时还要感谢理查德·珀尔 (Richard Perl)，他把我介绍给斯蒂文；还有诺瓦·布朗 (Nova Brown)、兰迪·菲亚特 (Randi Fiat)、艾伦·琼斯 (Allen Jones)、克里斯·李 (Chris Lee)、詹尼弗·里

致 谢
Thanks

斯 (Jennifer Liss)、劳里·佩里莱德 (Laurie Pellouchoud) 和詹妮·威廉姆斯 (Jenny Williams)，他们仔细地审阅了我的原稿；我要感谢大卫·科顿 (David Korten)，他不但审阅了我的草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议和具体的修改要求，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保罗·费多可 (Paul Fedorko)；我还要感谢瓦莱丽·布鲁斯特，她为我的书做了精心设计；我还要感谢我的文字编辑托德·曼扎 (Todd Manza)，一位非凡的语言艺术家和哲学家。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执行主编吉文·西瓦苏布拉马尼恩 (Jeevan Sivasubramanian)、肯恩·鲁伯夫 (Ken Lupoff)、里克·威尔逊 (Rick Wilson)、玛利亚·杰西·安吉罗 (María Jesús Aguiló)、帕特·安德森 (Pat Anderson)、玛丽娜·库克 (Marina Cook)、迈克尔·克劳利 (Michael Crowley)、罗宾·多诺万 (Robin Donovan)、克里斯汀·弗兰兹 (Kristen Frantz)、蒂凡尼·李 (Tiffany Lee)、凯瑟琳·兰格隆 (Catherine Lengronne)、戴安·普拉特纳 (Dianne Platner)。我还要感谢所有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辛勤工作的 BK 出版社员工，他们都意识到有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我要感谢所有在美国公司 (MAIN) 与我共事、却对他们扮演的“经济杀手帮凶”，对参与建立全球帝国的角色毫不知情的人；我特别感谢所有为我工作和共同踏上遥远的土地，与我分享许多珍贵时刻的人。还有之前我出版的有关土著文化和萨满教书籍的国际思想传统国际出版社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的艾胡德·斯柏林 (Ehud Sperling) 以及该出版社的所有员工，还有许多鼓励和支持我走上作家之路的好朋友。

我永远感谢那些带我进入丛林、深入沙漠和攀上高山的人们，在雅加达河边的纸皮小屋、在无数城市的贫民窟的人们。他们让我分享了他们的食物和生活，这一切都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灵感源泉。

约翰·珀金斯

作者简介

约翰·珀金斯在生活中担任过四种角色：经济杀手、一家成功的可替代能源公司的 CEO（期间并未公布其过去的 EHM 生活）、本地文化专家兼萨满教信徒和教师兼作家，而后者的角色让他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去促进生态平衡和社会稳定，同时能够打破沉默揭开自己作为一名 EHM 的真相的善举。不仅如此，在他讲述自己作为一名 EHM 的特殊生活的同时，也向世人揭露了那个国际性的阴谋和腐败——将美利坚合众国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而无视全球无数的人民对帝国的唾弃。

作为一个经济杀手，约翰的职责是游说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借贷巨额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一笔远远超过他们所需的贷款），保证这些工程的项目全部落入像哈里伯顿这样的大企业手中。一旦这些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美国政府和他们的国际经济援助机构就可以控制他们的经济，确保这些国家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为美国的利益和建立“全球帝国”的野心服务。

在他还是一个经济杀手的时候，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亲历和见证了现代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包括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伊朗王的倒台、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之死、入侵巴拿马以及其他导致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最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1980 年，珀金斯创立了独立电力系统公司（IPS）——一家可替代能源公司。在他的领导下，IPS 在这个高风险行业中所向披靡，他的竞争对手纷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Photo Sabrina Bologni



纷落败。由于许多政界高官的青睐，让 IPS 成为行业的领头羊。珀金斯还是一家企业的高薪顾问，而这家企业在他的帮助下从发展中国家狠捞了一把，而他之所以成为这个企业的顾问，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企业对他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令人垂涎的高薪。

1990 年，约翰卖掉 IPS 公司，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为原著人争取权利以及环保运动的拥护者，他与亚马逊部落的关系尤其密切，帮助当地的人保护热带雨林。他写了 5 本有关本土文化、萨满教、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他在四大洲的大学和学习中心讲学；他创立了几个主要的非营利组织，并列席这些组织的董事会。

其中一个他创办和主持的非营利组织“梦想改变联盟”（Dream Change Coalition），后来改名为“梦想改变”（DC），告诫人们在达到自己目标的同时应该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影响有清醒认识。“梦想改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共创和谐社会的队伍中来。这个组织提出“地球污染抵消租约计划”（Pollution Offset Lease for Earth, POLE），该计划提倡以实际行动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帮助原住民居民保护热带雨林，提倡“尊重地球”。约翰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他们鼓励着所在国家的人们创立类似组织，为保护地球承担起责任。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20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交替之时，约翰仍然对他曾是经济杀手的经历守口如瓶，并且继续接受大笔的企业咨询费用。他将自己得到的咨询费用用于非营利组织，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

艺术和娱乐电视台（Arts & Entertainment）制作的节目将他形容为“亚马逊的猎人”，由里奥纳德·尼莫尔（Lenoard Nimoy）旁述。意大利《大都会》杂志对他在欧洲的“转变”教学讲坛大作报道。《时代周刊》杂志将他的“梦想改变联盟”的网站列入全球最能体现“地球日”的13个网站之一。

然而“9·11”事件发生了。那一天发生的巨变，让他坚定了要将经济杀手的真实面目揭开的决心，让他第一次真正敢于漠视恐吓和贿赂，开始写《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他逐渐相信，自己有责任与大家分享作为内幕人所洞悉的有关政府、国际援助组织以及国际大型企业的一切。正是这些机构，让世界变成今天这样。他要揭露出经济杀手已经铺天盖地、足迹遍布全球的事实。他觉得他欠了这个国家，欠了他女儿，也欠了全世界所有因为像他这样的经济杀手的所作所为而遭受痛苦的人们，还欠了他自己的情。在这本书里，他讲述了他的祖国早已偏离美利坚合众国的初衷，而是在力图实现建立一个全球帝国的野心。

约翰·珀金斯的著作还包括：《转变》、《世界如你所愿》、《灵魂导航》、《远离压力的习惯》和《殊瓦精神》等。

想要更多地了解珀金斯，了解他在哪里讲学，订购他的著作或者联系他，请访问他的官方网站：

www.JohnPerkins.org

想进一步了解“梦想改变联盟”——这个改变全球良知的501(c)3法案^①授权的非营利组织，请访问：

www.dreamchange.org

①501(c)3法案：美国国会颁布的《国内税收条令》中的法案。——译者注

珀金斯揭露新帝国主义运作秘密

“经济杀手”掠夺不流血

二战以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帝国主义国家抛弃了传统的武力侵略手段，转而控制他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在政治教科书上就出现的理论，许多人并不陌生。珀金斯的书揭露了新帝国主义的运作秘密，为这个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

——《时代人物周报》

美国战略手段揭秘：派“经济杀手”控制他国精英

曾长期担任国际金融顾问的美国人珀金斯出了一本书，名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该书给美国的统治势力取了一个新名词：“corporatocracy”，我们把它译为“公司王国”。这本书是珀金斯的自传，也是他的自白、忏悔，使人大开眼界。

——新加坡《联合早报》

国际金融顾问出书揭露美欺诈他国而发家

历史上曾有的帝国都崩溃了。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们也会崩溃。希望这本书能唤醒一部分美国舆论的良知。

——《信息时报》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提出惊人之言

害人终害己，这是珀金斯得出的结论。珀金斯新书的出版必将唤醒一部分美国舆论的良知。至于那些长期受到蒙蔽的外国精英，就更应该警觉了。

——《深圳商报》

比侦探小说更为精彩的真实故事

ISBN 7-80728-461-7



9 787807 284611 >

上架建议 财经/纪实小说

封底无防伪中实
防伪标均为盗版

短信防伪中实方法
见本书最后一页

ISBN 7-80728-461-7
F·1495 定价：35.00元